

日本在華的間諜店

譯報叢書之一
萬斯白 著

國光書局發行

1945

116
D790.336
13

譯報叢書之一
萬斯白著

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

國光印書館發行



3 2285 2233 4

目 錄

原者者為中文譯本引言..... A. 萬斯白

插圖.....

田伯烈序..... H. J. 田伯烈

密勒氏評論報書評..... 密勒氏野史

讀者的證明..... 盧嵩

第一章..... 一

一、入中國籍的意大利人..... 一

二、白奴販賣者..... 九

三、張作霖是怎樣被暗殺的..... 一三

I 第二章..... 一七

一、日軍佔領濟陽.....一七

第三章.....二五

一、遭劫的中國人.....二五

二、我碰到了土肥原.....三一

第四章.....三五

一、日本政策的解釋.....三五

二、處長的訓示.....四三

三、我的第一件差使.....五〇

第五章.....五五

一、匪首老「影」.....五五

二、發了狂的處長.....六一

三、我會見我的夥計們.....六九

第六章.....七五

一、官廳獨佔下的淫業.....七五

二、毒品和麻醉劑.....八三

第七章.....八九

一、害人反害自己.....八九

二、托克馬達第二受挫了.....一〇五

第八章.....一一三

一、復仇.....一一三

3 第九章.....一二三

一、李頓調查團..... [一三三]

第十章..... [一三七]

一、處長給我的讚語..... [一三七]

二、處長的賞識..... [一四四]

第十一章..... [一五一]

一、在義勇軍的營中..... [一五一]

二、有趣的意外事件..... [一五七]

第十二章..... [一六三]

一、新式綁票..... [一六三]

二、開斯普事件..... [一七一]

三、我被監視了..... [一八一]

第十三章 一九一

一、生財有大道 一九一

二、帶着血腥的錢 二〇三

三、吸盡了民脂民膏 二〇九

第十四章 二一九

一、將近結束了 二一九

二、在上海的奔走 二三〇

三、我妻的自述 二三六

收場白 二四三

原著者爲中譯本引言

我非常高興，我這本書已有了中譯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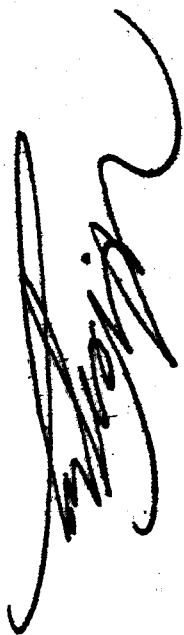
我希望中國的大衆，能在這本書裏像我一樣，親切地看到日本軍閥的醜惡形像，瞭解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這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

在這裏，我以萬分的信心，向中國大衆保證：你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我更要在這裏向領導你們抗戰的偉大領袖 蔣委員長，致最敬禮！並祝他的康健，祝 中華民國萬歲！

萬斯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離滬赴美之前。

最後，我得謝謝C君，他不憚麻煩地和我商量，校正了一般不易瞭解的地方，使這本書成爲最完美的詳全譯本。



(左)

作者在「北京」
進見張作霖
將軍時的裝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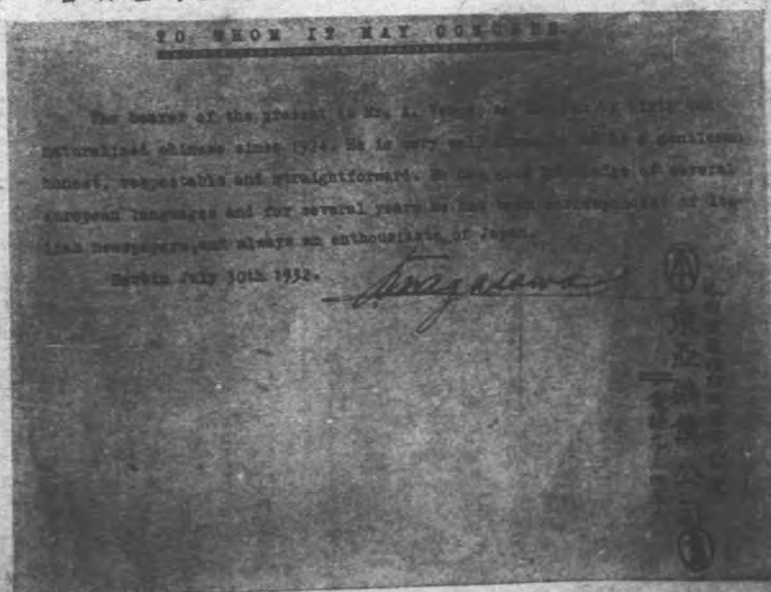
(右)

張作霖將軍遺像



(上) 一九一三年七月三日赴俄(左首第二人為葛氏)

(下) 哈爾濱日本商會給葛斯白所出證明書



田伯烈序

H. J. Timperley

我被邀爲這本書寫篇序言，就冒昧地將此書出版的情形，作一簡略說明，并敘述一點著者萬斯白君的事略。

我是一九三六年秋間在上海初識萬君，他找我，說是他的太太和家人由大連乘船來上海與他會面，而在青島被日本當局扣留了，要我幫他發表這消息。我寫了一個字條，介紹他去見在當地辦報的一位同業，過後我就不知道他到那裏了。

將近一九三七年歲末，萬君又來見我。他告訴我，已寫了一本書，敘述他在滿洲受僱於日軍特務機關的經歷，並請我替他設法出版。我問他爲什麼要來和我商量這件事，他答道：「因爲你知道這些事情，更因爲你也與日人發生過糾紛，」註所以我相信你是不會對於這件事置之不理的。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寫了

〔註〕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裏，我正在和日本當局打官司，因爲他們沒有權力，可以將我發給孟德斯威爾的電訊檢查而扣留起來。

這本書，他們會馬上置我死地的。現在我已脫稿了，我想儘快儘可能的弄它出版，我也許可以帶了稿稿，眷就離開上海。」

我答應他將這事考慮一下，但這是隨口敷衍的，因為我自己也正有一本書在手頭，我知道是分不出時間去閱讀萬先生所寫的那種東西的。

過了一兩天，他將原稿送給了我，我把他交給一位有批評能力的報界同業，請他給我一個坦率的答覆。使我驚異的，我接到了一個以其熱忱的報告，但是我還是不滿意，決意再測驗一下。我對一位心腹朋友說明了種種情形，他是一位外國官員，因為地位的關係，有非常便利的機會能查明萬氏的敘述，是否真確。讀完原稿後，那位官員問我能否約著者見面，以便詢問他似乎必須加以闡明的幾點。結果約好了見面，經過幾次長時間的會談後，他深信萬氏說的是實情。

他（寫信給我）說，「對於書中所述的許多惡行，我雖然在調查中知道了那些事實，但讀到其中所揭發出來的，給日軍統治新征服人民的方法特徵的侮辱，腐敗，造孽，野蠻等內幕，在我却是一個震動肺腑的經驗。」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命是西方文明的保衛者，還會對他們乃是一種巨大的謊實。我相信這些他們倘若他們會讀到這本書的話，對於他們所保衛的那種事情，也將吃驚起來吧。」

「對於『傲慢誇大』的英國成見很深的保守派，以及『他們做的事，並沒有勝過我們所做過的』一派人，這是可爲一個鐵一般的教訓了，在持和平主義的孤立派方面，那麼他們對日本侵略別人的狹窄秩序與繁榮的觀念，這當是一服醒神劑。

「這是我所讀到過對於一個階級，一個民族的最强有力的公訴狀，事實上也是對『並無有組織的，不公平制度，以少治多，以幾萬萬人在黑暗中工作，供幾千人得安逸，又以一軍人向另一軍人發號令，而人類大多數須忍饑挨餓，過着污濁生活，以維持人造的利益的公訴狀。』

爲想得到第三個人的意見，我又請了我的朋友西行漫記的作者史諾，將原稿讀了一遍，他文辭雖略，附有下評語：「據我所知，書中敘及的某幾樁事情，某幾個人物，某幾種情形，都具有十分真確的內事實證的。這是一本揭開大謊的書，有着毫無疑問的獨特價值的。」

此後，我便親自閱讀那原稿，逐字逐句的讀，以我於一九三三，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担任倫敦時報及亞細亞雜誌訪員遊歷滿洲所獲當地情況的知識爲標準，我深信高斯白君的著作，大體上應該是最爲真確的。

關於這本書的本身已經說得够了。讀者無疑的諒必想知道高斯白早年胸懷如何。

高斯白以一八八八年生於意大利阿蓋拉 (Agera)。年二十二，受倫敦教育，畢業後，便加入了倫敦

西哥革命軍，在瑪德拉（Gen. Francisco Macera）部下當軍官。在墨西哥服役期間，曾歷身地獄。盡其職上尉階級。一九二二年，據萬君自述，他離開了墨西哥，便做了各地遊歷的新聞記者，遍遊了美國、南美、澳洲、越南和中國，足跡曾遠至西藏、蒙古和東西伯利亞等邊地。

一九一六年世界大戰期內，協約國列強因他在中國長途旅行，具有專門知識，令其在日軍侵入海濱省與阿穆爾省後，即隨聯軍情報處至貝加爾及尼阿斯克等地工作。在這幾年內，萬君得到許多特殊的機會，結識了許多中日要人，其中有張作霖，時任東三省督辦。大戰後，即於一九二〇年，他做了張氏的幕僚。從那時起，他就成了滿洲政治舞台幕後的一種真正的勢力。

但是，過後不久，萬君的新關係就使他與其本國當局發生衝突，因為有意大利軍火私運入滿洲，張作霖若要維持其轄境內治安的話，萬君的職務就當制止軍火販賣。最後，他決定改換國籍，歸化為中國人民，引薦人是中東鐵路督辦朱慶瀾，保證人是東省特別區警察管理處處長魏永興，中東鐵路警處處長蔣志曾。這並不是鬼鬼祟祟的事情，而是光明正大，有憑有據的法律手續。這樣一來，他便得獨立行動，同樣重要的，也就得以維持生活。不過國籍雖改，他本人仍然是「依舊故我」，忠實的法西信徒，墨索里尼的熱忱崇拜者。一九二八年張作霖的被炸，據說是日本人所幹的，張氏遇害後，萬君生活上突又成了問題，除了繼續商業上的買賣。但至一九三二年，日人做了滿洲的「主人」，「因之，韓也就做了萬君命運上的主宰。」

扣起來勒贖，所用方法甚爲簡單，倘若他不肯爲他們效力，便威脅他家室的安全。這樣萬君便不由願地被迫做了日軍特務機關的工具，這也就是使他這本書對於今日的世界上極爲重要的理由。以前沒有人有過，以後也一定沒有人獲得日人手下這種不可多得的地位。他所言種種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而能有勇氣發表他這些驚人的經歷，也是值得我們欣賞的。

更改國籍固會使他免受意國官吏的干涉，但日人據有滿洲時，又使他須聽命於日人，因他的衆人生命做了抵質，他覺得別無他途，惟有強抑感情，硬起心腸來順受，但是他對日人企圖壓服滿洲所用的方法，胸懷反感，則在每一章的字裏行間流露出來。既經墮入那種機構內，他的努力便專謀救他自己和極的家室，俾得免遭他會親眼看見其他反抗新主人貪婪狠毒太遲的人所遭逢的命運。

萬君用他那摹仿不來的作風敘述他的故事，不事雕琢。他懷着震憤來配敘使他痛恨的幾個日本民族的事情，本書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的故事。但是當注意的，他在書中對於一兩個日本官員，如武藤文將軍及井大佐之類，因他們品性篤實，令他欽羨，會盛加推崇。

在我個人看來——我知道這本書的出版者是與我同具此種見解的——我相信就整個日本民族而言，人民大都是吃苦耐勞的，很像中國、印度或歐洲的農民，握大權的軍閥財閥所幹種種罪行，日本人民不能負其咎責。最後分析起來，他們自己的確像中國人民一樣，也是日本軍閥財閥的犧牲者。日本人民

於這種種惡行，雖似處於冤鬼或硬使的地位，其實他們之為此半是昧於真像，半因被人騙去其靈魂。其與日本橫霸是二而一的緣故。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H. J. 田伯烈於倫敦

密勒士評論報書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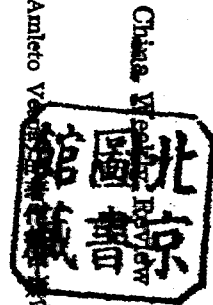
倫敦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名「日本的間諜活動」，是萬斯白(Arieto Voss)所著，日本

所謂「文化」及「日本在華的野蠻舉動」。

萬氏帶着噁之以鼻的態度，把日本自稱「高尚文明」之說推翻了。在這本書裏，他想揭破日本的假面具，他并且承認爲了寫這本書，是會使他被日本人一牌驅出去的，爲了攻擊日本種種的偏見，這個軍大利籍的日本畫間諜的作品，顯然是有重大意義的。雖然他的文書證件，多數人是無法判別的，而偏的日記所載，據新聞記者史諾(西行漫記作者)以及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田伯傑的意見，却是千真萬確的。

田伯傑說：「萬斯白這些值得稱道的故事，應該承認爲真確的。」史諾則認爲：「這書應該開動世界。」但是該書出版後，日本駐英大使館則宣稱：「我們從未聽見過萬斯白這樣一個名字。」

萬斯白以一八八八年生於意大利阿基拉。年二十二，投入墨爾哥革命軍，會兩度受刑，并升至上尉階級，後在遠東做新聞記者，漫遊了幾年，於一九一六年加入協約軍情報處，在滿洲作偵察的顧問。在俄國的謀報處，擔任防止私運軍火及白種人人口販賣。爲了前二項任務他蒙「意大利人用寫到俄國時，第...



了後一項工作則須從事好幾次的暗殺，從俄國逃入遼東的白俄，百分之九十是駐在滿洲，爲爭奪地又是窮困潦倒的份子，在瀋陽哈爾濱等地專營拐賣美貌女子的勾當，成爲社會的大害。

莫斯科的上司張作霖被暗殺了，日軍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進佔了哈爾濱，進入了有俄人十萬，華人二十萬的俄人世界——哈爾濱。經日人的佈置，有幾千白俄流氓在街上手搖日旗，口呼「萬歲」。俄人向日軍獻花，并給日兵擁抱，理由是：日人會應允過他們以滿洲爲「白俄共和國」。據莫斯科說，白俄不久便覺悟了。幾星期後，有數千俄人紛紛向南逃到中國去了。其他的或被拘禁或遭暗殺。俄女被日兵姦淫的，無慮數百。今日在滿洲凡稍有地位的日人，無不娶一二俄女爲妾。日本軍人已有十五萬人安家於滿洲，都是東京來的一顧問。其中多數是犯過罪的，或爲騙子暴徒，或販售毒品及開設妓院，此輩下流社會佔在滿日人的百分之九十五。

滿洲征服完成後不久，莫斯科被迫加入日軍特務機關。當他本人做着特務工作時，他的妻和十四歲的女兒則被日軍扣留爲質。

同樣萬惡的，是日本有系統的毒化滿洲人民。據他說，日軍入寇後不到數月，滿洲到處就佈滿了毒氣。瀋陽、吉林、哈爾濱等市無一街道不開有烟館，和出售毒物的商店，有嗎啡、高根、海洛英等的人，只推定上去，輕輕敲一下門，門上的小洞就開開來，顧客捧起了衫袖，手心裏放着兩角錢，替人轉內，店主收了錢，很快將

在他手上替他注射一針毒汗。毒君子每介紹一個新客，即得若干佣金。自日軍到哈爾濱後，上千上萬的俄人都上了毒，每天在街上都看見大羣的吸食毒物的人，現在販毒者，要佔全埠人口百分之二十。

萬斯白推論說：「用槍炮炸彈殺人要費錢；而用毒劑殺人却能使獲利，不但是一門好生意，而且也是最好的軍事策略。」但日本人民中若審明有毒癮的，却要判處五年的有期徒刑。

萬斯白自稱是唯一的「一個白種人」，在昔日軍做特務工作，而得知其暴行的。幹了五年之後，他宣戰前暴行將要輪到他自身了。羅網漸漸圍緊攏來了，日人發現他曾援助中國游擊隊。經他妻子的提議，備飛機逃走。他的妻子乘日本船到上海。他去接船，看見她正被捕，他即設法逃脫。他的妻子就監禁了幾個月之久。因為要使她招供，施酷刑的日本人令受難的婦女在她面前走過，其中有許多人的手指甲都斷了。在本書之末，她自己提出了她的證詞。我們相信本書出版，因內容驚人，作者也許會不得好死。萬斯白還作了這樣一個預言：「本書完稿時，有一百萬日兵在中國，幾百萬無辜人民正被殺戮，不過真正的消滅贖災人民還剛在開始呢。」

本書當然已被日本禁售。但是很奇怪的，居然有幾本運寄到上海了。同時萬斯白的行履，正為日本特務人員所深切注意着。

讀者的證明

成 嵩

編者先生：

A. 萬斯白作的「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在貴報上登載以來，我差不多每天都不間斷地接看下去的。這的確是一篇耐人尋味而有歷史價值的記事。因為以歷史的背景，用輕鬆的文筆寫出來的作品，是最能吸引人的。十二月一日和二日所載的一章「張作霖是怎樣被暗殺的」關於這件事，同學徐君會告訴過我。現在對證之下，原來所載的恰和徐君所說的相符合。由此可以證明這篇故事是確確實實不能的，不過還有一點補充的材料，特記錄其所述，以告讀者。

我（我的同學自稱，下同）曾經在東三省住過六年餘，因為我的父親是在吉林某縣的郵局做事，我這回來是當「九一八」爆發之後，大約是在「九一八」未發生前的二年罷，我的父親聽人家說有一張很奇特的影片，在日人創設的一家戲院開映。而且僅限定日本人和朝鮮人可以進去觀看。中國人和其他任何國的人都被拒絕。我的父親因了好奇心的驅使，就約了一個日本友人，改了服裝，扮作日人進去。影片上演的，大多是些表示「皇軍」的「榮耀」的新聞片。其中就有暗殺張作霖這一幕，據說這確是當時實

地擡來的，一行列車載着張作霖，在將近一座橋洞時，日人預先佈置妥當了的大量炸藥被電線導上，有一條長的藥線接連着。一端由一個日兵把持着，待到張作霖所乘一節火車經過時，藥線着了火，炸藥就轟炸起來了。結果那節車竟被震動得直站起來；而其他各節車倒安然無恙，預是完全因為日人事先早已計算得正正確確的成績。

我寫這封信的目的，一方面是證實這一段記載的真實性。而另一方面却是希望「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這一篇故事能在貴刊中登載到底，不要中斷，並且還希望能在貴刊中多登載一些這類的作品。完了，敬致
民族解放敬禮！

讀者盛嵩上

二十七年十二月八日

第

一

章

一 入中國籍的意大利人

從一九一六起，在我遠東做間諜工作的幾年中，我認識了許多中國的官吏。其中東三省的軍閥張作霖大帥，就是一個。他知道我工作的性質，有好幾次，要求我報告他一些在俄國的中國人生活的實情，以及供給他一些其他有用的情報，那些材料我是很願意分讓給他的。他又一再對我說，倘然我決意好好地留在東方的話，那他喜歡我去替他工作。他的條件是很動人的。我將一般的情形考慮了一下。戰後歐戰悲慘的現象，使我決意接受那邀請，這樣，在一九二〇年的九月二十四日，我就加入了張作霖大帥的特務機關，張氏那時在滿洲，是人所共知的東三省督辦。

大帥對我第一個條件，就是除了黑龍江督軍吳俊陞之外，要我不得令人知道，我是在爲他工作的。因爲吳氏是他的好友，我就從他那裏，獲得了一切命令和指揮。但表面上，我是應該使人仍舊認爲是爲我自己的政府，或協約列強工作的。〔註一〕。

〔註一〕在歐戰時，我是向敵軍情報處雇用，在滿洲蒙古，西伯利亞等處從事各種指定工作的。

當我聞或要在滿陽去見張作霖太帥的時候，就纏得在晚上，裝扮得像一個中國人，穿上了馬褂，戴上了那頂西式的呢帽，拉下了遮沒着視線，就由他的一個親信伴着同去。

我爲大帥工作了八年，使我很高興的，能在這裏說。我覺得他是一個高尚且勇敢的人，他肯出自由，對他忠心的下屬，他是一個絕好的上司；但對於犯過背信的人，却嚴厲非凡，尤其是對於那些假裝着爲着痛恨。

在俄國、蒙古、高麗、中國那幾年內，我是以不同的名字，用不同的護照，去執行我的工作的。這是這套勾當中必要的一部份呵。

我的指定工作種類很多：搜集政治情報，注意別國特務人員的動靜，偵察土匪和偷運軍火毒物的人，密查將那些從革命中逃亡出來的白俄青年女子而販賣出口的人，以及阻撓日俄方面活動的情形。

有時我一定要專心去做不同的公開的職業，或經商，使自己正適應當時的環境。譬如，在蒙古或遠金鎮或煤鎮的調查專員，當過籌備俄滿間交通商務建設鐵道的中國政府代表的秘書，得此便利，我就在一九一一年三月七日搭了第一次通車游俄了。在一九二二年，在滿洲里，俄滿邊境鐵路重鎮地方，一度中俄文報館當編輯；此後，在庫倫（即烏蘭增脫，Ulan Bator，或稱烏爾加 Uurga）外蒙古，做過各報館通訊員。

一九二三年，我奉命回國，受命偵查私販軍火，當時估計是有可贖兩數目。

開頭兩個月內，我是在山海關、秦皇島，以及沿京奉鐵路一帶的地方，我的努力不久就得到了收穫。三月二日我就第一次緝獲到五百支來福槍，那些槍械證明是意大利的出品，當他們要通過秦皇島口岸，在離山海關九哩地方的時候，我就將他們捉住了。在三月二十二日，我又捉到了另外一批一千支來福槍，在四月十二日，我的部屬，在北戴河附近又緝獲了二百支意大利自動手槍。四月二十七日，我在秦皇島海關下捉到了幾個私運二千以上來福槍的走私者。這些軍械，都是滿洲當地土匪所定來的，那些土匪與大帥逐漸感到處置棘手，因為想改善生活，榮榮國家，不能施行法律，維持治安，那其他的計劃就漸漸實現了。我的種種活動結果，大家普遍的知道了，同樣的有利關係的列強也週知了，當到六月間到天津時，我接到了意大利駐津總領事格勃利里（Gabrielli）的一個邀請，要我去見他一兩。

我去了，他就問我在天津預備做些什麼工作？我答他說我是來遊歷旅行的。

「別對我講假話罷，」他插嘴說，「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到天津來的目的，但我得警告你，你雖然是國當局出給你種種證明文件，你却還是意大利人，仍舊是在我的管轄之下的，假使我再發覺你有什么麻煩的話，我就要拘捕你，將你驅逐回國，現在就聽手罷，我是沒有什麼別的話要說了。」

我對於受到這種恐嚇，並不覺得奇突。然而我應該完成我的使命，要誠實地做去，不管那些違法案件。

國籍關係了。

在那一個夏季中，我所緝獲的，其中有數千支來福槍、手槍等，同時也是我所注意的，是另外搜獲了二百公斤（two）的嗎啡和海洛英，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公斤的鴉片。

最後，十一月十四日，得到了日本當局的完全同意，加上我的中國主人的支助，我在天津的一艘日本輪船上，搜到了四千多支意大利的來福槍，這些東西是預備裝到廣州去的。第二天，我在本地日報上，看到了一條意租界總巡署名的有趣味的文告，那上面說：「在日輪爲中國當局所緝獲之軍械，雖屬意國出品，然決非天津海軍營內之所有物。」

在十一月十八日十點鐘的時候，一位和我很知己的意大利警長來看我，當他很不安的對我說：「我親愛的高斯百，我因負有使命來此，因此不得不置友情於不顧了。總領事格勃利里叫我帶給你一個非常緊急的命令，並需立刻運行的。即要你在半小時內到車站，預備搭十時四十五分開赴上海的火車，你不准對任何人講，或以電話通知別人，你可通知你的夫人，你因要事，急需赴滬。但不能告訴她，你是受了緊急命令而去的。假使你企圖通知別人，那我是奉命得以武力押解你上車站去的。我的對財現在華在國子，我知道，我現在對你的行爲是非常不公道的，但是我是奉了命令而來，我得交差，我希冀能過過外國的華，並且幫助我不要反抗而拘捕你才是。假使你聽守偏的話，你答應在半小時內上車站，並且在這時間

內不和任何人通問，只依我所說的做法，那我就帶了押解的武裝衛士，到車上去等你在那裏。」

我除了接受這強制的條件外，實在沒有別的路可走了。我就答應了這可憐的傢伙，我只會靜靜地聽，我是緊急被召赴滬了。半小時後，我被鎖在一輛載貨火車裏，同行的有四個意國水手和一個可憐的奧官，名字叫羅美諾里 (Romano)。

十一月十九日，我們到達了上海，我就立刻被轉解到意艦 Calabria 上的密室中。

幸兒那艦長是個真正的意大利人，他立刻叫我去見他。我將我的遭遇情形告訴了他，他請派了一個官長，帶了一封信去給意大利駐滬總領事羅三 (Do. Ross) 信中說明他不便將意大利皇家海軍的軍艦讓別人做不正當的勾當，除非他在當天下午四點鐘，能得到一些扣押我的正式證件，以示此舉的合法，否則，他要恢復我的自由的，那證件終未送來，在四點零五分的時候，我就離開了那軍艦，被解回滬了。

兩天以後，意大利總領事 弗萊喬洛 (Fazio) 給法租界及公共租界當局，送去了一張拘票，請將拘捕名 A. 萬斯白者，一個 (Calabria) 號軍艦上逃上岸的水手。

那位上海公共租界捕房 美羅巡，是一位人格健全正實廉潔的人，就跑去見意大利總領事，說明他拘票上所附上要拘捕的 A. 萬斯白 的照片確是其本人的，那麼立刻就可以將那人捉獲歸案，因為 A. 萬斯白 先生這時就在總巡的屋子裏，然而必須請該領事校正那一逃上岸的水手，等字樣，因為美羅所拘捕的

斯白先生，是一個居留中國已十五年的人，假使，在另一方面，所要拘捕的又確是水手，那麼照片是毫無補益了，則必需再換一張照片來對證才行。

中國各當局也向意公使提出抗議，但在答覆中却說萬斯白是意國人民，對於萬氏事件，實與中國政府無涉云云。

這事就成了本地各報的通訊題材。天津意領事館則不允取消那押解回國的命令。於是爲使事情大白，我和捕房商量後，我就答應被扣，解送到副總領事弗萊喬洛那裏去。在各證人前質問弗萊喬洛，我是犯了什麼罪，他却回答不出來。他含糊的說是弄錯了，於是我就釋放了。

幾天後，我又被傳到領事館去，他們告訴我，說意大利公使要我離開中國。他們將爲我預備好船位，上船後另送五千元給我。我拒絕了這個提議。

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那天，當我經過鄧脫路的時候，一個人將我胸前刺了一刀逃走了。中國當局都認爲兇手是一個意籍退伍水手。另一個意大利人現在仍舊住在上海，有兩次企圖殺死我，做的三個白俄和一個印度人的同黨，是給嚴辦了。那俄國人是由哈爾濱中國法庭判辦的，印度人是給那裏英領事法庭判辦的。

不久，我又回到了哈爾濱，但不幸得很，我發現本國當局，已不能使我安居樂業了。我於是就離開了。

條出路，還在現在看來是不必要的，因為由於法西斯蒂的勝利，意大利的當局和精神，都給改變了，而我的決定，不但在當時對於我是嫌惡的，現在是更覺得抱憾了。

我變了中國人民了，我的保證人，就是中東鐵路督辦朱慶瀾及省特別區警察管理處處長魏永興將軍，和中東鐵路路警處長姚志曾，因為是中國籍的關係，我得到了攻擊違法之徒的便利，任何人都不許妨礙我的工作。

又有一次謀殺我的事情，這裏我將事件發生後，第二天報紙上所記載的剪錄下來。

哈埠謀殺間諜失敗

圖刺萬斯白印人已引渡

哈爾濱六月十二日特訊：本埠放映無聲影片之大西洋大戲院股東兼總經理萬斯白，上月被人行刺案，同謀印人名婆新者，業已捕獲，已引渡至上海英國當局，然主犯意人名麻福弗洛司者，則迄今尙未就擒。此項行刺陰謀，於十二月二十日發覺，英領事立即要求中國警察局引渡該惡黨，圖刺新以共謀罪由中國當局拘捕也。

然據一般觀察，對於麻福弗洛司仍在哈爾濱逍遙法外，未予拘捕，殊令人有莫測其神奇異之處。按萬斯白上海報界當局能僅及，在華有年，與濟南特務機關原有特殊關係，彼對於特務工作，功績甚鉅，屢置共產黨活動及偷運軍火方面尤具成績，此間來信行刺萬氏之陰謀，由於萬氏為濟南當局任工作，其中不免觸怒個人，至引起私仇報復行動也。

二 白奴販賣者

我回到哈爾濱，當了張作霖的特務員之後，一般違法之徒，如擾亂份子，走私的，白奴販賣者，以及一切下流社會中的人物，像我對付他們一樣，都公然向我挑釁了！

一般俄國亡命者，是在布爾什維克未報復前，就都逃亡到遠東了，其中百份之九十在滿洲住了下來，這百份之九十的中間，都是赤貧如洗的，好像搜尋野食的餓鳥似的。那幾白奴販賣者，輩輩上滿洲，哈爾濱，以及其他的城市裏來，從他們所謂「饑饉軍」(Terrors of starvation)中，選擇了那些相貌長得最好的少女，將她們帶到出處相宜的各國去。在我當特務工作和警官生活中，我所接觸到的這般人中間，我發覺有一批人是最有權力，最難對付，組織最嚴密，最有錢的，就是這批白奴販賣者的大行徑。我們所拘捕到的，結果總是給他們賄賂了法官，消除了罪名，而逍遙如故。目前的情形和十年前一樣，白奴中的真正霸王，是一個反動的保皇黨俄人。他被捕過二十三次，每次都是證據充份，無法辯護的，但是他二十三次都是用了保證金交保，獲得了自由，一次的保銀，有時多至二萬元至二萬五千元之鉅。

情形如此的糟，因此滿洲當局再好不管這種罪惡案件，否則就得用起法律的行動，來對付他們。總管

這種臭惡賣買的許多外國人，是以治外法權作其護身符的。有二個瑞典人，在他們到了哈爾濱的一兩年內，竟成了滿洲的恐怖份子，他們在哈爾濱的車站上，給我的夥計們捉住了，和這兩人同行的是一個復讐面的女子，是被押解上天津去當「官太太」的。明知合法手續是無用的，因此指示了我的夥計，將這兩個人送到鐵路線的邊界處，將他們綁懸在那裏相近的電話桿上了事。

一九二六年哈爾濱莫迭爾飯店 (Hotel Moderne) 來了一個衣冠楚楚的法國人，他租下了兩間最好的房間，不久就在各報上登出了啓事，招收年齡自十八歲至二十二歲之間之女子，合格者可給她打字員的位置，待遇優待云云。我派了幾個夥計，暗中注意他，發覺他在二十四小時內，已有二十人以上去應徵了，他給每個來應徵的人二十元錢的臨時維持費。我自己就跑去見那個法國人，發覺他已經快要離開那旅館了。我告訴我有兩個女兒，很想謀到適合的職業，在未將他們帶到他這裏來之前，我自已想知道一下，這種徵聘是否可靠，其薪金又是否公道，那法國人對我望了一望，問我知道他是誰。「我是上海法租界當局秘書呀」他說，「這是我們公董局要用的，我要用的是許多打字員。」（事實上，後來知道他是真法租界絕無關係的。）

「但是我的女兒不懂法文的，」我回答說。

「這並不重要，上海的法租界，那是已經有二萬以上的俄國人了，我們的行政工作，對於懂俄文的人，

比懂法文的人更加需要。」

「好極了，」我說，我的回答是對他那樣講的：「這就是我要知道的事。這是我的名片。倘然你今天晚上九點鐘那班火車不離開哈爾濱的話，你別後悔生命不保。我得明明白白告訴你，在過去白奴販賣者都失蹤了，而且查不出痕跡。」

那個法國人當夜就跑掉了……一個打字員都沒有給帶走。

因日軍進犯了滿洲，我和白奴販賣者的戰鬥，立刻被停止了。當了日人的間諜，〔註〕我就不得不顧到我的高級上司，他們所允許開設的妓院，以及出口人肉市場的「集中營」的一宗大量收入哩。

在日軍佔據滿洲的初期，有一天晚上，我的夥計們在齊齊哈爾地方，在一輛運貨車上，聽到了一羣哭聲，將那車門打開一看，其中是一個名叫羅森堡 Rita Rosenberg 的婦人和十一個俄國女孩子在一起，其中兩個人已經凍死了，她們中間的年齡，沒有一個是滿十六歲的。這些女孩子，是那婦人費了幾塊錢從農家買來，預備帶上天津去的。這婦人當夜就給押拘她的牢獄裏的守獄人，在獄中凍死了。這婦人從那些痛苦的同類同族人的身上生財謀利的行爲，其血和肉的慘象，是到了有過之無不及的程度，實在令人無法

〔註〕那時我是被迫非加入日軍特務機關不可，以後在本書第三章內將說明。

看得下去。那個看守她的中國人，不過是將她償付了她自己的孽債呀……這是我對自己的一種解釋。第二天對於這件事，絕不提的……連我自己也不提到極了。

三 張作霖是怎樣被暗殺的？

從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像我在前兩節中所敘述的，我在各上司中最好的一個上司張作霖將軍之下，用了不健全的工具，爲法紀治安而苦鬥着。

張作霖是一八七六年，生在奉天一個小鎮海城的。那是東三省極南的地方，關於他年輕時候的故事，簡直有些像神話，甚至有人說他有一次，跑到縣知事衙門裏去，責罵知事欺侮貧苦，不等到衙門裏的下屬兵卒集合起來前，他一手就將那知事殺死了，然後宣佈了罪狀，在衆人驚魂未定之前，他就走出門跑了。

在日俄戰事期間，張作霖加入了日軍方面工作，破壞俄國方面的交通。日人對於他的工作是喜歡的，在戰後北京清庭中赦免無罪，並任命他爲其本鄉奉天省都督一職，便可見一般了。從那時起，開始了滿洲運送的記錄，以及張作霖本身的享通官運。最後，在一九二二年，他第一次離開滿洲，參加了北京附近的戰爭。然而，他的軍隊給吳佩孚的軍隊打败了，他就將自己的軍隊撤退到滿洲，並宣佈現在所謂的偽「滿洲國」東三省的獨立。

他是一個很好的行政長官，也是一個毫無仁憫心的專制人極。他既無教育，又無修養，但他具有二種

特殊的聰明和超人的記憶力，這就造成他的地位。張作霖主滿洲時的農人，和鄰近的中國及高麗省者比較起來，那是舒服得多了，甚至像俄國那樣，一個千萬人口稀薄的地方，其中只有五百萬是自給自足的，滿洲到張氏死的時候，是一處具有三千萬人口的富饒之區了。每年，整千整萬的中國人，甚至別的種族的，到滿洲來幫着農家收成，並且就在這裏住下了。

對於那般操縱錢票市價的本地銀行錢莊老闆董事們的處置手段，便可作為張氏性格暴燥的一個實例。在瀋陽的一個議會中，他邀請了九個這樣的人物來開會，這般人到了，張作霖給了他們一番訓話，那種坦直的詞章，可成爲世界紀錄的，他說：

「我是很明白的，我想你們也和我一樣明白吧，你們操縱了滿洲錢票市價，發了大財，害死了農民商人。我以前曾經警告過你們，要你們負責，但是你們沒有做到，現在你們就聽我說吧：假使在你們的地位，而做不到糾正這種投機勾當，那是你們的無能，倘若你們做得到而不去做，那是你們罪過，隨便什麼情形，你們是該死的。」

五分鐘之後，九個銀行家的頭，就滾在張作霖園子裏的地上了。

許多年來，張將軍是有目的地作弄着日本人，在許多次事件中，他是利用着他們，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郭松齡將軍通電討伐張作霖將軍迫其下野。這種通電是中國的「政書」

們所喜歡的。就在同一天，郭部發動精銳部隊，出長城而向濟陽進發了。張氏守軍是沒有準備的。

六月十八，郭部已迫近濟陽不遠了。張作霖將軍積極行動，運動了日軍，叫他們增防濟陽鐵路。同時通知郭氏部隊，不得近南滿鐵路二十里之內，這意思就是說，濟陽保持了。幾天後張氏將部隊整頓了一下，加上了配備，同時又給一師日軍，都穿上了華軍制服，出擊郭部，這一戰，他獲得了大勝，郭氏及其妻妾即被捕下獄，二人立刻就給他槍決了。

一九二六年，張作霖將軍受了日人的慫恿，進犯北京，他在那裏統治了兩年。在這期間，國民革命軍的勢力已傳播到全中國。在強有力的領導之下——最初是共產黨，後來是蔣介石將軍，勢力已達到了濟南府。在這裏，蔣氏的軍隊，遇到了佔據膠濟鐵路的日軍相當程度的抵抗。但張作霖將軍復能看風氣色地，重想回滿洲了。留守東三省的張氏至友吳俊陞將軍，也促其回去。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九日，北京日使却警告張氏勿回滿洲。這也許就是使張氏於五月二十六日，毅然立刻搭車回濟陽去的直接原因。

五月卅一日，張作霖將軍的東京特派員——司濶哈特(S. J. H. Hart)，急促地警告張氏，萬勿搭火車上濟陽，因為他已得到某種情報，張氏將在路上給暗殺掉。但張氏對此謠言，並不相信，並且將這謠言辦了日軍司令部的一個官佐。那人笑着回答說，爲了證明此行絕無危險起見，他本人可與將軍一路同坐一節

車到瀋陽去搭的是六月二日午夜從北京開出的一班車，我也在那車上，這班車判斷了張將軍的命運，但我自己因為要在天津調查某項問題，所以到了那裏便下車了。日軍當局請吳俊陞將軍，在六月四日那天到離瀋陽車站南二十公里外去接迎張氏。吳氏偕同幾個幕僚準時而去了，他接到張氏，就和張氏同車回瀋陽來。火車將到瀋陽前十分鐘，那個同車的日本官佐，他到此刻為止，並未失信和張氏一路上是同在一節車上的，到了此刻他才站了起來，說要到隔壁房裏去佩好戎裝軍帽了。事後發覺，他是跑到最後一節車裏去的。因幾分鐘後，當火車穿過一座橋洞，突然間神祕地爆發起來時，他是比較的在安全的地方。這顆打着張作霖和半路上車的吳俊陞將軍的火車，被炸燬了，一共死十七個人。張作霖將軍受了重傷，過了幾小時就身死了。

日軍是暗殺張氏的主動者，這是毫無疑問的。炸藥是放在那橋下的鋼架下的，這裏中國護路守衛本來是值崗的，但在幾天前却用日軍去代守了。

張作霖將軍死了，他的兒子張學良便承繼了他父親的地位。但他是同情新中國的革命的，他主張有一個直接反抗日人的政策，他始終不聽那位滿洲軍司令長官楊宇霆勸他慎重的忠告，於是日人實現他們計劃的日子，是不會再遠了。

第

二

章

一 日軍佔領瀋陽

從張作霖將軍死的那天起，我整個生活改變了。我在滿洲軍司令楊宇霆將軍那裏做了一年多工作，覺得要貼補過去自己不正常不確切的收入，我非要去做種種經商的事情不可。在這方面，我比較運氣還好，但我的生命却常常在危險中。後來所遭遇到的，那是更糟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夜，南滿鐵路界線內的日軍，迅速且十分有把握地，進襲中國領土，佔領了瀋陽，以及城內的軍械廠和飛機場，又屠殺了在如此短促時間內不及防備的中國軍隊，他們簡直沒有機會作一下自衛的反攻，這就可見日軍預定計劃的一般了。河本中對於事態的解釋，却發出如下的宣言：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夜，余適率士兵六名，沿鐵路線巡邏，余等突聞近處發生爆炸，余等即發洩鐵路已為炸毀。當余等查察此事件時，有伏於附近之華軍約百名，即向余等開槍，余等即與離此約一千五百碼處之第三支隊官長，取得聯絡（如何得取得聯絡，則未予說明。）此時聞自瀋陽開出之長春特別快車開近來此。為避免發生危險起見，余令士兵開槍數響，此乃予開車者以信號也。然車仍繼續前進，經過爆炸處時，並未出軌，至為奇妙。列軍固得準時到達瀋陽矣。」

這是向社會公佈，給國聯代表團看的日本作品。

但在另一方面，發給日軍官兵的一本小冊子，那又是照例的說是大照大神——太陽女神——的威靈，以保佑日本民族進展的，其中說明如下：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瀋陽附近，前會黨馮麟趾的張作霖之子張學良，被會黨化滿洲，奴隸人民有年，竟率華軍若干名，於近瀋陽之日本鐵道上，埋置炸彈，企圖傾覆數分鐘後自長春開往瀋陽之日本火車。幸有士兵六名和川本中尉適在該處。按川本乃武士階級之四十八世直裔，見車已開近，知非人力得免此災難，因路軌已被毀數碼，彼惟訴諸於神矣。面向日本，虔誠跪伏，祈求「太陽女神」之援助。彼虔誠之祈禱已為所聞。車經路軌被毀處，即自行昇至空中，越過危險處後，復安落於彼端，繼續前進矣。此事開車者，車中火夫，以及川本中尉與其六名士卒，均親眼目睹者也，此實可為超神體力之鐵證耳——此可予世人以明證，吾日本人民之為神之後裔也。」

但在國聯調查團尚未調查種種事實之前，事件的真實情形，決定是這樣的：路軌爆炸一定是發生在火車開過之後，是專為攝取這種照片而佈置起來的，以便符合日方所擬造的事件發生的本源。

中國人方面對於這種爆炸案，不但沒有關係，並且這種事件企圖的掩蓋，可說也一樣沒有。而大體上的軍，却如此運般的，在他們的營房中的床上，給人家殺死了。他們的槍械是放在另一所屋子裏，當時可

說運送一件武器的時候都來不及，後來那營房給放火燒掉了，這個陰謀的罪狀，一些痕跡都不給人找得到。

但是，最能令人信服的證明，就是駐在濰陽、營口和鳳凰城的日本軍隊，在「一件事」一發炮轟之後，已接到命令，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時，開到濰陽，即在那做作好的爆炸發生七小時前，日軍已準備好出動了，於此可見「一件事」的性質，是一種預定的計劃。九月十九日上午四時，在那做作的爆炸發生前，僅六小時後，成千成萬印就的告示，已經貼滿在濰陽城內了。告示上宣佈滿洲政府是因為下令濰陽城內的日軍，所以給傾覆了。告示人民各自安份。要在種種事情證實後，於六小時內，將這許多告示都拿出來，後再印就分發出來，這是人力所不可能的呀。

有一個俄國退伍軍官格萊奇 (G. G. G.) 將軍，他曾一時為孫作棟將軍所用，後來因為孫將軍與政府有關係，給辭退了，蘇維埃政府那時就任用他，但因為他又和日本發生關係，所以立刻又被辭退了。他在十八日那天，也收到了一份上述的文告，那是直接從日本高級司令部發給他的，並且另附了一份傳單，說是為了濰陽俄人的好處，令他在他的主編的俄文報上發表出來。（這命令被嚴切地執行了，於九月十九日黎明，登載着這個文告的俄文報，便在濰陽滿街滿巷的出現了。）

在這一星期前，形形式式的日本工程師、電機師、機械師、礦務師、礦口裝置師的電氣專家，已調集了。這種種

設是從沒有人計劃過的，也毫無用處的。這班技術人員目的是來代替營滿兵工廠的中國員工，那些中國員工，就在十九日那天，當他們各自在工作時，一個一個給日人槍殺了。在那天晚上，鐵路地帶的日軍，以及從高麗開來的日軍部隊，都開到滿陽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滿陽「事變」四個月後，日軍開入了北滿重鎮哈爾濱。

經俄人經營後的哈爾濱，那倒有些像個歐洲城市了。在日本佔據的時候，這裏一共有十萬俄國人，二十萬的中國居民。這裏是滿洲最重要的鐵路交通中心，是俄國、高麗、中國、滿洲各條鐵路的總樞樞紐。

那天上午十時光景，開關的砲聲，和拍拍的機關槍聲，愈來愈響了。日機在華軍營房上飛翔着，並且播死了幾個無能為力不攜槍械的中國士兵，那些士兵是逃命的。在還以前的兩星期時候，一切商業早已停頓，街上從那時起也早已人跡全無了。人人都困在屋子裏。又有十萬難民在這裏，是從其他日人佔領區逃來的。他們使城裏的人口激增，他們遭難的故事，使每個人心裏都驚懼起來。

到了中午，槍砲聲忽然完全停止了。二點半鐘，就從各方面開到了大批的有邊座的機汽脚踏車，以及機關槍部隊，跟着就是騎兵隊，鐵甲車，及護車，以及坦克車。當機關槍部隊經過街道時，站崗的中國警察，就給他們解除了武裝，在那崗位，另外派了二名日兵來替代。在這清道工作進行時，幾千個俄國亡命者跑到了街上來了，他們手裏執着日本旗，嘴裏叫着「新軍」叫着「萬歲！」又做起了許多俄國女孩，來迎接

從俄國革命爆發後，整千整萬的俄國人逃難到滿洲來，他們到了那裏，是一律遇之黃昏以讀的。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二年間，沒有一天不是一大批一大批的俄國難民逃到滿洲的。不管他們中間是有護照的或沒有護照的，犯罪的或守法的，一律都受到了熱忱的招待，個個都幫着他們安置下來了。現在住在上海三萬光景的白俄，大半是從哈爾濱來的；這些事實，他們也許理會得到的。滿洲當局極其所能，設法解除他們許多因對俄國政治反動而犯的種種罪名，有好幾千人使他們在政府機關內，軍隊中，書務上，鐵路中，礦穴裏，以及其他各種不同的事業中，獲得工作，而且十九是中國人要他們去做的。當俄國難民組織各種團體時，他們不但得到了中國當局的特許，甚至得到了滿洲政府的津貼。俄國難民又有權參加商會會議；他們且被認是商會的會員。

但是現在呢……他們回轉頭來攻擊他們的主人，向侵略者歡呼「萬歲」！在這種下賤的擁吻握手表現的背後，其動機到底是什麼呢？那簡單得很，就是想在滿洲成立一個白俄政府。這就是他們的夢幻，而在日人方面，爲了取得這一批二十五萬擁護者的好感，答應幫助他們實現這一件事。

可憐，愚蠢，自欺欺人的笨貨呀！他們那種「萬歲」的呼聲，是多麼短命啊！無情的覺醒立刻來到了。日寇到後，不上幾個星期，成千成千的俄國難民逃出滿洲了；又有成千成千的下了牢獄，成百成百的槍槍被或謀殺了。事實上，又有成百成百的俄國女孩子給日軍姦淫了。和中國人交易而得來錢財產業，轉到日本人的手裏去了。

大事搜查之下，幾乎每次都弄到被捕，下獄或死亡，這是當時的實情。日軍官是發財了。這是熱心向勝利的侵略者歌功頌德的俄國僑民，所得到的報酬。贈給野蠻流氓的彩球，回報的是滾開和死亡。

現在整個滿洲內部，每一個日本人都冒充頂替了別人的名義，有一兩個娼婦或小老婆了。年輕的俄國女子，強迫以五塊錢一月的工資，在日本人家裏做女傭。對啊……可憐你欺人的俄國人，現在叫你的「萬歲」吧！明天啊，你會因為替這些毫無人情的鬼魔喝彩叫好，而得到報應的。

有好幾天功夫，日軍是繼續不斷地開到來，於是奇奇怪怪的謠言，四面傳開了。人們都大起恐慌和震懼，互相偷偷地談論着許多被殺的事情，千千萬萬中俄國人民所受的暴行。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早上，在離日本騎兵營不遠幾步路的地方，我看見兩具中國女孩子的屍體，她們是被絞死的。一位中國先生，很勇敢地向報警機關，說他看見有二個日本兵，在前一夜將這兩個女孩子帶走的，結果那位先生就被捉住，從此……

同一天的晚上，一位山里門夫人 (Saiten) 是俄國女人，在街上給四個日本兵侮打，並且將她的衣服撕破了，使她一絲不掛的裸着身。

一天一天的下去，許多這種野蠻事情發生着，做了大家談話的主要資料。這是個恐怖時代。人人自危，個個都想離開滿洲。

至於我自己，我無所可怕的。在中國政府特務工作的許多年中，我因此時常和日軍軍事實局接觸，他們待我相當好。因此，我自問現在我又怕什麼呢？

我不是見過滿洲日軍司令寺內的嗎？他後來做了陸軍省大臣，現在是日本華北駐國軍司令。我不是也見過鈴木將軍的嗎？那時他是滿洲日軍情報處的主任……不是見過許多的日本人嗎？

我不是和天津日軍情報處主任田中大佐很好的朋友嗎？他會經營我寫過許多介紹信給日軍高級官員。

我甚至收到暹羅馬日本駐藏大使一封很好的信……證此，我現在對於自己的安全問題，又有什麼可擔憂的呢？日本人對我總是很尊敬的，想來他們以後還是照樣的。我並沒有聽到或見到什麼事，是使我起畏懼日人之心的。事實上我常替他們和中國方面，做折衝工作的。但我也自救了。且不久從那美夢中覺醒了過來。

第

三

章

一 遭劫的中國人

滿洲國政府以前所用的人員，多數被日寇強迫留任。繼續供他們使用。這是一部份的日本計劃。意思是使全世界和國際聯盟相信「滿洲國」的組織，是「滿洲人民」革命的結果，與日人全無關係，這樣他可以負責任。

十五萬日兵，一萬八千個日本憲兵，四千名特務警察的到滿洲來，是應「滿洲國政府」之請，以保護人民抵禦中國國民黨，布爾雪維克黨人，及盜匪的進攻的。

同時也是為保護人民抵禦許多敵人而來的，所以日軍控制了整個國政，掌握了一切事務管理全體的人民，在官場中，他們在那裏祇是做「顧問」，滿洲國共有日本「顧問」十萬人，每一部，每一機關，每一員吏，無不有一個或一個以上日本「顧問」，這些顧問控制了一切事情，向每一個人發號施令，為所欲為。

這羣「顧問」是些什麼人物說出來是很令人驚嚇的。

日軍踏進滿洲不久，任何日本人，不論三教九流，凡能說上幾句中國話或俄國話的，都做了「顧問」。

這羣日本人在北滿本來是幹什麼的呢？多數是罪犯，騙子，挺而走險者；走私商，毒販，妓院子的老闆。這些下流人物佔了在滿日人的百分之九十五。他們倚日本族權和治外法權爲護符，「偽滿」法律管不到他們身上。因此之故。「偽滿」當局爲求避免與日人發生「事件」，令警察對他們所行所爲都置諸不問不聞。日人既然這樣不受拘束，便無所不爲了。

「滿洲國政府」的第一批日本「顧問」就是這些寶貝貨色。

昨天還是地痞流氓，爲人所不齒，而且深惡痛絕的，一旦驟然高踞各行政官廳之上，有的對於中國人和俄國人握了生死大權，對於中國人和俄國人，他們是歡喜胡作蠻幹，無所不至的。尋常人要是不向他們納賄孝敬，便寸步難行，他們如果做得到的話，連人們呼吸空氣的權利，他們都會要收捐的吧。他們纔在哈爾濱抓到政權不到幾天，警廳的「顧問」便發令逮捕有錢的華人和俄人，勒索鉅款取贖，法院裁判案件，是非的決定權是操在「顧問」手裏的。自然是出錢最多的人，常得勝訴，窮人總是敗訴。

爲使讀者對滿洲的「日本」顧問「制度」得一更明白的概念，我以爲有從中提出一個人來，略敘一下其身世的必要，這是這班惡徒中的典型。

康士且丁伊萬諾維奇中村 (Konstantin Ivanovich Nakamura) 是一個日本人，如他的名字所承，曾進過俄國王室的。但是這並不能使他和日本人藉有什麼兩樣的地方，他住居在滿洲，在那裏已有二十

多年了。以理髮爲業，在哈爾濱的新安埠（俗名偏臉子）開了一戶理髮店。該區是警廳認爲名聲最壞的地方，但是中村並不歡喜，親自操剪刀剃刀來替人理髮，該店不過是一個幌子。他的真正職業是販賣嗎啡，海洛因，鴉片，並在距理髮店不遠的所在，開了一個妓院。

中國當局雖然爲求苟安，對於日人出售毒品與販賣婦女視若無睹，而犯罪有過甚之時，也自不得不有所舉動。中村的名字所以三見於哈爾濱警廳檔案裏面，就是這個原故。

一九二三年，中村非法結合了一個俄國女人，這個女人是寡婦，有一個十一歲的女兒，幾個月後，他娶了那個女孩。母親投訴的結果，警廳將他逮捕，引渡與日本領事。日本法廳認爲他沒有做過什麼事，沒有犯什麼罪，因爲依照日本法律，他「買」女孩的母親時，連女孩也「買」進。因此女孩便是他的私生女，於是一切解決。

一九二六年，警廳又有了關於中村的一個案子。這次是一個俄國人到他的店裏去理髮，被剪壞了髮，去五百元，醒來發現被盜，便往警廳投訴。像前次一樣，日本領事出來辦理此案，該俄人並未被解脫，而是自己喝醉了酒，中村又得逍遙法外。一九二八年中村因他又在妓院內蓄養十二歲女孩，被送於日本領事。結果他又得無罪釋放。

這樣事實都是我親自作證的。

現在中村已做了日本憲兵的總顧問，俄僑事務局總顧問，俄僑學校督察員，博拉其索爾（Saint Vladimir）大學的名譽副校長，那是日人爲俄人所設的一所沒有教職員的滑頭大學。

但是滿洲人民所該受的苦難，還沒有止境哩，他們被輾轉於無孔不入的「顧問」之下還不够，另有一場大難降臨照到了他們的身上，成千成萬的罪犯，有些大概是由「天皇」大赦放出來的，像一羣吸血鬼一般，蜂擁入滿洲，絡繹不絕。這些人形豺狼墮落到什麼程度，簡直是說不出來的，他們向各種人物挑戰，幹出種種他們可能做得出來的反對神人及自然的罪行。滿洲各大城市的街道，晚間變成不太平了。甚至日間也如此，在大白天裏，中國商人被大隊所謂浪人毆擊，劫掠日本警察絕不加以干涉。白種女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安全。被這些日本「天之驕子」剝成赤身裸體，肆行姦淫的，不可勝數，他們到處散佈着恐怖。這裏是幾千樁中舉出來的一個例子。

一九三二年二月念七日，S. K. 夫人連着他的十六歲的女兒走在街上，一羣日本浪人向她們襲擊，把母女兩人拖進一間日本屋子裏，先將母親姦淫後，又強迫她看着她的女兒被兩個人輪姦。

母女獲釋後，即向相隔不遠的日本領館憲兵出張所，一個下放軍官前，報告她親身可怕的經歷，與這個軍官一同值班的還有兩名憲兵，一個翻譯。

「你的女兒被強姦，你有什麼證據呢？」那個下放軍官用嚴肅的口吻問：

「我可以指出那屋子的所在，醫生是可以檢驗出來的。」

「好！我現在就要檢驗，請兩位都進屋裏來。」

母女運命走近了毗連的房間內。兩名憲兵據有了母親，而那下級軍官和翻譯（也是日人）則輪流那不省人事的女孩，事後，母女兩人都被捕，拘入「偽滿」監獄，罪名是無照賣淫。

事情差不多過了一個月，那不幸的父親纔從中國人方面得悉妻女的遭遇。他被迫出五百元取贖她們。日人收了款，五天後，即三月二十八日，日本軍專代表團傳他去見，對他說若他再有一個字提到日軍，便要槍斃他。

哈爾濱的俄文報甫行開始發表這類事件，日軍當局便發出嚴令，對於犯罪的人，不得用「日本」字樣，這即予以停刊處分。凡提到犯罪的人，都必須用「外人」字樣，所以自後日人犯罪，都一律改爲「外人」。咖啡店，酒館，酒肆間的老闆們，認日本浪人是一個纏擾不清的惡魔，白天或晚上，無論什麼時候，他們會成羣結隊的衝進華人或俄人所經營的店裏，令全班侍役，放下所有的工作來伺候他們，拿出大量的酒菜，吃完了抹抹嘴揚長而去，不付一錢。這種搶劫，也是日本憲兵的一種日常工作，他們甚或比浪人有過之無不及，因為他們不但強迫店主讓他們白吃，而且差不多千篇一律的，於臨行時，見到什麼覺得好玩，可以點綴營房的東西，如留聲機，無線電，氈布，美酒，安樂椅等等，尤其是金器銀器，都隨意搬走。他們特別喜歡

表。每一名日本憲兵都懷有野心，在駐滿期內，儘可能掠劫得多少就多少，所有這些「紀念品」都是隨日本時捆載而歸。

我每見一隊隊日本兵士由大連登輪回日本。他們全都帶有掠獲品，其中我指得出的是掛鐘，無線電，留聲機一類東西。

中俄人，尤其婦女，所受日本浪人，日本小兵，日本憲兵，日本「顧問」的蹂躪，實非想像所能及，異族入侵的歷史，其殘忍而無人道，再沒有比得上日本的入侵滿洲了。古時的野蠻人殺人劫貨，爲時甚暫，但野蠻的日人，却是緩緩地，有計劃的在幹下去。他們榨取受難者的血，讓他們休養一下，然後從新再榨過。

城市內的種種，雖然可畏可怕，與鄉間的搶掠慘狀相較，仍不免黯然失色，日兵所至，盡變灰燼，除屍體外，一無所遺，劫掠燒殺，無所不至，青年女子，全被姦淫，無一倖免。

世界各國把日本人當做文明人，實在大錯特錯，這是一個極悲慘的錯誤，其後果將證明是一場大禍呀。

要等野蠻打倒野蠻的制度，擺脫統治自天皇以下全國人民的無人道的軍閥，纔有資格列入文明國家軍中的，這一身野蠻人，挾了最新式的破壞工具，在和平而無防禦的人民間橫行爲害，一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慄。

二 我碰到了土肥原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一個日軍少尉和一名軍曹到我家裏來。那少尉用英語對我說，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大佐要和我談話。他向我鞠躬，一連三次，其神氣使我知道這項邀請，實際就等於命令，不過，我還想確定一下。

「勞閣下的駕，請報告土肥原大佐，我吃過中飯就去拜訪他。」

那少尉又鞠了兩三個躬，於是又用日本傳統的恭敬表示，低聲下氣的說：

「大佐要你馬上就去。我有車等候着，我當奉陪你去。」

給我猜對了，這是個命令呀。

我拿了帽子和外衣，便一同啓行了。

在特務機關裏等了五分鐘，有人引我走進土肥原大佐的辦公室。

我認識土肥原已有多年，當我在蒙古初次遇到他的時候，我的印象並不好。我記得他是矮個子，圓面

孔，身段結實，留着黑黑的小鬍子。禮數甚繁，繁得過份，外國新聞記者稱他爲「滿洲的羅梭斯」(The Ross of Manchuria)。

of Manchuria)按羅梭斯爲英國經營非洲的先鋒，以此稱士肥原即喻之爲日本經營滿洲的先鋒。是倘若不因他的妹子嫁給了一位皇族親王做妾，我疑感他的事業，多數必定會是一種空想。這次也和以前一樣，含笑向我寒暄。究竟是否出於譏諷或嘲弄，我却說不出來，我們無話可說，他招呼我坐下。他用俄語對我說：

「我喜用俄語說話，英語是要到絕對不得已時纔用的，我痛恨這種艱難的語言，也就和英美人於我毫無用處一樣。」

他沉默了幾分鐘，眼睛儘望着我。

「我們是彼此相識的，范士柏先生，是不是你還記得最後一次我們在那裏見面嗎？」

「倘若我沒有記錯，那是在天津。」

「甚好。你的記憶力真好。我聽人說你是非常聰明的一件事是用不着向你解脫兩次的。我們說到本題上吧。」

「過去有好幾次，日本軍事實局向你提議離開中國情報處，你總是拒絕。但是現在時勢已經改變了。我不是請你加入了，而是告訴你，從今後，你得爲日本軍事實局做事。如果你肯做，你應做的事很多，而且會做得很好。反過來說，倘若你所做不多，而且做壞了，是不消願做。他慢聲慢氣深恩的說——」以槍斃來證明有惡意的人，已成了我的習慣。」

他又恢復常態的語氣說：「范士柏先生，這是戰時，是否已宣戰，那是沒有差別的。你若企圖逃走，便算是臨陣脫逃，我們對於私逃是處以死刑。倘若你是獨個兒——在滿洲和蒙古僅有朋友，我認爲你要上中國本部去，是輕而易舉的事。但你是有家眷的。一家五口想逃過滿洲和蒙古的大山嶺，那絕對不是容易的事，你是懂得我的用意的。所以我勸你多打起點精神來，死心塌地的好好幹，你就不致後悔了。」

我對他的態度，表示驚異，並抗議說，我固然因爲積了些小款，想購一兩個戲院的股票，但並不特別想爲日本情報機關工作，不過倘若以厚祿相誘，而不以威脅相加，我或者可以加以考慮的。

他向我呼喝起來。

「我不是聘請你，范士柏先生。我是命令你，理由已向你解釋過，我想是用不着再費力來解說了。」

「你得在明天十一時到我辦事處來；我將帶你去見日本的滿洲情報處長。我相信你和他一定復合得來。等到你和日本人相處慣了，並深知他們之後，你會信服日本人要強上中國人萬倍，且遠勝於美國人或地球上的其他任何民族，任何歐洲人能得爲日本人工作，都應該引爲是一種光榮，你要小心行事，別忘記了你的舊友斯溫哈特（Winchell）的遭遇。你總還記得那件事吧？他是瀕死的，是不是，范士柏先生？」

斯溫哈特是美國人，服務於滿洲政府。他在日本被日本人殺死，屍身拋入海內，東京報紙刊的消息，却說他是遭意外溺斃的。

第

四

章

一 日本政策的解釋

第二天的十一點鐘，我邀約去見土肥原大佐，傳達報告回來以後，土肥原便出辦公室叫我，我們一同出外，穿過一個花園，走進與特務機關毗連的一所大房子。

這所大房子原是一個波蘭富翁名卡伏斯基 *Kawski* 者所有的。日本人奪了下來，拆去一堵牆，將其分作兩份產業，而在當中造了一個花園。

我們從左首一道門走進去，一進門是一個大廳，寫字檯後坐着五個日本人，土肥原用日語對其中一個說了幾句話，問答數語後，那個日本人，便點頭走進了一道掛着厚幔的門，幾分鐘後——他轉回來，帶着兩個進去。

我們進到一個大辦公室裏。在屋子的一角，有一個日本人坐在一張大寫字檯邊。他年約四十五，面容喜容，穿的是便服，目光能使最精明的人受愚。

我在這個特出人物手下做事的整個時期內，我從沒有發現他的姓名或他的身份。在任何建築，任何實會，或在其他任何人的家裏，我都從未碰到過他。他有一架飛機，專供他使用，要到那裏作特務機關的飛機。

就駕了自備汽車去搭飛機。無論在處外或處內，我如想作任何詢問，簡直是要以生命做代價的。我復知道，我未必不被人監視，我的任何可察舉動也不會不報告給他。那結果會立即處死，或竟有甚於此者。

有一次我很有理由的向他指出：猶太人究竟並非全是壞的，他幾乎當場把我要槍斃了。但是初次見他的時候，他却表現出一個溫良純善的長者，講得絕對流利的英語，且表示對與他接觸過的人的關切。

「肥原」先用日語向他致詞，然後轉向我用英語說：

「范士柏先生，這位先生是你的新長官。從此時此刻起，你須忘掉我的面貌，並且要忘掉曾經是見過我。我們如再碰見時，無論在什麼地方，你務須裝作不認識我才是。祝你好運氣。」他繼向那長官鞠了幾個躬，就走了出來。

這時祇剩我與我的新長官獨對，他在很細心的望着我。

「請坐，」他說。

他的英語，在日人當中是絕無僅有的。說得差不多純熟無疵，使人相信他一定是曾經旅居國外多年的，說不定是在美國。和他頭一次的會見，使我留下鮮明的印象，他所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我差不多全都記得。

「范士柏先生，我不必問你是何許人。我有全套檔案，紀錄着你自一九二二年時，在華北時期的

一切活動情形。日本情報處隨時隨地都跟蹤着你在中國，在蒙古，在西伯利亞，在俄國許多日本軍官，像中大佐，寺內大將在內，對你都有好評；這就是我們的軍事當局所以不認為你是反日的緣故。有些甚麼相稱你是親日的。無論如何，我們相信彼此是能互相了解的，並且希望你不要以加入我們的工作為難。土肥原大佐對於你說過任何不快的話，請你不必去理會他，在外國他們既稱他為日本的鐵腕，他便因為用威嚇的方式來顯出他的偉大。但是他在我手下做事已有多多年。我毫不猶疑的說，他自以為是鐵腕，其實他還差得遠呢。當然，他有許多事情，他曾做得很好，沒有人可加否認，但是他曾有過許多失敗，仍然是事實，他們失敗次數之多，使人會想到這是一個班長的錯誤，而不是一個日本情報處的大佐（註）的錯誤。例如，你認為炸死張作霖上將，是驚人的工作嗎？

我不知道怎樣作答纔好，我曾聽說日軍中彼此痛恨，且嫉忌甚深，但是我一向在滿洲這種機會場，反對日軍宣傳的結果。我雖然不信，在我與他們接觸的頭一天，我便被迫而承認這些謠言是確實的。因為情報處的處長既公開承認張作霖的被殺，係奉日本參謀本部的命令，並意中實指係由土肥原執行此項命令，對於這番事實，我還有別的什麼可以解說呢？

（註）土肥原在本書編譯時已升少將，到雲南會戰，以日軍第十四師團長在開封被圍時，復升為中將。

我吃了一驚，但是仍然沉默着不發一言。

「我明白，」那處長接着說，「你覺得奇怪我為什麼會這樣對你講。我承認日軍在力求使世界和國聯相信滿洲的獨立，是「民衆革命」反抗舊政權的結果，並相信日軍的來滿洲，祇是以「新政府」一「顧問」的資格，但事實則恰恰相反，你所知道的已經太多了，我無庸再來欺騙你。你我既將共事，我們自當坦白，並使你知道我們的進行程序，我充分曉得你的能力和經驗；你在滿洲已住了二十年，你熟知滿洲人民和他們最親切的習慣，他們的行爲，風俗及志願。我倘使拿我們日本代表向國際說的話來對你講，你一定會當面失笑的。」

他望着他的手錶。

「現在是將近十二點了。你可以去吃午飯，兩點鐘再來。屆時我當告訴你工作的大綱；我們是有着一個很大的任務要做的，再會吧。」

兩點鐘我再去時，我的日本新長官對我講了一課歷史，和一課對外人的論理學，他說的話大意如下：「試看英國人，」他說，「研究一下他們怎樣使幾乎半個地球聽進了他們的帝國，他們又怎樣用這種方法使征服地來償付他們征服的代價。印度一向在償付使犯者的一切費用，南非是如此，澳洲也是如此，一天做着英國的殖民地，便一天不得不償付駐軍餉錢的維持費。法蘭西都可以如此。古巴、菲律賓、海峽殖民地、荷屬東印度、比屬東印度、葡屬帝

現時都還在償付着脫離西政府統治的代價。我們日本人是一個很窮困的民族，不能擔負由佔據滿洲而花的費用。所以總得用某種方法，使滿洲的中國人來付賬，這是我們主要的任務。

「不過其間頗有重大困難之處，我們令中國人付賬，又怎能不傷害各國人及國聯的情感呢？我們倘若公開宣布已正式佔領了滿洲，事情自然比較容易辦，沒有人能非議我們。但是我們爲了種種原因，已經正式宣布，新「滿洲」國家的成立，乃人民革命的結果，日軍之來此，是以「顧問」資格而來的。因此我們固當設法使滿洲人民償付費用，但是必須做得無人能夠說我們使人民償付，或說我們得了多少錢。

「在戰爭中，一切能達目的的手段都是好的。我們在滿洲和其他所佔城市用過的方法，也要用之於哈爾濱和北滿。」

「我們的方法是：一、秘密准許獨佔與可以信任的人；二、間接強迫富有資產的中國人與俄國人——尤其是猶太人——繳出其資財的一大部份來……此事並須做得很巧妙，使他們永遠不知道這是日本人在強迫他們的，但實際上是我們得其實惠的。」

「主要的獨佔，可以冒充日本軍需品，利用中東鐵路（註）免費運輸貨物，鴉片烟膏專利，販賣毒品，這

（註）中東鐵路當時還是中俄合辦。

入日本媚妓；種權鴉片；開設賭館；及其他種種方法。

「誰有獨佔或專賣特許者，須納鉅額款項。繳了款項，方得我們保護。你須知每一個日本官員，兩三年後，都盼望挾資五萬至十萬回日本的。我們必須監視他們，尤其是憲兵官長，因為我們從前人民身上攫取得來的錢，無論多寡，全部都應該歸入日本政府，而不能讓日本官員送入私囊。

「這班軍官用盡種種可能的方法去弄錢。防止他們很不容易。尤其是憲兵軍官。日本憲兵多善復精；官長都沒有看得起，沒有人願與他們聯絡，甚至陸軍軍官對他們也避之若浼。在朝鮮及南洋，憲兵把持着整個司法行政，對一切人等握有生生死大權。一個憲兵軍官退役時，通常都有十萬至二十萬元存在銀行裏；而普通的陸軍軍官則幾乎連衣食都不够，我們沒有什麼辦法去對付憲兵軍官；他們都是少壯軍官，目的要將文武大權交還天皇。該派是一個勢力雄厚的黨派，他們無論做什麼事都毫不猶疑；什麼都不能使他們困難。若干大臣和大將想反對他們，都送了命。我們對付他們必須格外小心。我們不可正面攻擊他們，必須攻擊與他們聯黨的人，而使他們陷入孤立。」

我對這番話的坦白率直，驚慌得出神，其時那位處長燃着一根香烟，吸了幾口，把大窗口向外望望天，他抽了香烟，就接着說：

「在三兩天內，有我們所購的中國土匪五十人，將由海島乘船運來。他們將被運來地運城加入，再派

到一千至一千五百個在北滿方面肯奉行我們發出的任何命令的人。我們在哈爾濱必須招二十名強壯的俄國人，能勝任無論何種「職務」；他們須知道使刀用槍，並守口如瓶。最後，我們還需要十多名老練的扒手；人既精明，又善修飾，知道怎樣與上流人物往來。

「土匪有許多用途；對於某種大規模的活動，我們是少不得他們。例如，一經組織完成後，頭一椿事要做的，將爲阻撓哈爾濱與海參崴的鐵路行車，使其完全停頓，蘇俄將所有的商貨及巨量大豆都運往海參崴。這於我們大連的口岸是很不利的。那條俄國鐵路須由我們所屬在俄國邊界的土匪去加以攻擊，將有許多次的覆車，一次之後又一次，一直到俄國人不得不將他們的貨物經我們的鐵路運往大連。蘇俄領事館的那一條鐵路也要頻頻發生覆車之事，有時，爲裝模作樣起見，日本的鐵路線上也常覆車幾次。我們所屬的土匪還要做些可寶貴的工作；在俄國邊境上釀起事變；在滿洲的其他各地舉事；綁架有錢人，要他們的親屬用鉅款來贖票；攻擊中國鄉村，日軍開到便逃走，使中國人感激我們；替作攻擊日軍，使我們有藉口出兵討伐，並激退居民，將那些地方給與日本移民……還有其他種種用途。

「至於我們僱用的扒手，我們要用他們去搶劫僑居滿洲的外國人，尤其是來旅行遊覽的。這些外國人是不容易的。我們如果搜查他們，他們會接連不斷的提出抗議，那把我們麻煩得要死了。但我們總要偷了他們的皮夾或行李，他們便不見怪日本人了，是不是？」

「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及北滿其他地方，有許多俄僑團體，這些團體性質多數是反蘇聯的。至少是我聽說是這樣的。范士伯先生，你在滿洲秘密警察裏任高級職位已有多久了，你知道居住滿洲的各種民族的語言風俗，應該深知俄僑的種種方面，和他們的團體活動。所以我要你做一個報告給我，詳述每一團體的性質，範圍，程序及活動，以及主要幹部人員的履歷事略。」

「我想將不誠意與日本人友好的團體一一消除。我們還有一個麻煩的問題；即所謂文化人。他們是我們的障礙。他們阻撓我們的計劃。我們對於舊俄國那班將校，教授，貴族們要來幹什麼呢？他們是使人頭痛的。我們所要的是精明的青年，視某種官銜為榮耀，並且願做我們要他做的事情，我們需要俄國人的名字來掩護我們的活動——不一定要有思想的人。我們需要的不一定要過份聰明，我們需要有野心，有虛榮心，認為做得到某個團體的領袖為快樂的人。你的工作的一部，就是要在白俄團體中挑出這種人物來。你挑選他們，必須是一班貪婪和缺乏愛國心的份子。名單開好後，帶來交給我。」

二 處長的訓示

日本駐滿情報處長這樣向我講述日本政策大綱的時候，我將指派我的種種工作筆記了下來。

「等到這些俄僑團體改組完畢，得到了我們所挑選的人，做了每一個團體的領袖之後，我們將籌劃在北滿各地設立分會。每一部份都要有一個說俄國話的日本人做「監督」，做「顧問」，沒有他的允許，任何事情都不能做。我們改組後的團體，對於蘇俄人，尤其是那些住在鐵路區域附近的人去作對，那是特別有用處的。」

「我們每天都要和蘇俄人民或別的人挑起一樁事件。特務機關的第二科將供給我們可以隨意逮捕蘇俄人民，無論是共產黨或非共產黨——的種種材料。我們需要各種文件以供此項用途，我們需要那些滿不在乎謹言慎行的人。你必不可忘記布爾雪維克主義者是像野獸一般，應該用野獸的方法來對待他們的。」

「你要記得我是永遠不出場的；我絕不露面，除非是絕對與日本人有密切關係的。你的主要職司就是做我的居間接洽的人。給你的命令都是直接由我發出，沒有別人。俄國人或歐州人，無一得進進與蘇俄

公室或與我直接通信。這個規定，祇有三個我相識多年和能信任的人是例外。你是准直入我辦公室的人，可以不經過特許或通報的人。我給你這個權利不是因為我信任你，而是因為你是歸化的中國人。既是中國籍，我可以隨時將你槍斃。此外，我們扣着你的家屬為質，你必須忠誠盡職。」

他一面說，我一面靜聽着，隨時筆記下來。無論這位日本駐滿的情報處長說些什麼，或怎樣說法，我都平心靜氣，不動聲色的聽，這是做這個人助手所應有的態度。但是到我愈明白自己當做的職務和應有的性質時，我心中起了一種強烈的忿念——恨不得扼住他的咽喉把他弄死。他以這種口氣對我說話的時候，我覺得他滿以為我是永遠逃不出他權力範圍的。他冷峻的，深思熟慮的計劃，使成千成萬無辜而不能為害的人受苦受難。但是我深知抵抗是無為的，甚至犧牲我自己或我的家屬都沒有用處。日本的大輾路機，還是一樣會進行的，我依然不動聲色的一直聽到底。

那處長接着又說：

「還有一個最後的訓令。哈爾濱區裏住着許多外國人，英美法意等國人，還是享受着治外法權；我們須留心他們。許多是蘇俄的間諜；其餘的則為英美間諜。這些英美人須要時時加以監視。他們以為他們在滿洲家在遼東是享有特權的。日本每有動作，他們便要想出些不通的理由來干涉。我們日本人是不能讓蘇俄權利。美國有極的門羅主義；我們也有我們的勢力範圍，必須歸我保護。我們必須

蒙，不久之後，且連中國和西伯利亞以至遠達伊爾庫次克，將合併組成一個帝國，日本帝國由我們偉大的天皇統治；他是唯一可稱為天皇的皇帝，因為他是太陽女神的後裔，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天神之子。日本人是地球上唯一神聖的民族；這是不能與其他民族混合的理由，我們的文化是神聖的，日本的傳統事物，都是同樣神聖的，我們無意將我們的文明灌輸到我們征服或行將征服的民族。我們必須將這些民族消滅。朝鮮人將敗於惡行；中國人將成為鴉片及其他毒品的犧牲者；俄國人將將為疾病所滅。他們全都將歸於消滅。我們的帝國裏面，將只有太陽女神子孫做國民。而且這還不過是天神給予我日本民族任憑程序的第一部份。第二時期將為征服印度及太平洋各島嶼；又將征服西伯利亞遠至烏拉爾區域。對我運籌帷幄，你切莫非笑，天神是不撒謊的，日本的命運已由天神作成綱領條目。絕沒有人能阻止日本成為地球上最大帝國的。

一世界上別因為我們的內爭，我們的政治暗殺，我們的經濟問題而受愚。這些事情，不是實敗墮落的徵兆；却是愛國的表徵。有時我要你監視貪財的日本軍官，也切莫因此受愚。他們並未犯什麼罪，因為他們所得的錢財，都是從那些命中注定要滅亡的低劣民族中得來的；他們的錢財終究要帶回給日本，而歸還國家的。不，我們的希望，是要使這些錢財，以較敏捷，較直接的路徑歸於國家。外國人見日本人不肯讓給日本人還債，付租，或履行其他義務，覺得莫明其妙。這是因為他們不會了解日本人的根本道理。日本法實

自知他是天神的子孫，怎能強迫同是天神子孫去付錢與野蠻民族，以及命中注定要滅亡的民族呢，這種事情，在日本人是想像不到的！

「是這樣麼？」我用日語說。

「不，不要講日本話，雖然你會講；你講了使我起一種鄙視之心，我們日本人不喜歡聽外國人講日本話，聽了覺得褻瀆。日本話是祇有天神子孫纔得用的，這是太陽女神的語言，我每次聽到外國人講日本話，我恨不得要殺死他。我們還是講英語。沒有人會煩言的，人人都講的。講不愉快，不入耳的事情時，英語正是適當的語言。凡是我想罵人的時候，我總是歡喜用英語。」

「還有一件事我幾乎忘記說了。滿洲有四萬多蘇俄人民，其中兩萬二千是中東鐵路的員工，其餘即為小商人或在各工廠做工的，其中多數是共產黨，都是從事宣傳工作的。此事既然違反了日本的政策，我們必須用種種可能的方法，去阻害他們，我們絕無憐憫之心，絲毫不應示弱，我們必須把握着一個原則，即甯願處罰一千個無辜的人，不讓一個宣傳者得逍遙無事。倘若蘇俄政府不肯把鐵路權利出售與我們，日本人便要強行奪取，把這些可惡的野蠻人一一遞解出境。還有留在這裏我們所不能遞解出境的那些人，也要迫得他們不得不走，因為我們立意使他們的生活過不下去，以至使他們自願離開這裏，我們不能給他們有一刻安甯。」

「應該了解的一點，就是凡白俄都有充份的自由，並得用任何方式去對付共產的。每天共產的東裏都要被搜查，傢具什物可以被拋出門外，他們本人要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凌辱，直到他們弄得走投無路，離開滿洲爲止。

「除這些俄國赤黨外，北滿還有七千左右猶太人。我們處置他們的工作比較更爲困難。他們雖然全是俄國產，其中有許多會歸化別國，在法律上取得了別國的國籍，有些算是美法國民，其他則爲土耳其、意大利人、德國人、波蘭人等。我們當然不能直接而公開的攻擊他們，尤其是屬於享有治外法權各國的那些人，但是我們當間接地把事情弄得使他們受不了。我們倘因治外法權關係不能動他們的手，我們儘可以處置和他們做生意往來的人。凡查獲任何俄人或華人或外國行家交易，總要用別的藉口去逮捕他們，直到他們不敢再與外國行家交易才歇，這事要不了多少時候，因爲俄國人和中國人不久便會斷絕和外國商家交易是危險的。

「我給你的這些訓示，我也曾發給北滿日本情報機關的其他負責人。我是唯一能向你下命令的人，你也祇須向我報告，不必報告別人，你的手下絕對不能有一個人知道這些事，或猜疑你實在替我做事，我是你的上司。我奉那一個人的命令，你也永遠不會知道的，你的助手亦當如此；他們斷不可告訴他們的手下，誰是上司，奉了那個人的命令。我們的情報組織必不可像一條鐵線那樣，一環必不可與另一環衝突的。

而須各成單位，彼此工作協調，但無直接接觸。這樣一來，倘若敵人捕獲一人，便不會因此追究其他的人了。

「我看你在寫着筆記，這是很不好的習慣，記錄簿很容易遺失或被竊，信憑你的記憶力比較要好得多。我聽說你的記憶力很強，這是你的一個長處。現在你可以去了，明天就開始工作。」

「請恕我，」我說，「你會提到夥計和我的幫手的話，他們是些什麼人，又在什麼地方呢？」

「不必擔心到這一層。你自然會知道他們的時候。但是我還不能告訴你是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現時先做關於白俄團體的報告給我。」這樣說着，他伸手過來，我握了一握，便走出來了。

在我回家的路上，我覺得彷彿是在夢中。我剛纔所聽到的話，把我弄得渾沌糊塗起來。一切都好像是完全令人難以相信的，這難相信的，就是他對我說出了這許多內幕的話。這時我纔知道我所聽到的，而從不置信的日本在朝鮮的種種暴行，一定都是真的。過去四個月中，日本在滿洲所行的恐懼統治，原來也必定都是真的。我一向以為日本人是豪俠尚義的，以為是一個高尚博愛的民族，到這時纔知道原來是一個個層樓幻景，已消失得無蹤無影了。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怕人的殘暴，已摧下了所蒙的羊皮，面具已經丟開了，露出的是日本人的真實面目；原來是一個野蠻殘暴，是一個全無道德的民族，對於別人的痛苦，漠然無動心，這是一個破壞消滅數千百萬生靈，而無一顧忌的殘暴。

幫着他們武裝起來，而他們還大言不慚，自命爲「天神的子孫。」

我現在是和成千萬的華人一樣，被迫着去替他們工作，做他們醜形的附屬品。我內心裏起了一股亂的怒濤。我會想到去加入那些不幸的中國人所組織的游擊隊，他們雖然武器廣劣，服裝不全，却是勇敢無畏，決心打回老家，像他們常說的「捉猴子」去，而不肯屈服的人，但是一想到我的妻兒，又把我沸騰的精神鎮靜下來，又使我回復了理性。我若依了我的衝動去做，我的家屬，我那勇敢的妻子，親愛的兒女，喪逝的岳母，將成什麼樣子呢？在這些無人心的文明殘殺者的手裏，他們的命運，將如何呢？我無論願意不願意，總得盡我的一分力，耐心等候那準備會到來的時機吧。終有一天……在不久之後……我希望，假使在那天晚上，我早知道我的護釋之期，將遙遙無定，我或許已決定採行最極端的手段了，但我對於我前途的命運，却悄然無覺。我等候着一個能離開滿洲的機會，一直到了將近五年之久了。希望回復自由的心，使我忍受了一切身經目擊的恐怖，蒙受那些愚蠢狂妄，親眼目睹着那些大言不慚的日本人，使無力自衛的人，完全聽其魚肉，受其凌辱的種種慘狀。

三 我的第一件差使

從第二天起，我開始替我的新日本主子做事。

讀者應還記得，我當作一個關於北滿白俄團體的報告。團體是種種不一的，總機關都設在哈爾濱，滿洲各地設有分會。

主要的幾個是：

- 一、俄僑事務局；主席，柯羅柯尼奧可夫 (Kolokolnikoff)
- 二、俄僑交誼會；主席，柯婁波夫 (Koroboff)
- 三、退伍軍人會；會長費次比特基 (Verbitskin)
- 四、「俄羅斯青年黨」黨魁，基士立青將軍 (Kisitsky)
- 五、法西斯黨黨魁，柯士民將軍 (General Kosmin)
- 六、地產業主會；會長，甘達第 (Gandath)
- 七、證券交易所委員會；主席加巴爾金 (Kabalkin)

此外還有哥薩克騎兵的種種組織，及其他重要性較小或毫無重要性的團體。

在這幾個會長主席中，祇有兩個是日本人，意欲保留的，其理由很容易了解。這兩個就是俄僑交誼會的柯莫波夫和正統主義黨的基士立青。

柯莫波夫有一點為日本人看得中的，他已活到五十四歲，畢生未嘗做過一天的事。他的職業是任某個俄僑團體的會長主席或司庫……並借債。他除吃飽肚皮之外，沒有別的理想。他惟一快樂的事就是坐在筵席上大嚼可口的菜肴。他在這一點上名氣很大，俄國人討論他的政治傾向時，認定他是一唯食主義者。對於任何宴會，無論是法西黨，無政府黨，保皇黨，或任何團體所設的，他從未缺席一次。他的意識有無限的伸縮性，加以談吐風生，使日本人認為他是一個理想人物。

另一個是正統主義黨黨魁基士立青，却是保皇黨信徒，他希望基里爾大公辭得登俄國皇座。基士立青是一個無思想，好虛榮的寄生蟲。基里爾大公從巴黎寄種種勳章勳位與在滿洲的黨人，某人某人授爵士，某人某人授大勳位，某人升授某項官階，至於基士立青本人，胸佩十四枚閃閃有光的勳章，世界大戰結束時，以上尉銜致休，由該大公升到騎兵中將。爲了這個緣故，這個保皇黨員多數都做了將軍，得授各種俄國勳章。

基士立青的格言與喬治一世的一樣：肥壯的婦人。他喜喝俄國麥酒，日本人時時大置的供給他，喝之

不盡。他正是日本人所看中的，人任命他做了滿洲白俄軍總司令，蓋里爾大公都推他不倒。

說句老實而公道的話，基士立原是甘爲日人所用的少數舊俄軍官之一。大多數都南顧受迫，忍饑挨餓，甚至被捕下獄，而不肯丟臉去做工具。

俄國人會對日寇表示熱烈的歡迎，但是只消幾天，便看出日本人的本心。日本人被當作解放者而受歡迎，並未稍失時機，即露出其真面目了。

麥迪將軍的兒子尼柯萊麥迪，也像我一樣被迫留在哈爾濱。替日人做間諜做了四年，有一天他對我說：「共產黨員爲蘇聯做宣傳，沒有一個及得上在滿洲的日本人。」這句話是實在的，有下列事實爲證：爲逃避本國加害，來滿洲以求安全的俄國難民，每月有數千人向蘇聯領事請領護照回蘇，而不願留居滿洲，因爲日軍迫害他們，簡直使他們受不了。他們甯甘放棄白俄的信仰而改信布爾雪維克主義。就兩種選擇，他們情願受赤色的而不願受黃色的。現今俄國難民中，無論是已避入中國本部的，或尙留滿洲的，無一個不咒詛痛罵日本人。唯一的例外祇有日軍於入寇後從監牢裏放出來的俄國罪犯。他們得薩高城一萬歲，「否則便要回到牢獄裏去。」

凡具有自尊心的俄國人，沒有一個肯與日本人發生任何關係。這是很真確的，因爲日軍任命基士立青爲白俄軍總司令後，就找不到一個舊俄將領肯担任參謀長。他們於是祇好找出一個假人來。有一個既

窮且病，在哈爾濱大百貨公司前行乞有年的人，遂得膺其選；他從前曾在西伯利亞謝米諾夫的哥薩克軍帶過兵。這個窮苦不堪的可憐蟲，身患肺病且染有梅毒，被領去盥洗沐浴，穿上新衣。幾天後，公報上便發表薩爾尼柯夫已被任為參謀長。

其他俄人團體的會長主席，日軍命他們辭職，全都加以拒絕，如出一心。隨後便起了對付日軍所稱的「反叛」的苦鬥。經過幾個月，的迫害，有些是屈服了；其他的，如甘達第與加巴爾金等，則難遭受威脅，逮捕及無數的阻難，仍堅持了四年之久。直到一九三六年初，纔因日軍壓力過甚，抵抗不來，纔放棄他們的職位。

甘達第曾任阿穆爾省省長，雖已到了八十四歲的高年，還是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當一個日本憲兵軍官奉命到他家裏來拘捕他的時候，這位老人家胸脯佩了日本天皇贈給他的勳章出見，這是他任阿穆爾省長時所得，而且是贈與外人的最高勳章，這種高級勳章使佩帶者得免受逮捕，那個憲兵軍官見了只好鞠躬，倉皇而退。從那天起，凡遇白俄叛徒受日軍收買，用混賬的罪名告他，被傳去「滿洲國」法院答話時，他總是佩了日本天皇的勳章，並帶一名護衛同去。

像這樣的傳去問話，有一次是兩個俄國青年流氓告甘達第濫用一間私立學校的公款。這間學校是甘達第自己辦的，且自任董事已二十年。那兩名棍徒知道有日本人為他們撐腰，用教卑污最下流的話侮辱甘達第，雖然華人法官先是請求，後來禁止他們用卑污的話，他們還是一味亂講。在結束兩個俄國叛徒的

報告時，庭長問，甘達第想不想辯護幾句，甘達第站起來，用很低沉的口音說：

「對這兩個毫無價值的匪類所提的控訴，我拒絕答辯，看到兩個俄國青年，爲了一個月交三十五元的小數目，竟墮落到將其人格出售與日本人，我實覺痛心，這就是我所要說的話。」

甘達第離法庭時，法官陪他到大門口，對傳他出庭表示歉意，並複述常常說的那句話：「這種暴行，並不是我們中國人做的。」

第

五

章

一 匪首老「影」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我的上司命我上南崗 大直街 日軍司令部去，他說在那兒有人等候着我。到那裏時，使我驚奇的，招待我的是一個講得滿口流利俄語的中國人，他好像在他自己的家裏似的，很殷勤地款待我。

我們坐了下來，僕人送上了茶烟，在沒有提到正事前，照了中國的客套，彼此先寒暄一番，問我家人的情形等等……客套完了，他就突然的說。

「范士柏先生，你將要碰到一位你的老友。」

「我不拒絕我上司要我見的任何人。」

「很好；不過你所見的一夥人，是和上司沒有關係的，他甚而不認識上司的，他一輩子就不應該聽上司的。他要從你處得到上司的命令，從你處得到工作。爲了執行那些命令，你就給他所需用的錢，別的他可不必管。」

「很好！我在什麼時候碰到那位先生呢？」

「現在我們就去碰頭他，就請動身吧。」

「記住，一字不要提到我們的上司，或是日本人。一這是他最後的警告。」

我們就走了出來，一輛日軍慣用的轎車，在門口等候着。

我們坐上了車就開行了，經過了南崗大直街，就左折而行。車夫向坐在他身邊的一個人，說了幾句話。

我看出他們都是俄國人。

大約車行十分鐘光景，就在一幢一層樓的大屋前停了下來。

在門口有人等候着我們，當我們車近門口時，那門已經開了。

當我們走進會客室時，我們注意到四個攜着自動毛式槍的華人，在我要加以研究一下這些人之前，

一扇門開出來了，一個看上去很結實的中國人，笑着走出來見我。

我看了他一看，使我不禁驚奇起來。

在我面前站着的，就是那著名的王慶吉別號是林品吉，馬樹吉，和二十個別的化名；是在滿洲各地來

去游弋的土匪頭腦之一。

我的領路人說得對，王慶吉是我的一個舊相識。上一次我們是在朝鮮滿洲邊界上，一個叫王雲台的小村附近的小輯，安山裏見過的。我三名夥計，和九個土匪的墳墓是還在那裏，留下了我們一幕有意味的

會戰場所的紀念。那次王慶吉自己胸前和右腿各受到了一顆子彈，我將他捉住了，就將他送上了一處醫院，後來——據檢視他的一個中國醫生說，他是要死的。然而，他的惡貫——好死或暴卒，還沒有「滿盈」呢。中國的大土匪，都是有財有勢的人物呀。

四個月以前，他比以前更生動了，從牢獄中逃了出去，回到他所喜歡的老家去了。

現在就在這裏他是笑對着我哩。

他伸出手來，我們就握了一下。

王是勇敢爽直的人。他毫無畏色地公開的自認他是任何樣的人，以及他是做什麼勾當過活的。倘使日本人也能同樣坦白的話，那又何等的偉大呀！至少他們會得到某一方面的重視，而不會給全世界人罵他道德破產，無恥不法之徒了。

「范士柏先生。我真快活又見到你。」他說：「特別我想到了我們要在一起幹了，那實在高興得復。我得告訴你，我是已經將過去的一切都忘掉了。我們彼此都要忘掉我們會經是仇敵呀。從今天起，一切重生。」

這時，他回頭對站在附近的四個攜武器的中國人說：

「喂，各位弟兄，走前來！這位客人就是我告訴你們過的范士柏先生。從今之後，他是我的至友。因此，各

們就得尊敬他服從他才對。有人在他面前，敢說一個不恭敬的字眼，就是那個人倒霉。對你們講，這話說吧。記住我對你們說的話，這都是我的命令。誰不尊敬范士柏先生，就是誰在不尊敬我，你們都該明白，對於這種忽略他自己行爲的蠢貨，都是該殺的。」

「范士柏先生，這是我的四個衛士，是鐵石心腸的人物。」

四人一齊對我鞠躬，我們一一握手相見了。

在最近的二十天內，我和許多日本土匪握過手，這班土匪自稱爲軍官，憲兵，以及特務人員。我稱那些不怕承認自己是土匪的人握手時，到反體會到有一種輕快的感覺。

和我一同來的那個中國人，一直是默默無言。我不知他是何等樣的人。當然不是一個土匪吧。他的皮色潔淨細膩，他的指甲是留得長長的。這表示出他是一個並不做任何苦工的人。自然是一個被裏人呀。在介紹他自己時，他並不說出自己的姓名來，只說：「葉主任不棄，深以爲榮。」

王慶吉一聲吩咐，一道門開了開來，我們眼前是一張大桌子，上面放着富麗堂皇堆積如山的中國的精饌和俄國的 Zakuska（涼菜，小菜）。

「我想，這應該是個最好的機會，以一些不成樣的小菜，來酬賀一下我們重新會面，倘然承你看得起，就請你在此同我隨便用一次苦飯，喝一杯淡酒。」那土匪頭這樣說。

我們大家都坐上了席，第一件事情令我注意的，就是所有那些穿華裝的侍者，都是日本人。我還留在東方已有許多年了，所以往往能夠分別得這兩個人權不同的地方。

談話變得生動起來了。那土匪頭提到過去，許多次我們對抗的事件。他講到了張作霖將軍，以及其他中國閒人，其中有些人給他弄死的；他又談到了日本、中國、歐洲的政治問題。

我愈是聽下去，對他的尊敬心和欽慕心更爲增加起來。這樣一個匪頭，他懂得的實在多極了，我到此刻才服另一種眼光去看他了。

侍者中的一個，走近陪我來的那個人身邊——他始終沒有參加我們的談話——在他的耳邊，用日本語講了幾句話，然後他就轉過臉來，用俄語告訴我，有人要我聽電話。

「喂！」

「喂！范士柏先生嗎？我是特務處處長。你吃完了就來，我在等着你呢。」

「很好，先生，我立刻就到那裏好了。」

我回到了餐廳。那個中國陪客，托詞另有要事，告辭而去了，我送到門口，在分手時，我說：「我希望有再見的機會。」

「恐怕不行吧。因爲今天晚上我就要騎身到南方去了。」

因為我的上司，命我切莫向別的特務工作人員多問話，或其他和特務機關有關的事，我所以也不過問下去了。

回到席間，王慶吉令一個侍者取出香檳酒來。俄國的麥酒，這時使大家都很快樂，而王本人則興極很高。

他一再的說，他是怎樣的喜歡，得和我重見，而今後得在一起做事，更覺得大家前程遠大了。

「我要好好的做五年事情，到那時我有錢了，就退休了。我要到關內的外國租界去住了下來，我有許多朋友和舊夥伴在那裏。也許我要上外國去走一遭。現在，我一定要做事弄錢。受你的差喚，那實在是榮幸的。今天是一個新生活開始的起點，因此我一定要取一個新名字。從今以後，我就叫「影」對了，范士柏先生，你自己也應該改一個名字吧。」

「多謝你，那不必了，我還是一直用我本來的那個名字好了。」

「很好！我聽得人家說，cinquante 這個字，在意大利文中，意思是一種咬人的蟲，中國話叫做「蜂」，所以我們就叫你「蜂」好了……當差的來呵，樽滿酒來，我們爲「影」「蜂」祝禱，大家來乾一杯。」

我乾了杯。我於是說要走了，立刻一個侍者告訴我，說我的車子，在門口等候着。

「影」一定要送我到門外，請我最早的告訴他，我們一起要做些什麼工作。

我們互道再會就分手了。

我坐上了車子，看見坐在前座的，仍舊是那兩個俄國人。

二 發了狂的處長

幾分鐘後，我就和那上司在一起了，他笑着說：

「唔，你在王那裏很高興吧？」

「請原諒，王是死了。他現在的名字叫「影」了。」

「是的，那我知道，你現在是叫「蜂」了。」

「那日本侍者已經將我們的談話在電話裏告訴你了。」

他又笑着，當時他所說的着眼點是這樣的：

「現在，你聽我講，今後我們所稱呼的那個「影」，是替我們做二十年的工作了；然而他一輩子都不
能說，他是受了日本人的命令或差使或金錢的。不管他知道與否，總之，他替我們工作，我們對他是不問不
問的。事實始終是如此，日本當局是從來沒有對他說過什麼話的。」

我這裏聽得真怪吧。

「影」已經帶了三十六個人來了，每個人都已試驗過，是證明有靈的。於是我們要在他們那當口中

大約選出一千五百個本地土匪，去進行我們的計劃。他們要受命於你，真當每一個人，是和他們接觸的。記住這一點，對我和對於日本人，佩勿提到一個字。在各股小匪頭的心目中，要使他們認錯認爲自己是在替蘇聯政府工作的。其中有些人，則認爲自己在替美國人工作。總之，全在乎你，用一種更聰明的暗示方法，要使他們爲人變心到，這一班人是歐洲人僱用在那裏的，這是你的一部份的差使，即做我的中國人。大約十天光景，「影」就可以集合一部份人，使我們工作開始起來。

我已指令憲兵司令，另外招募一些不怕一切的俄國人是一種殺人不怕血脈，狠心的傢伙，這班人概不會說出什麼話來，又不會良心發現的。我原來打算，將他們直接由我自己來指揮，但我後來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決計將他們轉到憲兵那方面去了。

「這樣做的理由是我：是要避免直接和歐洲人接觸。真的，你是歐洲人，可是你是中國籍了。假使我把你槍斃了，那我是不必向任何人加以說明。並非我要想做這種事，相反的，我相信，我們是會相處得很好的，我在好久以前，對於你已有這種充分的信心了。

「這裏是一張憲兵司令部所挑選的俄人名單，你將他們都看一遍，再給我一個報告，或預備拿來和憲兵司令部的報告比較一下，隨便什麼人我都不相信，范士結先生，每個報告都是檢閱以後，重複再經過檢查過的。我要的，一定是那真正的真理。

「那些俄國渣三要幫着我們去箝制我們所不歡喜的某幾個有錢的猶太人和俄國人，我們不要管他們的財產，而把他們趕出滿洲。到他們走路時，要使他們只落得兩袖清風，囊空如洗。」

「猶太人並不全都是壞的。」我大胆地說，「我知道滿洲有許多猶太人都是至誠君子，規規矩矩做生意的，並且歡喜見到日本人到滿洲來。」

我的上司跳起身向我奔過來，彷彿想扼住我的喉嚨的樣子。

「你怎敢這樣和我說話，你怎敢替猶太人辯護？再像這樣多吐一個字，我便要扼死你，猶太人全都是豬羶！歐洲人全都是狗子，我們要把他們全都趕出中國和太平洋，就是爲了這個道理。但是猶太人更是些壞蛋。你敢說你不覺得他們是壞人嗎？你知道「Gentleman」這個字的意義嗎？是英國人創造出來的。英國人搶了一個人，他便成爲「Gentleman」，他搶了許多人，便成爲「Sir」（爵士）。猶太人全都是這種意義的「Gentleman」和「Sir」，因爲他們不做別的事，專是搶劫和他們交易往來的人，祇有日本人是他們不能搶劫的，但是在滿洲我還想更進一步，讓我們日本人來剝猶太人的皮。我開給你名單的那些俄國人，就是要替我們做這種下流事的人。我們日本人，不願污了我們的手，你爲什麼不看看我給你的名單？」

我把名單看了一看，一共有十個人。

「這裏面有你認識的嗎？」

「我差不多全都認識。他們全是些積犯，有許多案子都是他們犯的。」我回答。

「他們正是我需來榨取猶太人的那種人，你難道以為我是要僱用學校教員或牧師去幹那種工作嗎？」

他眼睛半開半閉的望着我，面上帶着譏諷的笑容，往下說：

「你知道……我對你是很驚詫的。我聽說你是一個十足的魔鬼；豈知不特不然，我卻覺得你是滿會橫行，滿腹道德氣。你是張學良和他的總參謀楊宇霆的紅人，你替他們工作時，你幹的是盤什那事嗎？張作霖是土匪，你替他工作了十年以上……應該使你變成第一流的土匪了，你說呀！」

我答道：「關於張作霖的出身與過去，有種種故事和傳說；事實上，多到我幾乎無法想起來。我聽說他這位將軍時，他是滿洲三省的獨裁主。滿洲是在他治理之下才成爲今日的皇家——中國進步最遲地方之一。二十年來幾百千萬中國人從其他各省移殖滿洲，墾荒於此，墾荒者實是一個惡魔。在張服務於張作霖手下的那些年內，我知道他個人從不榨取任何華人、俄人、或猶太人，不做如此，而且凡是他能證明任何政府員吏有榨取的行爲時，那個人的頭顱，便不能長久保存在他手上了。他對於楊宇霆，從不會命我去幹我認爲羞恥的任何事情。還有一層，如果你認爲我不會處理工作，如果像楊宇霆我太過憤，你爲什麼要強迫我工作呢？再沒有什麼能比得上，使我帶了我地家，離開中國去，是更難於想像。

快的了。」

「你和你的家眷，要留在這裏，」他堅決地說：「沒有一個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國人，得流亡到國外去的。他們可以在三件事中，擇其一而行之：替我們工作，去敵和尙，或暫去與槍斃。假使你這情形來臨，你必是一個歐洲人，你是不能去做和尙的；那麼你只有兩條路了！替我們工作，做一個滿洲的好公民，否則就槍斃好了。你住在滿洲蒙古，西伯利亞已經有十九年了，你是到處都很熟悉的，你明瞭這裏的人馬，懂得他們的語言和習慣；你也知道那一個是好人，那一個是壞蛋，你替張作霖做過許多有價值的事情，你是應該會替我們這樣做的吧。老實告訴你，假使你是單身漢的話，我早給你槍斃了，我實在不很相信你呢。假使你是單身漢的話，我相信你也許已經當了土匪幫的頭兒，且給我們許多麻煩哩。但是你有一門家屬要照顧，我敢說，只要我們將你的家眷看住著，你就會乖乖地忠心地替我們做事的。假使你做叛徒，你知道，你的妻子，你的兒女，你的岳母，將受到怎樣一種遭遇了。別再向我提起到中國去的話了，從今以後，只有一件事是給你去做的，就是執行我們的命令，別問你的良心，一切疑惑躊躇的問題，讓我們來負責好了。我一些不要你負什麼道德上的責任，你信那種宗教？」

「天主教，先生。」

「天主教嗎？照你這猶太人說好話的情形看來，我以為你是他們中間的人好吧，我們不談這個問題。」

了，還是講正經事吧。日本航業代辦所國際聯運會社，已經特准免費包辦中東鐵路上的一切用日軍軍需名義的商品運輸。那個代辦所爲了這種包辦，已經付了一大筆的款子了，這筆款子是日軍司令收下的，他就要給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保護，任何機關要低價運輸商品，都得向國際聯運會社請求。

「現在我們知道憲兵官佐方面，甚至陸軍官員方面，都常有和他們私人交易，低價運輸貨物，而將所收的錢，放進了他們自己的私囊中去。這是不應該的。我們不給蘇聯鐵路的運輸費，其中所得的錢，那都應該歸給陸軍庫中，而不該到陸軍官員的私囊中去的。當然囉，我們是不便去觸犯運班官員的。因此當你發覺了這種不正當的情形，你就應該設法去處罰那物主，並不是那班官員。你的夥計們，常要注意去查出那些不經包辦機關而運輸貨物的，到底是誰。當然那家代辦所方面，是會供給給你他們所有的各種情報，使你工作方便的。」

我放了廣插嘴說：

「但是蘇聯當局看到了大量貨物不繳運費時，他們又會怎樣說呢？」

「他們是不能說什麼的。鐵路是在我們的手裏，在日軍的手裏。他們能說什麼？假使要日本人付什麼錢給蘇聯政府，這簡直是一種恥辱。其次，中東鐵路不久就要歸我們的了。我們要廢了我們的定價去賣它，或者以武力來接收他。再說蘇聯政府，又是什麼東西……是一筆爛子呀。蘇聯的陸軍是爛子，他們的海軍

是騙子，現在我們佔據了滿洲，明天就要取華北，然後再取蒙古。此後，我們將告訴世人，蘇聯的統治者，是怎樣一羣大騙子呀。假使我們是願意出幾萬萬塊錢作中東鐵路代價的話，那麼我們的目的，是要分文不給的取得西伯利亞鐵道——連西伯利亞在內。我們一旦得到中國和西伯利亞，我們將拿我們強大的海軍，向南出擊，以進攻菲律賓，安南，緬甸，蘇門答拉，新幾內亞，澳洲，印度……。」

這個滿洲日本情報處長，在這樣概念地敘述日本取勝計劃時，他是這樣的興奮，他滿面酒氣，大有即將中風之勢。

沉默了一下，然後他比較和緩地往下講：

「明天下午六點鐘，你到大直街的陸軍司令部，去找一個曹增基，他會交給你五個影計，他們是在你直接管轄下工作的。五人中每個人都有十二個左右受他們指揮的副手。這班人，沒有一個是知道他們自己是在替你工作的，那五個影計，也不知道你是在替我工作。等到你和這班人熟悉之後，你就回到這裏來，我會給你別的差使。」

三 我會見我的夥計們

第二天下午六時，我自己跑到南台都去看曹增基。一個日本小隊長，帶我穿過了一個場地，走進了一間空空如也的大室中，讓我獨自等在那裏。幾分鐘以後，一個穿西裝年約四十左右的華人走進屋裏，
「是否就是范士柏先生？」

「我就是。」

「歡迎。歡迎。」

我們握手。

「請坐，請稍等幾分鐘吧。」

一個日本小隊長送上茶烟來。

我們坐下來，彼此客套一陣後，聽見門外一輛汽車停下來的聲音。

於是那個日本小隊長，走了進來報告俄國人到了。

「領他們進來。」曹增基說。

當他們走進門的時候，我認識其中三人，是俄軍的退伍軍官。

經簡單的介紹後，那個中國人就對五個夥計說：「這是你們的上司，你們要忠心地服從他，他屬於你們的命令，你們自己和你們手下的人，一定要謹慎地執行才行。你們的差使和酬報，是從他那里取的。他們是不受任何其他方面的命令或說話的。」

然後回頭來對我說：

「這班人是你的副手。他們是以第一到第五編號的，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姓的。現在我要走了。」曹增基就走了。

讓我一個人和這五個副手在一起，我就對他們講，「我現在給你們唯一的差使，就是要你們去，注意中東鐵路，一切以軍需名義免費運輸的貨物。除了國際聯運會社代辦所特准外，是不許再有別人裝運的。」

於是我叫他們在晚上一時，就在那個日本人指定的地方，作報告給我；那地方就在「日本軍事第二特派處」的同一所屋子裏，我是被指定住在那裏的。

我們分得手，我就一直上司那裏去。

「你覺得你的副手怎樣？」我一走進去，他就這樣說。

「三個人是我認識的，是退伍軍官；其他兩人，我不認識。看上去像是軍人模樣。」

「你的眼光很好，他們都是俄軍的退伍軍官，都是很聰明的，並非犯人。他們只做出主意的事，而不用強硬手段的。你將來自會覺得和他們在一起是很好的。」

「日鮮聯營會社，是特准毒品專賣的，在這裏哈爾濱的代表，是一個名叫竹內的律師。這個聯營會社，是有全權開設及辦理全滿洲的鴉片，海洛因，嗎啡以及高根鋪子的，它也有權核准華人開設烟窟，人家告訴我說，這個聯營會社是以幾萬萬塊錢給日軍司令，而取得這種專賣權的。現在是我們一部份的責任，去保護他們的利益，給他們納了費的應享有的一切保護。」

「這裏，日本憲兵，也想來染指的。他們會個別地去和販毒商，和烟窟老闆直接接洽，答應他們給其保護的。本市的警察，當他們發覺這是受到日本陸軍官佐保護時，他們是不敢對開這些鋪子的。這就使我們的工作複雜起來，是要我們去注意那專賣機關的錢，是只交給日本陸軍的人員手中，而不能落到日本憲兵官佐的私人口袋裏去的。你一定要命令你的夥計們，切實做到這一點。現在我們再來購贖。」

「賭博專利，是包括沿中東鐵路一帶的所有城鎮的，哈爾濱則為例外，那是賣給錦興全營公司的，那公司的名字是一金愛牌林公司（Kin-Ambartian Company）」

「這個公司有權在沿鐵路線一帶，至少可設二十個賭場。在哈爾濱，那裏有一個賭場，是受我們轉讓

的，其所得盈利，是同幾個和我們友善的俄國團體，兩下平分的。甚至在哈爾濱，我們也要保護聯合會公司的利益才是。

「關於沿中東鐵路一帶的娼妓，歌妓，舞女的專利權，那是已經賣給了一個日本聯營會社了，他們的哈爾濱代表，是一個公務員名叫木良田，他們有全權從東京、大阪以及其他販賣人口的碼頭，販運日本女孩子進口。憲兵官佐，在這方面——在這專利機關以外，他們又想試作他們自己的生意。我們要用一種監督的方法，使每家妓院，他們的女孩子，絕沒有不經過這個聯營會社訂立合同的手續，而得營業的。」

「現在再購運貨到中國去的專利品，那是在日軍保護下不納運費且無危險的，日軍的這個專權已經賣給了南滿鐵路會社了，是由一家國際聯運會社代理的。他們是唯一的機關，得運送貨到中國去，而不繳納稅捐或運費的。這件事的嚴格管理，是更為困難的。許多在邊境上的官佐及機關，都是在幫助保護着偷運私貨商，想藉此發一筆財。我們應該非常驚覺，有和官員們做這種交易的人，應該將其逮捕起來。」

「我們現在再談關於蘇俄公民的問題。他們在滿洲的人數很多，我們一定不讓他們得安適。他們是一種討厭的危險份子，那是一定要用了一種搜查，拘捕，殺戮的方法，不是去消滅他們，便是迫他們離開這裏。」

「假使我們無理由的拘捕他們，我們將有無窮的麻煩。」我接着說。

「沒有理由嗎？……一個特務長，一定要知道如何找一個理由出來的，譬如說：……每次你搜查一個蘇俄人家，你一定要一個理由，假使你沒有的話，那麼隨便找一個出來好了。我已經告訴過你，那第二日軍特派處，就是在你住的那幢屋子裏的，已經受命供給你所需要的一切材料，如共產黨宣傳小冊子，俄國美國或其他國家方面寄來的各種信件，那上面是有各該國的郵票和郵章，這樣是證明其來源，還有一大套假文件。你可以據此隨時隨地去捉任何人，你並能得到各種犯法的中文宣傳共產主義的文件，我們必不使中國人例外，特別是那些有錢的。日本是窮；在滿洲日軍每天需要幾百萬塊錢。這是我們的責任，要去減輕這種負擔，這裏有許多富有的中國人，他們像土匪軍閥，或用其別的方法，是發了大財的。只有我們才應該將他們這種不義之財拿出來，現在是要輪到這班人來受榨取了。」

吩咐你的夥計們，調查一下，報告上來，那些猶太人是最富的。找到他們銀行存款的數目，他們自己沒有可以立刻售現的產業。一切報告一定弄得正確，否則謊報的話，他們就要受處罰。還有三個像你這樣的人，我用他們來考查別人的報告的；我發現任何不確實的東西後，那個犯錯誤的人，我就對不起他了。

「一旦照我所需要的特務人員組織起來後，我們就開始工作。假使大家做得好，那就每個人都不成問題；否則，就會有麻煩了。我是不會弄錯事情，也不會有折衷辦法的。記住這點吧！」

「我不會忘記的。」

「你在那裏去會見你的夥計們？」

「我約他們晚上一點鐘，在那日軍第二特派處，指定我的那間屋子裏來見我。」

「好極了，你一定要切實吩咐他們，關於保護那些專利機關的事，同時要吩咐他們怎樣用最妥當的方法，去對付蘇俄人民和猶太人。」

「聽清楚。明天晚上九點鐘，有兩個俄人，一個叫克洛班甫 (Krupenin)，一個叫柴貝洛 (Zabellio)，他們要到代馬溝車站去搭車。令你夥計中的一人，去把他們兩個人都殺掉，他們背叛我們日本人，因此就該死。現在你可以去了。」

我就去會見我五個副手，吩咐他們，我們一定要保護那些專利機關的事，然後我問他們中間有人認識克洛班甫和柴貝洛的人嗎。

那個第二號副手，他的名字叫派司土金 (Pashkin) (但他自己毫不知道我是認識他的。) 回答我他是認識他們的，並且說柴貝洛並非是俄國人，却是一個波蘭人。

「這不相幹，我的目的是要將這兩個背叛者。在他們明天晚上到代馬溝車站搭火車時，將他們殺死就行了。你既然認識他們，你去照我的話去做就是了。選幾個真能勝任這件工作的人去幹。」

克洛班甫是如期被殺了，但柴貝洛則毫無傷害的給逃脫了。

第

六

章

一 官廳獨佔下的淫業

日本婦女自呱呱墜地一直到死都是過的奴隸生活。她生來便是服伺男人的，服伺她的父親，她的丈夫，她的兒子——或工廠廠主，或妓院鸚鵡。日本婦女所學的頭一門功課便是：

「男人高似天，女人低似地。」

日本男人就是因為大言不慚的相信他的地位高似天，所以把女人看成奴隸和機器。無論那階級，不分貧的富的，位高位卑，平民貴族，全都是如此。祇有極少數會得西方文化皮毛的日本人（爲顧面子而不是真正尊敬），賞了外國人面前，對他們的妻子纔有相當重視。日本的貴族婦人總是先請男僕鞠躬，因爲她知道她雖然身份高貴，僕人身份卑賤，但她是一地位低似地，而他的地位高似天的。

日本人做丈夫的，無論隸屬那個階級，從不把他的妻子看作平等的人類，密友，或可推心置腹的人，縱使她的理智和教育勝過他十倍。

在哈爾濱與我隔室而居的，有一對日本青年夫婦，田上真之衛和他的妻子千縵子。田上是滿洲國財政部的「顧問」，（在滿洲的日本人，沒有一個是稱作「僱員」的，全都是某個機關或組織的「顧問」）

他身材矮小，體力智力兩樣都很差，稍些懂得點英語。千須子是一個海軍大將的小姐，畢業於東京某大學，英法德文造詣都極深，又擅鋼琴，精繪事，網球高爾夫球都打得很好。總而言之，是一個學識精純的女人，而且面貌黠美。

但是田上對她不但漠不關心，而且把她視若無物。他很少和她說話，即說話也從不用溫言細語。沒有僱用僕役，她做一切家務，烹飪，洗滌，洒掃，自晨至暮——都是爲了取悅她的丈夫，他下班回家時，她要替他除鞋，洗脚，找拖鞋。然後擺桌子開飯，他安坐獨自進餐的時候，她則往廚房裏跑出去，來伺候他。

到他吃飯後，她纔坐在桌隅吃他所吃剩的東西。

晚飯後，田上差不多每晚都上茶館，叫藝妓，以消磨長夜，到清晨兩三點鐘，他纔回家，千須子倦眼惺忪的坐着等候他；因爲日本女人家主不睡，是不得先睡的。

田上的年輕貌美的妻子學識比他高貴十倍，於他有什麼相干呢？他不是「萬似天」，她不是「低似地」嗎？

奧康洛 T. O'Conor 教授在日本過了大半世，在東京 陸大及其他幾間大學授課，他娶了一個日本貴族婦人，熟識日本語言風俗。

在他所著「日禍」(The Menace of Japan)一書中，他對於日本婦女有這樣的議論：

「雖然妻子，敬事丈夫的法則性質極不妥協，婦女有了敗德行為的寬無地位，而男子則可隨其興之所至，自由行動。事實上妻子對於丈夫，儘可意料到會有桑濮之行。」

倘若日本女人祇是原始的人，蕩檢賒陷在她自無關重要；但是我已經說過，日本女人根本比一般男子聰明得多。她也有西方婦女的種種嫉忌和羞辱的自覺心，她也是同樣富有教育，感覺敏銳的，祇因她具有自卑的意識，遂使她不作反抗。她的悲劇是因為日本男人全都具有的粗暴遺傳性的關係。

日本男子的自尊自大是無限止的，無論是在邏輯上理性上，他會帶藥枝或烟捲回到他妻子做牛馬使他安逸舒適的家庭裏去。他會要她伺候他的賓客。他甚至會命她鋪床疊被供他和他的臨時愛人寢宿，而令他的妻子伺候着。會叫她再燙一壺酒送到床邊，明知是拿來助他的男人奮興的。

違命就等於犯了戒條。她的丈夫有權棄她，僅僅叫她走就算事，雖然通常給她一紙三行的休書。對於女人，沒有別的比被休更為恥辱的。

「我永遠忘不了頭一次看見一個新婚的日本女站在臥房門外聽候呼喚，她年纔十六，結婚甫一星期，丈夫便帶媚妓到家裏來。他命他年輕的妻子鋪床并候於外面。我看見她時，她正跪在一張草席上，膝行進退。她的手緊握着拳頭，每次前行，總用頭叩門板三次。我看來她似乎是想打退腦海裏那惡毒的，兩眼飽含珠淚，滾滾而下。流於頰面。她咬緊嘴唇，忍眼淚，嘴角咬到有血貫出。她擡起她的和服衣角，發紅的。

揉攪，扭成一團，塞進抖顫的嘴裏，堵住失聲痛哭……我的出現顯然開罪了那丈夫，歷半年多我不曾再會造訪。到我再去時，好像天公作弄一般，又遇到同樣的事情。這次她是泰然讀着報紙，看見我，鞠躬行禮，直起身跪上來含笑歡迎我……她已學會服從的義務了。」

早稻田大學喜多澤教授於一九三四年六月爲英文「日本泰晤士報」撰文說：「日本婦人或女孩在男性權力下雖屬無可如何，但一般殖民地的幾百萬婦女，遭遇尤爲慘痛，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朝鮮少女與台灣少女簡直是絕對的無生路的。」

台灣發生叛變的主因是日本警察綁架年輕婦女和剝扣工資，任何女子，遇日警來犯，如加拒絕，必遭處罰，或鎖禁起來，以惡詆罪名罰繳鉅款取贖，必至俯首從命而後已。

朝鮮有日人組織的販賣婦女株式會社，純以女人肉體爲營業。施行該般殘虐以養成妓女。妓女若接不到新顧客，便施鞭撻，並罰一夜不睡。所負龜鴿的債乃是一條鐵鍊，永遠鎖在她的頸上。身上穿的衣服，都是龜鴿做的，以四倍至十倍的利錢除賣與妓女，而且賣過收回再賣，一件要賣若干次。在朝鮮創行公娼制度的是日本人，強迫朝鮮女子墮入奴隸地位的也是日本人。

不出預料，一九三二年的頭一個星期內，千百成羣的日本女子開始到達滿洲，他們是由一個專利公司從日本運來供給各妓院，茶館，跳舞場及日本酒樓之用。販賣婦女在日人眼光中並不是下流或丟臉的。

事，行之於滿洲也自然不足為恥。

販賣婦女係被視作正當營業，與其他無論何種營業一樣；日本的大商家與銀行界對此也作如是觀。曾有鉅額的金錢投資於這種不名譽的商業。

在哈爾濱，專利販運日本女子的公司設有很大的事務所，寫字間有十一個之多，有所長，秘書各一人，僱員達二十人。

無論什麼人種，什麼國籍的人，都可以前往光顧。可留下定單，要一百名女子，或祇要一個，可定供一種合所一用的上等妓女，或供普通人洩慾的女郎，或咖啡館的藝妓，或跳舞女等等。

專利公司的門口有日本憲兵守衛。有顧客光臨，由穿漂亮衣服的露背接待，引入一個房間，裏面約有置是半西式的，極其華麗。顧客脫出希望，想要多少女子，供何等場合之用。於是又帶至一個大房間，給他看大本的像簿，內有女子照片及說明，如處女或非處女身，身高身矮，體肥體瘦，髮青髮黑，髮前，精神等或跳舞等等。入晚選定，開始議價，直到講定價格若干，期限多久。議妥後，顧主先付二成半定洋。

過了十五天至二十天，顧客接到銀行發來通知，所定女子一到，付清餘下的七成半價款，即行歸交。

於是妓院驅馮往銀行付清餘款，取得憑證，拿去交與專利公司的事務所，即由一個員帶他去運來的女子所住的旅館裏。

由那一時一期起，那些女子便成了包販者的絕對私產，毫無爭議，他將她們能隨意處置，為所欲為。期限多數是五年，限滿之時，這些女子有時回國出嫁，為天皇生兒育女。

往往聽見她們這樣說：「再過十八個月。我的合同就滿期了。屆時我要家鄉去與我的家庭替我訂婚的未婚夫結婚。」

對於這些不幸的婦女是沒有法律保護她們的。她們受妓院或茶室老闆的宰割。茶室不過是妓院的變相名稱。

女子私逃，是常有發生的事，警察便加以緝捕，和捕緝逃犯一樣。如被緝獲，便交還妓院老闆，他當即施一種刑罰，使她永泯出走的思想。

妓院新運到一批女子，給她們穿上花花綠綠的和服，戴於有平板的汽車上，在街上巡遊，且懸有廣告牌，說明新到女子的優點，當然也標明妓院的地址，還在哈爾濱是常見的事。

靠女人做皮肉生意的日本人，具有獸性，在遼東已是家喻戶曉的。在他們箝制下的女子，待遇有如奴隸，就祇是些肉，糟踏侮辱，橫施鞭笞，且往往處死。

英文「日本紀事週報」有一次會論及運輸日本妓女入滿洲的事，說道：「這種事可以不幹，但是不幹吧！因為這並不能使華人增高對日本人的尊敬心，但當局對於此事似乎並不絲毫厭煩，反而有雄心，想

從新征服地中生利的人們，知道販運女人投荒，比運出男人更能賺錢。

日本憲兵對於利用惡行謀利，從不肯錯過機會，不久也就積極活動於賣淫、烟館、賭館等業。各地紛紛開設妓院、俱樂部、茶樓，有如雨後春筍，並不向承包的專利公司領照，專利公司當局向日本最高軍事當局提出抗議，軍事當局又將抗議發交哈爾濱當局。

我的手下開始有報告交來，說憲兵官長與這些營業有關係，處長承認處理事頗有問題，他不知道要怎樣做纔好。他倘若把這些非專利的地方封閉，憲兵官長會起來與反對他們的任何權力作對；他又不能與有絕大權力的憲兵公開反對。

把這件事情研究了幾天。最後，他叫我命影派他的土匪去封這些非專利的場所，把值錢的東西通通搶走。倘若業主阻攔抵抗，……便擊殺他們。

我與影討論，決定先攻擊新的一間俱樂部而兼茶室的場所，地點在哈爾濱附近，乘電車五分鐘可到。我們知道是憲兵所把持的，裏面有日妓四十名，有賭場、烟館及毒品發售所。

影派二十人去襲擊，帶走所搶得的東西，並放火焚燒房子。

但是，憲兵方面不曉得是為預防，抑或是接了警告，已派有好幾名守衛在週圍防守，襲擊的土匪未會注意及此，貿然而至，連機槍掃射，死了兩人，傷了七人。其餘均被審辦法，祇好逃散。

影大怒之下，誓欲報仇，兩晚後，派了幾隊土匪去劫憲兵所設的兩個烟館和一個賭場，殺死了三個烟館人，痛毆所有的烟客賭客，並帶走所有值錢的東西。第二天晚上，又向高士梅的一個烟館如法進襲，殺死了兩個想抵抗的烟客和兩個鮮老頭。

對於這番宣戰，憲兵大為震怒，立即施行報復。三天後，專利公司下的幾間妓院，賭場，烟館都被憲兵搜查，捕去顧客五十人，認他是共產黨。專利公司看形勢嚴重，驚惶起來。事情不能這麼繼續下去，應即設法解決，商量出一個折衷辦法。

專利公司的人員與憲兵官長開了一個會，和平解決此事，議定憲兵得開妓院烟館各五間，賭場和毒品發售所各一間。僅以哈爾濱一埠論，這個數目還是很少的，因為在一九三六年哈爾濱有妓院一百七十六間，烟館五十六間，毒品發售所一百九十四間。吉黑兩省共有領照妓院五百五十間，日本妓女共七萬名。

二 毒品和麻醉劑

日本專利公司有系統的在滿推廣賣淫業，想起來固然可怕，而日本毒物專賣公司的工作，其可怕的程度更大着不知若干倍。

日軍侵略滿洲不到幾個月，整個滿洲，尤其是大城市，便完全成了毒化世界。滿洲吉林、哈爾濱、瀋陽、街沒有烟館或毒品發售所。在許多條街道上，日本和朝鮮毒販用了一個簡單而有效的辦法，有嗎啡、高根或海洛因癮的人，如果太窮，可以勿庸走進店裏。他祇須在門上輕叩一下，門上便開出一個小窗，他捧海衣褲，伸手進去，手上放着兩角錢。店主取了錢，就在他臂上給他注上一針。

國際聯盟有一個關於毒品的報告，比較日軍佔據滿洲以前和以後該處的事態，因日本已使該處成爲毒化全人類的供給來源。結果今日的景象非常可驚。

羅塞爾巴莎最近曾說，零售毒品，利益極厚，許多日本大商行都兼營以作副業，其他小販亦繼，這種醜惡的活動由日本遷至一滿洲國，一而偽政府甘願代日本的罪惡負擔，自總會舖下道路，供日本的毒，工作更進一步的公開活動。

在哈爾濱本來有幾萬個俄國吸毒者，自從日本人來了以後，被毒害的數目更大地增加了。有幾萬男女青年也都染上了毒。每天街上都有毒發或毒死的死屍。俄國及外僑，供養著人國。毒害作了耳邊風。日本毒販侵入到俄國初級小學和體育團體。日本的毒品店主對於有錢的青年，每帶來一個新的顧客，即是未來的奴隸，便給他相當酬勞。

日本毒商派人四出去勸幾萬的農人停種大豆，改植罌粟。在滿洲乘火車旅行，倒並不見有罌粟田，但是出了游歷者的眼界以外，便有無數頃畝的土地種着罌粟，鴉片的產量已達到極大的數量。日本希望每年要輸幾百萬元的鴉片往中國，日本征服技術的已定部份就要儘可能從速毒害當地的人民，因為染了毒癮的人不久便會失去「抵抗」的思想。

在哈爾濱的地段街上，有一家日本商行，專門營運鴉片入中國。所有烟土都標明「日本軍用品」字樣，用日本船運往天津，北平，漢口及其他各埠。該行的經理是日軍軍官，重要職員亦然；他們全都穿便服，裝成普通商人模樣。

運往中國的烟土天天在製造，冒稱日軍軍用品，有日軍駐紮的地方，如天津，北平，漢口等地，均運交日軍司令部。沒有日軍的地方，則交日本領事署。日本軍艦在中國沿海運送鴉片，日本砲艦則在中國各大河運。

在大連、瀋陽、哈爾濱、吉林、天津及其他城市，日人都設有製造嗎啡、海洛因、高根及其他毒劑的工廠，產量價值年達數百萬元之鉅。

日內瓦及世界其他各地皆在努力奮鬥，以減少毒害，但是非至日本長伸至各處，脚爪被摧毀，很少有效效的希望。毒化全世界無疑的是日本政策的一部。日本愈能用這種身心兩害的毒劑中傷其他各國，愈容易征服他們。這個程序的邏輯是無從反駁的。祇有太陽女神（日人稱爲天照太神）纔能想得與此得到。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愛特爾斯諾先生在週末郵報上著文，這樣地描寫着滿洲毒品賣場現狀。『羅斯福總統會遣佛勒（Stuart Fuller）到國聯鴉片委員會去提出了一個反對「滿洲國」鴉片公賣底抗議。這位佛勒先生最近的言論就是這套毒騙的中肯的描寫。單在哈爾濱一處，就有了一二百所以上販賣鴉片、海洛因和嗎啡的官許的店舖。有一個外國領事官對我說，「這些店舖的聚會大都由朝鮮人和日本人所發出的。無論何人都可以去買，無須任何執照。」爲欲證實他的說話，我就叫一個華人領我到最近的毒品店中，那裏我化了二十個銅幣就給打上了一針海洛因。

「在理論上，公賣制度底設立是想把毒品完全禁絕的，但在實際上，它却大大地促進着生產和消費。有人告訴我在「滿洲國」的日本人和朝鮮人，約有百分之二〇是直接和買賣毒品有關係的。」

以槍彈炸彈和砲彈殺人是需要錢的；但是以毒品殺人，並因以獲得互利，却不單是一件買賣，而且也是炫耀的軍略。

日本人是這樣推論着的。

其實，日本的毒品貿易並不限於中國，他們也把巨大的數量輸送到南北美洲，菲律賓，輸送到全部馬萊半島，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如果僅爲了這個理由，而不是爲了其他的理由，也需要有一個全世界與日本絕交的運動，以阻止這個最有破壞性的惡魔；一個正在最驚人地廣佈着的惡魔。

無論那一國的警察，當捉住了毒販的時候，是怎樣來對付他的呢？總是把他逮捕起來，判處徒刑的。

我們怎樣來防止日本的國際販毒呢？

國聯在多次大會和委員會中已有什麼成就呢？一點也沒有。在日本能以撒謊和僞善底掩護佔勝的時候，國聯是一點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我們必須牢記，日本一面正在實行着欺騙全世界底政策，以及其他民族中促進賭博和鴉片生意的政策，但在另一面她却嚴禁自己的人民使用有毒的毒物 and 光顧賭場。在滿洲，一個日本人如在賭場中被人發現，他就將被遣回原籍，吸鴉片的或有其他毒品嗜好的日本人，就要受五年徒刑的處分。

在一本日本軍司令部發給在滿日軍的小冊子中，可以看到以下的規則：

「第十五條：毒品底使用是不配於像日本人這樣的優秀民族的。只有像中國人、歐洲人和東印度人這樣頹廢的劣等民族才會沈溺於毒品底當中。這就是他們註定要成為我們的奴隸以及終將消滅的原因。」

「日本的兵士如犯了使用毒品就不配穿皇軍底制服，也不配尊敬我們神聖的天皇。」

可是在這事件中，正和在一一切的事件中一樣，例外是很多的，雖有這些命令，許多在滿洲的日本軍官却都染上毒癮了；這真可以說是作法自斃。

情勢的嚴重竟使當時做關東軍總司令兼日本首任「駐滿洲國特使」的武藤大將大大地吃驚。也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發出通函，叫我的主任注意以下的事實：「日軍司令部已知有許多日本軍官常至賭場，甚且常至烟館。他們已成了毒品底沉溺者了。本司令請你注意這個事實，並願向你提議：特務機關應立即控制軍官們的私生活，並把他們有損皇軍體譽的行為立即報告本司令官，為情報總責任處一部分。那些犯罪的人應該立即遣回故國。」

武藤大將在他的一羣中差不多是獨一無二的；他是一個真誠的君子。他有修養的本性使他反對着剝掠人民底政策；他想要抑制軍閥主義的毒藥，並緩和官的殘酷的方法。他復英勇地向東京提了一個真

盡情揭露着日軍在被壓迫的中國人身上所作的不名譽事件，並要求不要再把日本的罪惡遺棄到滿洲來，憲兵底無限制的權應加以剝奪。他竭力設法減輕滿洲人民底苦痛，並防止那些加於他們的委屈。他真心誠意地獨自進行着救世運動，直到後來他自己覺得，他如在荒野中吶喊，他的呼聲在東京一點沒有回響，他灰心喪氣，寫了一道奏章給天皇，其中說明他願見日本對滿的政策有所改變，軍人底權力有所限制；末後並為滿洲的華人求宥，這些華人除了被征服之外，是別無過錯的，他然後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自殺了。

日本人恐怕真相於他們有害，就說武藤大將是患「心臟麻痺症」死的。這個說法顯係了一大部分
的世人。

第

七

章

一 害人反害自己

一九三二年四月九日，我上司差人來叫我，他已得了報告，大意謂，蘇俄的商行正把大量的大豆運輸到海參崴去。

「我們必須阻止這個蘇維埃的營業。我要你叫我們的土匪去把那些貨車弄覆了，當他們被趕到穆陵的時候。」

我把這道命令傳達給我們的匪首老彭，他說，他當調令駐在穆陵附近的手下，並要求我以五十磅炸藥供給他在那裏的助手，我把這件事委託了我的第二號人員。

在四月十一日下午五點鐘，老彭打電話來，說立刻要見我。我就去了。

「這事你怎樣辦的呢？」他問我說，「你說你的助手帶了五十磅炸藥去的那列火車已經到穆陵了，但是我方纔得到電報，說他並沒有在車上。」

我急忙去報告處長，他也立即告訴了憲兵隊，打了幾十通電報到沿線的各站上去，幾十通回電來，都說沒有人見過我的第二號人員。

在該月十二日的清晨五點鐘，我和一位憲兵隊的武藤大尉以及另一個憲兵人員乘飛機到穆陵調查。沿路在阿城和董沙河兩個地方停留了一下。到下午二點鐘我們已到穆陵了。各處都沒有我的第二號人員以及炸藥的影蹤；他們已失蹤了。我把這事以電報報告了處長。他回電叫他們等在穆陵。

在下午六時左右，正當我們討論做什麼才好的時候，有一位憲兵的下級軍官來報告我們，說車站的站長方纔接到電話，聲稱在穆陵以西一百哩的橫道河子地方有一列日本的軍車被炸毀了，有好幾百個人遭了災難。

我們急忙趕到機場，叫飛機師迅速飛到橫道河子去，於七時後，我們就到達了。一輛汽車把我們帶到發生巨變的場所。一個可怕的景象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一座架在很深的河流上的小橋已被炸毀了，正當機車通過的時候，機車頭把七節滿裝日軍的列車拖到河底裏去了。還有十一節脫了軌，滾下河岸，全數都着火焚毀了。

我們當場看見了橫道河子日軍底少佐司令官，二十來個路警，以及一大批中國小工，統統很忙碌地在從破車中搬運着被燒死的犧牲者底屍體。

我們向底少佐道了來意，他簡捷地回答說，救護工作須得先做，以後再進行調查。數分鐘後，一列有十節救護車的火車到來了，直到清晨二時左右，才把最後一個被焚的犧牲者從已

成木炭的破車中救出。沿着河岸一共躺着一九二具屍體。三七四個受傷者，其中有六〇個是重傷的，兩個開車的，一個俄國人和波蘭人也在其內。

火車載着受傷者開到哈爾濱去了。日本人的屍體，照着日本的風俗舉行火葬，把屍灰納入壺中，給在日本的家屬。那些面貌能够辨認的就個別火葬；面貌不能辨認的，就集團火葬。把屍灰分成許多份，納入許多壺中。

將近黎明，另一列火車到了，帶來了好些鐵道人員，一支隊兵士，以及一大批日中俄的調查員，觀察員和偵探。

要尋出爆炸的地點，是並不困難的。在一根架在河上，安放枕木和鐵軌的鋼梁之下，有一大塊基石已被移去了，在這樣作成的孔穴中就安放着炸藥。離橋不遠，發現了一條細鋼絲，一直通到二百碼以外的河邊的矮樹叢中，和一個電池聯結着。

當我觀察這一切詳情的時候，我的腦子就本能地回想到另一次爆炸案中去了，那就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日本人在瀋陽附近的橋下所埋置的爆炸案，它結束了滿洲督辦張作霖的事業，並殺死了他的至友吳俊陞將軍。

一看見這些日本的犧牲者，就有一股惻隱心和憐憫心侵襲着我的靈魂，可是一想起張大帥的死，神

又使我的心胸復歸寧靜了。二十年來，滿洲底華人已成了我的國人；我已逐漸愛上他們了，爲了他們的美德，我已逐漸尊敬他們了。今天我眼看着他們遭受着壓迫、暗殺和痛苦。

我的頭腦還敵得過日本底天生的狡滑。對待那些使人受苦的人和殺人的人，我們是無須猜疑的，無須惡毒的，無須表示憐憫的，尤其是無須軟心腸的。

在找到列車被炸的情形之後，他們現在須得搜查這事件底兇手了。警察、日本的憲兵、鐵道觀察員和偵探就開始在橫道河子鐵道兩邊的鄉村中挨戶搜查。

到四月十三日下午一時，已有四百多個華人、俄國流亡者以及蘇聯的公民被捕了。可是從他們那裏一點得不到什麼。

到下午二點鐘，一位日本憲兵大佐從齊齊哈爾乘飛機來到了。他是來負責調查底全實的。我們叫他禽獸和畜生還嫌太客氣了。這個兩足的黃色惡魔是毫無人性的。他是一個有中國名字的日本人。你們要知道，在滿洲和蒙古有許多日本軍官已經起了中國或蒙古的名字。并穿上了中國或蒙古的軍服。正像在一件事情中一樣，這動機就是欺騙。常時，當人們在報上看到滿蒙大員和日本當局協商或對日人表示同情的时候，這些大員一定就是隱在中國名字背後的日本人。

我給這位新來者起了一個適切的綽號，叫做托克馬達第二（Torremada II）（註）他的身體是和

他渺小彎曲的靈魂很相稱的。身材矮小得可笑。腿是彎曲的，看去令人討厭。牙齒露出唇外，成了四十五度的角度，舌頭老是舐着他厚厚的嘴唇。

他懂得幾個俄文，說得一口很壞的英語。

他開始就說，兇手必須找出，即使把爆炸地周圍的人口盡加酷刑或盡行殺戮，亦在所不計。

和我同來的武藤大尉對我說，這大佐是一個卑鄙的野種，并說他（武藤）很願立即回哈爾濱去。因為我也有着同感，我們就決定致電處長。處長却叫我們留在原處。

這四百個被捕的嫌疑犯毫無區別地被關閉在一間很大的貨倉中。中國人，俄國的乞丐，以及士紳們，貧的和富的，男的和女的，都像一羣綿羊般地擠在一處。

至少有一百個日兵，拿着槍和機關槍，守護着這個屋子。

大約在下午三點鐘，托克馬達第二叫我立刻到車站裏去，他已在那裏佔了兩間房屋，當作辦公室和行帳。

這大佐和兩個其他的軍官坐在一張大藤子的旁邊。當我走進去的時候，他說：

（註）托克馬達是中世紀西班牙異教裁判所的大裁判官。

「我聽說你是哈爾濱參謀本部的譯員，(註)而且聽說你是意大利人。那就最好了……我是不喜歡俄國人的……我是厭惡他們的……我是厭惡一切俄國人的，白的，赤的，黑的，不論任何顏色的。他們是毫無價值的人民……正像中國人一樣……他們只能在黑暗中殺人……他們是不肯出來公開戰鬥的。豬羶……他們統是豬羶……四萬五千萬中國人……一萬六千萬俄國人……你知道他們統是些什麼東西嗎？」

我保持着沉默。

「你不回答嗎……好，我可以告訴你。六萬一千萬的豬羶……豬羶豬羶現在我們可以結束這個論斷了。」

我們四個人就到那個關着四百個嫌疑犯的貨倉間裏去。侍衛我們的二十個憲兵把那扇大門開了。裏面的人以為得了開釋，都想蜂擁而出，憲兵就用槍柄毆打着這些受怖的人民。

他們收拾了一個空處，拿進了一隻櫃子和幾隻椅子；遣大佐和兩個助手坐下了。現在日本的異教法庭開庭了。托克馬達第二充任着審判官；一團執着步槍和機槍的憲兵兩對着那些犯人。一個憲兵把一束

(註)因為武藤大尉不曉得我的官位，他就說我是一個譯員。

俄文和日文的案卷放在案上。托克馬達第二揀出一張來，看了一看，就交給了我。

「把這個人叫出來，」他說。

我讀了這名字，并叫着斐奧特爾·伐西立維支·阿斯搭金 (Feodor Vasilovich Askin)。
就有一個約摸四十五歲年紀的典型的俄國工人移步上前，憲兵就閃開隊伍，讓條走過。

大佐又對我說：

「這傢伙是一個看守夫，他是看守橋樑所在地這一段鐵道的。他是一個蘇聯的公民，因此就是共產黨。他既是一個看守夫，總該知道誰把炸藥放在橋下的。你叫他把真情說出來……否則我就要把他槍斃了。」

我把大佐的話對阿斯搭金譯述了一遍。

「我一點也不知道：那就是我能够說出的一切了。如果他們要殺死我，聽他們的便好了。」

在我把這答話向托克馬達第二譯述了之後，也就像猩猩一樣地暴跳了起來：

「咳！是是是這樣說嗎……你不肯回答……你是不怕死的嗎……或許你以為我不能殺你……我

給你看……」

這樣說着。或者不如說這樣號叫着，他就拔出了手槍，把槍口對準了阿斯搭金的前額。然後轉頭對我

說：

「把這問題再問他一遍，并警告他，如果他不同意，我就要把他殺死了。」

我執行着這個命令，但是這看守夫毫不變動，毫不恐懼，鎮靜地直視着我的眼睛，說：

「我一點也不知道。」

這審判官看着我，并咆哮着說：

「他怎麼說？」

我支吾着，但是必須譯出。

「他說他一點也不知道。」

最後的一個字剛剛出口，就槍聲一響，使羣衆發出了一聲驚叫。這可憐的看守夫就一蹶不響地跌倒了他的面孔上佈滿着鮮血。男子怒罵着。婦女號哭着，這地方已變成了瘋人院了。一個身高力大的中國人忍不住憤怒了，他突破了兵士的警戒線，向着托克馬達第二衝來，托克馬達第二就給他吃了三粒子彈。

「你告訴他們，」他咆哮着說，「如果他們喧鬧起來，我就要以機關槍向他們掃射了。」

我爬上了桌頂，用了許多呼聲和發狂的手勢，才把他們安靜下來，使我能譯述托克馬達第二的恐嚇命令。

他們統統又靜默了。

兩個日兵握住了屍體，把他們拖到外面去了。

托克馬達第二再着手審問。他有着數百個兵士，準備掃死這些無防禦力的和無辜的民衆，覺得十分得意，這一定要算他生平最得意的時候了。

有五十多個中俄男女受過了嚴訊。但是沒有人知道關於爆炸覆車的事情，也沒有人知道關於兇手的事情。只有一個中國孩童空空洞洞地說着，在發生巨變那天的早晨，他曾經看見兩個中國人和一個俄國人躺在離那處被炸毀的橋不遠的地方。

在每次詢問之後，他或者叫還有嫌疑的證人站在我們和羣衆之間的那塊空處底左邊，或者叫他站在右邊。

將近晚上十點鐘，托克馬達第二說他今天已審問得够了。他發令把一切尚未審過的犯人再關起來，把站在右邊的一團人釋放了；把站在左邊的一團人帶出去槍決了。在後者的一團中，有四個是婦女，三個俄婦和一個華婦。

這時候，有二百多個日本陸軍和憲兵被放縱在鄉間，一個獸性底豪遊在整個區域的各地散佈着恐怖，沒有一家得能倖免，每種想得到的暴行都被做出了，成千成百的中國人和俄國人被屠殺着，他們的家

被劫掠和焚燒着；數十個少女被強姦着，其中有幾個還不滿十歲，有五個竟被姦死了。他們更打聽着，被死酒店的主人。酩酊大醉的日本兵士在鄉間東西歪地走着，他們比清醒的時候更殘忍了。

托克馬達第二是在車站裏設着行轅。當我們轉過車站的屋角的時候，我們就遇見了一隊醉酒的日兵，把許多俄國少女和中國少女拉扯着前進，其中有幾個是被說得一絲不掛。大佐看了這景象，笑着對我說：「我確信在這周圍不會再有覆車事件了。我們只有用恐怖手段，才能使俄國人和中國人得些教訓。」

當我們走到他的行轅底門口，大佐就留我吃飯。爲欲不使他起疑，我就接受了。我們就統走了進去。在餐桌上，我們有五個人，托克馬達第二和兩個與他同路來的軍官，還有武藤大尉和我自己。他們從店舖中搶來了大量的食物，以及各種美酒。大佐吃着喝着，但他所吃的還不及所喝的多。

一經喝醉之後，他和他的同伴就忘記了一切外國的禮貌，復現原形了。他們屏棄了桌椅，坐在地板上，在脫去了大多數的衣服之後，就開始豪飲了。他們大半說着日語；聞或互相看一面，發出高聲的大笑。

忽然，大佐如有所感地對一個勤務兵說了幾句話，這勤務兵就立即離開了這房間。

然後所有的眼光都轉向着我，他們都笑得比以前更響了。

「喝酒！大佐高叫着。『喝酒！』我曾經聽人說過，意大利人是不喜歡喝水的，他們是只喜歡喝酒的……是在酒中洗澡的……是這樣的嗎？」

我不發一言。

「你爲什麼不說話？你有幸和四個日本軍官在一塊兒……這應得使你驕傲和快樂了……然而你反而憂鬱着。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然後他再以口語向他的同伴們說了幾句話，他的同伴們都笑起來了，在笑着我，在看着我發笑。

有一個軍官倒在一旁睡着了。他的嘴巴開着，露出了怪難看的一排牙齒，不久他就像一條肥豬般地起着鼾聲了。

托克馬達第二還是喝着酒。

「你肯出什麼代價來做一個日本的軍官呢？你立即回答我！」他含糊地號叫着，形容比以前更討厭了。我決意不回答他。他還是嘵嘵叨叨地說下去。

「你肯出你的生命……但是即使出了生命，你還是做不到日本軍官哩。在不多幾年之內，你益益變成一個美國軍官，或英國軍官，或法國軍官，或俄國軍官……但你是永遠得不到做日本軍官的榮譽的。做日本軍官是一個人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榮譽了。」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華盛頓的街道上走……穿着制服……個個人都羨望着我……因爲他們知道，用了一切他們的財富，他們的宮院，他們五十層的大廈以及一切尊嚴，他們還不是永遠做不到一個日

本軍官的。

「日本的軍隊是最完善的，最榮耀的，是全世界最偉大的組織。它是唯一不打败仗的軍隊，它已經擊敗過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中國和俄國。」

「而且我們還要重做一次哩。在不多數年之內，日本的軍隊將征服中國，俄國，美國，英國和法國。整個太平洋，從北極到南極，必須歸於日本。我們的榮耀的陸軍將在陸上獲勝，我們的無敵的海軍將統治着海洋。世界還不會知道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當我們開始行動的時候，他們就會曉得了；他們就會統統喪失了。美國將因着曾經拒絕過我們而付出重大的代價；但我們是要闖進去的，當那時候，我們是將以征服者和主人的身分闖進去的。他們將願意為我們擦皮鞋。首先我們必須征服中國和俄國，然後就將開始我們勝利底行進；我們將在太平洋的每一海岸都插上我們的旗幟。世界還不知道日本的軍隊能做什么和將做什么哩。」

他笑着，又喝了些酒，又狂說了幾句，並不覺察他在宣示着他的野心勃勃的教師們在教堂中所說過的東西，並不自知他在洩漏着日本武士精神底秘密的思想。這思想是荒誕而自大的，雖然並不可笑，但聽去好像是可笑的。

「你知道只要用幾師團日本軍隊就能擊敗一九一四年的德國軍隊嗎？」

「我不知道。」這引起了一大篇話，在這一大大篇話中，我想起了以下的幾句：

「你不知道嗎？……我來告訴你。我們統統算出來了。我們用十五個日本師團就能擊敗俄軍了。那是東京軍官學校的校長對我們說的，那是日本參謀本部對我們說的。一個日本師團要等於十五個俄國師團，十五個美國師團，十二個英國師團，十個法國師團，和六個德國師團。」

「日本的海軍能擊敗全世界所有的海軍……你發笑嗎？……請你看著……在五年之內他就會懂得我現在對你所說的話了……當我們以嚴厲的手段威脅張學良的時候，他暗示我們在備齊後有中國國民黨，有國聯，有俄國的陸軍，有英美的海軍……那就嚇了我們嗎？……那阻止了我們嗎？……永不，一些也不……我們現在來滿洲已有六個月了……而且在這裏播種……有什麼事發生了嗎？……國民黨，那就是說南京政府已經拒絕作戰了……國聯已經派遣了一個老太婆們底調查團，他們的主要任務是來盡力吃大菜的……在哈爾濱也將有許多大菜恭請李頓調查團……笑笑的海軍一聽也看不見……蘇聯的陸軍……大吹特吹的蘇聯陸軍……它在那裏呢？……你在廟會裏見過嗎？……你不會見過……我們也不會見過……為欲表示我們不怕蘇聯的陸軍，我們就要佔領他們的鐵道并隨意槍殺許多蘇聯的公民……你將看見他們是連抗議也不敢提的……這裏……來一杯……再來一杯！」

在這篇冗長的演說尚未完畢以前，大佐差出去的那個日本兵士又進來了，他端端正正地站着。當大佐說畢了話，這兵士就走上前去，對他說了幾句。

「是這樣的嗎？」大佐回答着，一脚踢醒了那個睡着的軍官。

門開了，進來了五個俄國少女，後面由好幾個日兵推着，他們一定已經驚嚇了她們，因為這些姑娘們又要哭泣。其中的三個是鄉下姑娘的打扮，其他的兩個好像是屬於小康階級的。

托克馬達第二笑着，用日語就叫了幾句，想要立起身來，但是他却跌倒在那個還在熟睡中的軍官的身上了，那個軍官醒過來了，用手肘支起了身體，睡眼矇矓地看着這些俄國姑娘。

在這整個晚上，武藤大尉和還有一個軍官很謙恭地飲着酒，默無一言……只是靜聽着，有時點頭或搖頭表示着可否。

這些少女被迫席地坐在大佐和這軍官的旁邊。托克馬達第二要想默然慰藉……叫這些姑娘喝二杯，她們拒絕了。這使他不快活了，他轉向着我，說：

「你對她們說，我是大佐，我在這地方對每個人都有着生殺的權柄。如果她們對我和我的軍官們很好，那就一切都會使她們得到好處……否則，這將是太壞了，太壞了……你最歡喜那一個呢？……請你據……既是我的客人，你就有優先選擇的權利……我們日本人是常以敬禮對待客人的。」

見我不動，也不回答，他就繼續着說：

「或許你不喜歡俄國姑娘……你要一個中國人嗎？我當爲你去弄一個來……」

我討厭得不願再看他了。我就起身告辭，只說是時候過了，我要去睡幾個鐘頭；「並且，」我說，「我是不喜歡女人的，我是一個有兒女的已婚的人了。」

大佐瞪目看着我；他是不歡喜爲人所反對的：「只有在我答應你的時候，你才可離開這裏。」

「無論你答應不答應，我要走了，」我冷冷地回答着。「我的職務是爲軍事人員充當譯員……當談到愛情事件的時候，你可以去另找別人。」

這樣說着，我就轉身走了。在出去的時候，我聽見他向武藤大尉問了幾句，武藤大尉竭力地勸解着他。車站站長答應我在一個停在側線上的二等車廂裏睡覺。

到八點鐘，我起身了。正當我離開車廂的時候，我遇見一個衣服襤褸的中國「乞丐」，向我要幾個銅子。

「我有一個老婆和三個兒女：二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我一面在袋中摸索，一面低聲問他：

「你的支隊離這裏有多遠？」

「三天的路程。」

「好！設法在兩天內趕到那裏，叫你的首領馬上就來……這裏有成千成百的中國人和俄國人正在遭受屠殺……我的第二號人員怎樣了？」

「我們把他埋了。」

「你需要錢嗎？」

「不。」

「祝你順利。」

我把一個五分的輔幣放在他的手中就走開了。

二 托克馬達第二受挫了

托克馬達第二直到下午二點鐘方才出來。武藤大尉對我說，只有兩個姑娘遭了他和另一軍官的姦污，其他的三個已被放回家中去了。

這審問用了大批的槍殺和暴行繼續了好幾天。貨倉中的罪犯約有一百多個受過了苦刑，可是他們要想發現埋藏炸藥，炸毀橋樑傾覆兵車的人，却仍舊毫無結果。

約摸有二十個爲憲兵「工作」的俄國人從哈爾濱到來了。他們都是罪犯中的典型人物，擇尤選出來的。

這些新來者立即着手，來結束日本人已經開始了的工作。他們把那些好像有幾個錢的人統統捉了起來，直到收到贖款才把他們釋放。這樣勒索來的金錢大部分歸給了憲兵的軍官，共與的歸給了俄國的幫手。

有一個日本憲兵大尉誠懇地對我說，在五天之內，他已得了六千五百塊錢，其餘的軍官都依着等級朋分。托克馬達第二已經收入了兩萬以上。

在日本憲兵界中，朋分屬地人民的東西，是算不得不公正的，在陸軍軍官中，也執着同一暴虐的管轄。不過限度略小一點。駐在滿洲的日本軍官，在期滿之後不帶四五萬圓日本去的是很少的。關於日本軍官抓錢的情形，在朝鮮，台灣和滿洲的日本暴躁的無數受害人能够供給許多證據。無怪日本的軍官圖要不受議會約束了。現在他們的錢太多了；政府必須不加干預，否則，即使刺殺日本的首相，他們也是在所不惜的。

川島芳子是稱爲滿洲底貞德姑娘 (Joan of Arc) 的。她於一九三四年年初在無線電上廣播着說：「在滿日人底自大，尤其是軍官們底自大，正在各級人民中招致着無量的怨恨。這就是日本把放縱的平民和軍人遣送滿洲來的結果。他們的動機是要在最短期間內發財，他們就採用一切強迫底方法，以達目的，他們向人民勒索金錢，并強迫農人停種大豆，改種罌粟。」

我又致電處長，要求回哈爾濱去，他又回電來說：「仍留原處，觀察動靜。」處長顯然並不信任憲兵；他對於他們是知道得太清楚了。

十九日晚上，老影同了他的兩個頭目到橫道河子來了。一下火車，他們三個人就被當作可要分子捉住了。一個老影的部下把這消息告訴了我。我就去見大佐，並對他說，老影是日本底朋友，在未把他處置以前，他須得打一個電報到哈爾濱去。

「我須打電報到哈爾濱給誰呢？……給土肥原大佐嗎？……你以為土肥原比我大嗎？……我是一個憲兵的中佐，一個憲兵中佐是比陸軍的大將還要高哩。我主張親自來審問這三個被捕的華人，如果他們不說出橫道河子來的原因，我就把他們槍決了。這裏是我發施號令的，並不是土肥原發施號令的。」

我就去尋武藤大尉。

「我們必須設法救出老影和他兩個頭目……否則是要有某種很嚴重的後果的。有好幾百老影的土匪駐在穆稜和橫道河子之間相近這裏的地方……而且你必須曉得，如果給我通消息的盜匪已把這一點告訴了他，那末他們對於這裏的情形是一定知道得很清楚的了……他們為欲搭救首領，一定會毫不猶豫地來攻擊日本的防軍的。」

我並不要老影的土匪來襲擊日本的防軍……我有着其他的計劃。

武藤大佐提議打一個密電到參謀本部去，說明老影已被憲兵逮捕並請求設法營救。

在清晨兩點鐘，關東軍參謀本部的電報到了。叫托克馬達第二立即釋放老影和他的兩個同伴……

一道即須執行的命令。

六小時以後，大佐來叫我了。我見他獨自在他的臨時辦公室中。

他把我從頭到腳看了一遍，怪難看地感嘆額說：「你為什麼要打電報到參謀本部去呢？……這個老

影是誰呢？……他是爲誰工作的呢？……你到底是誰呢？……誰是你的頭目呢？答出我的問題來……！如果，你不回答……我就把你結果了……！我想用一粒子彈射進你的頭裏去。」

「我已經對日本的上司宣過誓，不說出我是爲誰工作的，以及我是做什麼的……！因此我不可能回答你的問題。如果你要知道是誰僱用我的以及我的工作是什麼，你只要去問參謀本部就得了。」

「我現在所要說的就是，你是被差來偵察我的工作的。」

「你弄錯了，我到穆稜還是在橋樑未毀以前哩。」

「那末你爲什麼不離開這裏呢？」

「我留在這裏是因爲奉着上司的命令。一接到叫我離開的命令，如果不是爲了別的，單爲了不願見你的面，我也很願意離開了。」

我走出了，連鞠躬禮也不向他行。

因爲這個可惡的矮子實在使我討厭和惱怒了。像這樣的不解事的蠢貨，像這樣自大專橫得令人難耐的，討厭難覓的傢伙，我從來不會見過。無論那一個可敬的軍隊決不會允許他穿上軍衣的，但他在日本軍隊中，却是個重要的人物，而且在他管轄下的不幸的人民中還有着生殺的大權。

我還在獨自咒罵着的時候，在一所村屋旁，就遇見了蓄鬚的乞丐了。我正把一枚錢幣放在他的手中，

他就說：

「C上校帶了二千個人於明天晚上將到來了，他現在在離這裏不多幾里的地方駐紮着。S是和我同在這裏。今晚十一點鐘他要到車廂裏來看你。」

S正像許多其他的俄人一樣，已經加入了義勇軍。他們所揭示的任務是要殺死一切犯在他們手中的日本人，以及毀壞一切日本的東西。

在全滿洲，許大大小小的退職軍官和士兵的隊伍正騷擾着可恨的敵人，永不使他有一分鐘的靜。

這些義勇軍的隊伍，直到我離開滿洲的時候，還是鐵道線以外的地方底真正主人。在佔領滿洲六年之後，日本人可以部分地自稱為鐵道區域的主人了，但是離鐵道線數公里以外，却仍舊在義勇軍的統制之下。日本的飛機可以不時去實施轟炸，但是步兵却不敢到離鐵道線太遠的地方去。

關於這些日本人叫做土匪的義勇軍底英勇心和愛國心，以及關於他們對共同敵人所作的無數次的襲擊，下面的一件事，聽到的人也是很少的，知道的人是很少的。在一九三五年五月間，有三三三三個義勇軍，在黑龍江省雜齊齊哈爾一百哩的一個叫做梅多棚頭（譯音）的小村中，被二千多個日軍圍住了。他們死守了三天，反抗着不斷的攻擊，在這三天中，他們實際上並不會吃過飯。日本的飛機在這種村裏投了一

百多個炸彈，把大多數的居民都炸死了。到中國守衛者的彈藥用盡了的時候，還有六十個受了傷，幾命者就帶了刺刀，佩刀和手榴彈在半夜裏爬行到日軍的營裏，那些日軍滿以為仇敵已殲盡了，都已睡熟了，了睡鄉，並沒有任何的哨兵。

在夜間劇戰發生了，中國的義勇軍夾雜在日軍的中間，左右蓬瀛地殺着，同時那些日本兵瘋狂地閉着槍，時常自相攻擊。戰鬥的結果中國人就被殺死了：日本人死了一五七個，傷了二百以上。

即使在最野蠻的部落中，敵人的勇敢和苦戰，常能博得對方的敬意。可是在日本人中却並不是這樣的。敵人戰得長久和勇敢，日本人就越加憤恨。因為他們是只以怨恨和輕蔑對待反對者的，不管還反對者在防禦或攻擊中是多麼勇敢和英雄。除日本的英雄之外不能再有英雄；除日本的勇敢之外不能再有勇敢。

這位帶兵攻擊，遭了三天抵抗的日本大佐，是信守道特性的。當他立在中國司令底屍體面前的時候，他不禁發洩出武士道的本能來了。他咒詛着這已死的英雄，加以種種的辱罵，末後並以足踢着他的面孔。這種殘暴的獸性好像是不可信的。可是，如果全世界因為缺乏像我這樣的見證，竟至不知道滿洲所發生的事情，那末現在在報上和無線電上，總可以曉得日軍在華北，上海，南京和杭州所作的一切了。

全世界現在目擊着這些兇殘，終能想到在滿洲底內地一定會發生的那些事情了，終能想像到我

所揭露的事情，不過是那些殺人越貨的專使所作的暴行底一小部分罷了。這些殺人越貨的專使，各文明國還誤認爲是他們之中的一分子哩。

第

八

章

一 復 仇

下午十一點鐘，S到停在橫道站上的我所睡的那個車廂裏來了。我們兩個人得再聚首，都感到快樂。S是一個俄國的退伍軍官。於大戰後，曾參加滿洲的情報工作，並有好幾年曾隸屬於我的部下。他對我說着他在C上校所指揮的義勇軍中底冒險事業，以及許多次和日軍的對壘，以及未來底展望。我也把橫道河子及其周圍底形勢，詳細地告訴了他，如日軍的人數，他們的駐屯地：憲兵，俄國偵探，以及日軍司令部人員的住處。

到上午兩點鐘，S離了我的車廂，在黑暗中消失了。

四月二十二日，來了一個電報，叫武藤大尉回哈爾濱去。另一個電報是處長打給我的，叫我仍留原處，把橫道河子所發生的事情作一個完全的報告，並留心偵察，尤其是偵察憲兵和他們的俄籍助手的行動。那天晚上九點鐘，人民騷動起來了。一個日本中尉在妓院中把一個不肯獻殷勤的妓女輪殺了。後來，在走出這處所的時候，這個酒醉的武士拿着槍見人就放，打死了一個朝鮮人，打傷了一個俄國婦人和兩個中國人，不用說，因為他是一個穿着皇軍制服的日本軍官，沒有人敢去撞他。這殺人者帶着他勇敢行爲

底榮耀，回營去了。他到底是受着責罰還是受着勳章，我終究沒有打聽出來。

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我請老影於午後九時，到我這裏來吃飯。在那天下午約摸四時，光景那個中國乞丐通知我，C上校的隊伍已經把這城市圍住了，警告我在天色暗後留在車廂中。

老影於九點鐘到了，帶了兩個頭目和四個站在車廂外面的盜匪。

雖然我預備了豐盛的小菜，並以大量美酒和伏特加酒過口，老影終是悶悶不樂。他爲了所受到的待遇表示着不平。

「我現在是什麼東西呢……過去多年我手下曾有過一萬五千個人……現在呢……我只有不到一千個人了……他們是曾經答應我祇少可以有五千個人的。他們只叫我做下流工作，沒有多大的錢可撈……在我們洗劫了一個村莊的不多數天之後，這村莊就被日本人和朝鮮人佔去了，他們以爲我不知道嗎？他們當我獸子看嗎？他們最好能够留心點……他們對我說，是我來反對蘇聯人和朝鮮人的，現在他們却用我來反對中國人了，藉口說他們是共產黨……誰會聽說過中國的農民是共產黨呢……我，他們的下流工作已經做得够了，終有一天我會把他們中途棄了的……我將走我自己的路。

我靜聽着，不發一言。老影接續着說：

「你切不要以爲我對你有什麼不滿，我是知道你不得不工作的苦心的。我知道日本人是用強力把

你抓住著，我知道你做這個可惜的工作是違反本心的……我是一切都知道的，連藏在你的心裏的事情我也聽得……最使我傷心的就是你還不够信任我……你知我是能共同起家發財的……我還是希望著終有一天，你和我能够脫離日人的羅網，隨意自由行動……總之，日本人算得什麼呢……體質上他們是些矮子……智力上他們是些猩猩……你不是見過這大佐嗎……那個我們叫做托克馬達第二的湖蘇……我每次看見他就覺得頭痛。

「這可惡的老鼠……在我離開以前，我願意割下他的耳朵來……使他會記得我。現在這裏的我的頭目李東已經發過誓，如果這大佐不立即離開橫道河子，他……」

正在那時，槍聲一響，緊接著來福槍和機關槍的聲音，把我們的談話阻住了，一個老彭叫他留在外面的衛士衝進來告訴我們，全市各處都在開槍了。這時正是十一點十分，我直視著老彭，好像毫不介意。

「你以為我們應該去嗎？」我問。

「去幹什麼呢？我們能做什麼呢？我們只有手槍……抵抗起來關槍和機關槍來那就好看了……我們當在這事過了之後出去。而且，我想他們不會到這車上來騷擾我們的……」

老彭然後吩咐他的手下，去叫那些衛士們到裏面來。他以前對我說是有四個，現在我數起來却有十一個。

砲火時停時響。到一點鐘，我們只聽見疎散的槍聲了。直到上午二點三十分方纔靜寂，到四點鐘，我們出去了。

那些日本人在夢中被襲，連拿槍的工夫多沒有。許多人在營房內被殺，其他的做了俘虜。

大多數的軍官正在藝妓院裏，穿著和服，不帶槍械；那些要想抵抗的都被殺死了，其餘的都成了俘虜，被義勇軍挾走了。

在襲擊之後，那些義勇軍，帶着一切俘虜，在山嶺中消失了。

當我們立在那裏考察形勢的時候，那些設法避過襲擊的日本軍官和士兵，逐漸從躲避的地方出來了。到上午七點鐘，有十一個軍官，最高的是一個大尉，和一百三十七個士兵已到了空曠地上了。他們所有的槍械統被義勇軍拿去。憲兵隊的二十三個俄籍幫手死了十四個，逃出了九個。一共死了一百四十三人，被俘虜了一百二十七人。電報一恢復，我們又聽到說，在襲擊橫道河子的同時，另一股義勇軍襲擊着離哈爾濱一百公里的一兩坡。日軍被迫撤退，死了一百三十四人，被擄了八十六人。

上午十一點鐘，一列特別火車載着一大隊日軍到橫道河子了，十二架飛機從哈爾濱飛來，偵察着襲擊者。

第二天，即四月二十四日，康長打電報來叫我回哈爾濱去。幾小時後，我就去搭火車。老彭來送我，十分

不快活，因為他不能和我同去，他必須到穆稜去會他的部下。正當火車開動的時候，他很熱烈地說：「如果你不請我吃飯，我和我的手下此刻都已死了。我永不會忘記這事的。」

在哈爾濱，當我向處長報告的時候，他很熱忱地接待着我。他對於托克馬達第二的行動，從他的橫道河子起而被擄止，比對於覆軍事件和襲擊橫道河子事件更感興趣，對於那些日華俄的犧牲者，他從未加過一句評語，也從未表示一絲一毫的憐憫和同情。

五月二日，我回到哈爾濱的第二天，日軍司令部對於在橫道河子所發生的事件，發出了以下的「官報」。

「本月十二日，下午五點三十分，在橫道河子附近，蘇維埃的人員把一列到穆稜去的火車傾覆了。死者三人，傷者十人。暴徒已經就逮，並經明白證實，這企圖是共產黨底工作。」

「二十三日下午十一時，有一隊四千以上的悍匪襲擊着在橫道河子的日軍支隊。我們的軍隊把土匪趕走了，留下了三百六十七具屍體，二百一十個俘虜，以及大量的槍械和軍火。」

「我們的損失是四個兵士被殺，十一個受傷。日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大佐。」

上面的日本「官報」文章是該民族的典型。他們堅信自己是優等民族，是神明底民族，其他的民族和他比較起來，都失色得不足道和變成低級民族了。在任何會戰中，他們都承認不會失敗或受挫，有了這

樣信條，他們便自信是敬事神聖的民族，遂盲目於事實底證據了。他們看不到達爾文的運動與體質了，他們體質上的劣點。

我們對於日本底海陸軍將怎麼說呢？這是一個日本人絕對不許討論的題目。日本底海陸軍能够擊敗全世界海陸軍的總和……那就解決了這論爭了。每個日本人，從天皇到挑煤夫，都有這個信念。

那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

皇帝是「太陽女神」底嫡派子孫。皇帝底軍隊一定是無敵的。如果軍隊是無敵的，那末，在邏輯上，那個軍隊底人員一定也是無敵的了。

如果寫出一個日本哨兵遭人打了，那就是對於整個軍隊的侮辱，對於天皇和「太陽女神」的侮辱。如果寫出幾個中國人炸毀了日本軍車，死了幾百個日本兵士，那無異是說着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讓我們將少數的中國人改做了一蘇聯政府，「讓我們縮小着災害的重要性，讓我們減少着死傷的人數，不說明他們是兵士，這樣，日軍底榮譽，天皇底以及「太陽女神」底榮譽，就都可以保全了。

日本的「官報」和事實及行為完全沒有關係的。日本軍人做報告和出佈告底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竭力揶揄日本軍隊及士兵的勇敢和無敵。爲欲達此目的，他們決不怕抹煞事實的來誇張。越是說得荒乎其唐，軍事當局就越會核准和歡喜。

在一切說到和敵人會戰的日本官報中，一定是要加入一些「武士」殺死二千敵人的日本神話的。那種會使木偶發笑的誇張和曲解，日本人竟會認真地相信着，在他們這種大言中，就看到了日本的真實的精神。

在我為滿洲日軍工作的四年中，我從未見過一篇說到他和土匪或義軍會戰的真實的報告。日本人永不承認他們會被打敗或會受重大損失。當真的打勝了的時候，他們當然同樣地大吹着。假使有人把日軍司令部交給報館的官報集合起來，他們就可以成爲一本最可笑的笑話全集。

例如，關於松浦鎮的戰爭。哈爾濱師團長多門大將發給報館的官報，就是日本癖性和庸儒的典型：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一隊一千二百名的日軍在松浦鎮（離哈爾濱數公里的一個鄉村）和一股悍匪遭遇了，他們人數有八千以上，統統配備着蘇聯的來福槍和機關槍。在六小時劇戰之後，其間經過着多次的肉搏，幸賴我軍無上的勇敢，卒把土匪擊退。遺留屍體一千二百十四具，傷者七百六十三人，我們的損失是死者十四人，傷者三人。

師團長多門大將。」

以我所知道的事變真相說起來，上面的神話應該改成如下的語句：

「在松浦鎮戰爭中，一隊有三千五百人以上的日軍遭着大隊義軍的攻擊。經過頑抗之後，日軍被退

向松花江後退，在江邊的一個漁村中紮陣，等候着黑夜的到來。他們在黑暗裏捕獲了許多俄兵，並殺傷了許多俄兵。在三千五百餘人中，只有一千六百七十六人達到了彼岸，其中有許多還是受了傷的。六天以後，當日本援兵佔領松浦鎮的時候，他們在這村莊和松花江之間，找到了九百零七具日軍的屍體；每個都是赤條條的，他們的衣服盡被「盜匪」剝去了。在以後的十五天中，在江中又撈獲了五百三十一具屍體，指揮這隊伍的大佐的屍體也在其中。

「五月二十七日，哈爾濱的日軍司令接到一封義軍首領所發出的信，在信中，他說俘虜了三百八十二個日兵和一個軍官。他提議來一次俘虜底交換。」

這個日軍腦筋上底基本的特性，不單顯示於嚴重的軍事之中，同時也顯示於他們生活底最簡單的事情之中。

例如，一個日本憲兵在哈爾濱的街上攔住了一個俄國人，要想搜查他。這俄國人因為喝醉了酒，竟抓住了憲兵的衣領，奪去了他的手槍，把他痛打了一頓。這憲兵躺在地上，被打得頭破血流。刑事科的副巡斐陀羅夫（Feodoroff）捉住了這酒醉的俄國人，把他帶到警察所裏，並寫了一個報告，說明這案件底真相。

第二天早晨，惡魔脫離了。日本的憲兵司令把斐陀羅夫副巡叫了去，大罵了一頓，他幾乎要把他槍決。

了。

「你怎敢寫着一個酒醉的俄國人，能够痛打並且解除了日本憲兵的武裝呢？……你已經侮辱了日軍……已經侮辱了神聖的天皇了。再去寫一個報告來，對於寫的內容，須得當心些。」

可憐的斐陀羅夫不曉得怎樣做才好。他去和一位日本律師，名叫石橋的商量，這位律師就代他寫了一個報告，這使哈爾濱的警界鬧了一個大笑話，這裏就是這報告。

「一九三三年六月五日晚上十點鐘，日本的憲兵賀本、新太郎遇見了一隊有二十人以上的青年共產黨員。他們叫罵着，凌辱着和平的公民，擾亂着公共的治安。賀本就勇敢地挺身上前，叫他們解散並停止騷擾。這些酒醉的共產黨員非惟不理警員的請求，反以棍棒將他痛擊。

「賀本憑了武士道的精神，大膽神勇來作自衛，雖然受了重傷，終於擊退了共產黨員，捉住了他們的領袖並把他關入了我的監獄中……他這樣完成了任務之後，就昏暈過去了。」

「我身居「滿洲國」警察底副巡，理合把賀本的英勇行為呈報高級日本當局。他是光榮日軍底稱職的代表者，真正的「武士」，他的英勇使我們充滿着敬仰和驚奇。」

這重寫過的報告大受着日軍當局的贊賞，並稱道着斐陀羅夫。三個月之後，賀本因着他的勇敢而受勳章了。

第

九

章

一 李頓調查團

當五月一號我回到哈爾濱去的時候，離李頓調查團到哈爾濱來的日期僅祇十天了。在一星期之前，各種警務機關都奉令逮捕和監禁一般不逞份子，以防他們向國聯調查團有何伸訴。

日本的警察制度，有幾點真令人莫名其妙。在滿洲他們就有這許多的警察組織：

- 一——日本情報局，局長由東京委任，他僅對東京方面負責。
- 二——日本憲兵隊，隸屬於日本軍事當局。
- 三——「滿洲國」憲兵隊，隸屬於滿洲軍事當局。
- 四——「滿洲國」國家警察，由「滿洲國」內政總統率。
- 五——市警察，由各地市政府管轄。
- 六——日本領事署警察隊，由日本領事館統率。
- 七——刑事警察，屬於市政府當局，但和市警察完全獨立。
- 八——國家情報局，屬於「滿洲國」陸軍部。

九——鐵路警察，屬於鐵路管理局。

這幾種警察機關各自爲政，毫不合作，常常反背道而馳的。他們中間引起的嫉妒，仇恨和敵意，真令人不信。在實際上這個警務機關人員，常常偵察別個機關的行動，一遇機會，便立加攻擊了，有時候這一個機關所認爲的嫌疑犯或危險份子所拘捕的人，却被另一個機關宣佈稱爲模範公民和正人君子了。例如加伏而斯基 (Kavalisky) 一案中的主角，本是個百萬富翁，但因為日本軍事當局搶去了他所有的一切，使他無法清償債務而宣告破產，國家警察和市警察却幫着他說好話，說他是個真誠的好人，但另一方面，憲兵隊和國家政治警察局却硬指他是個無惡不作的流氓，當這種矛盾現象在法庭上發生的時候，聽審者都不禁哈哈大笑。

在哈爾濱各種警務機關，對於拘捕意圖向李頓調查團控訴的不穩份子，却在一條戰線下工作了。

按照平時的習慣，一切「逮捕」都在夜間進行。因此夜幕一展開，各警務人員都爭先的前往拘捕最有錢的人，直等到拿出他財產中之一部份，纔把他開釋出來。這已經糟透了，但緊張的悲劇還在後面呢。倘若憲兵已經得錢買放之後，另一機關的警員便又如法泡製，那被捕者因此又要出另外的贖金，有幾個中國的富人這樣的被綁票五六次。弄到家破財盡，結果依然難逃牢獄之災。

按照日本軍事當局的命令，這次所捕的一般不穩份子，必須要待國聯調查團離開之後，方可釋放。他

們全都被禁在土牢中，和小竊、土匪和其他兇犯關在同一地方。有許多人在調查團走了三四十天以後，還是沒有見到天日。

李頓調查團將到的一月前，日人就籌備了一個向代表團提出「請願書」的中俄人民請願團，這種請願書每一張都是日本人擬定的，那殼中俄名人僅須簽字而已。不用說，這些請願書無非充滿了頌揚和贊美「滿洲國」的現在和將來的。

他們小心地組織了一個招待委員會，每個委員都要練習儀式和交際的方法，他們必須牢牢記住什麼是應該說的，並且如何說法。他們受了警告，如果他們多說了或少說了一個字，如果他們有一些使人引起誤會的表示，那末，他們就要以生命來作這些錯誤的代價。

李頓調查團到滿洲來調查，當然是要想明瞭這事變的真相……日本人於是不得不設法來粉飾一切，使調查團墜入他們所設的圈套，他們那種過火的做作，現在已經成爲愚蠢的世界紀錄，無往不成爲話柄了。

哈爾濱的莫迭爾飯店，是調查團重要代表的下榻之處，四面被嚴密的監視着。在代表臥室的隣近房間，就由國家政治警察局的日探和俄探裝做普通旅客佔據了。三個探員冒充爲旅館的職員，有的扮做中國茶房，侍應生，房間侍役，大廳侍役和其他雜差。警局雇用的三個日本女子扮作了奴婢。其餘數十個探員

都分散地在餐室、閱報室、會客室和旅館四週佈置着。至於其他各族館，像梅蘭德族館和刺普族館，佈置着調查團的代表，也同樣地佈置好了。

在日本人認為調查團或許會去的一切大商店中，酒館中，以及頭等戲院中，都以政治探探，充當着偵員，職員，侍者，招待員等等。

我們且說出正確的數字：一共有一千三百六十一個中國人，俄國人，朝鮮人以及九個日本人，因犯着將在李頓調查團前作反「滿洲國」示威的嫌疑而被捕了。他們都被帶到松花江對岸，離哈爾濱六十里的松浦鎮的集中營裏，他們恐怕調查團或許要參觀監獄，於是就把一切政治犯，一切蘇聯的公民，一切能說英語和法語的罪犯，都從各監獄遷移到松浦鎮的集中營裏去。

在一切醫院中也採取着同樣的預防手段。一切可憐的病人都被移到調查團不會去的日本醫院裏去了。

佈置圍套的第二步工作，就是假造激昂的民氣，使調查團感到人民是擁護「滿洲國」的。

他們印了成千成萬張「滿洲國」的小國旗，以及溥儀（當時的執政）的小影。每張國旗約值三分，小影約值二分。不單是哈爾濱的居民，連住在沿鐵道線的一切華人，俄人和朝鮮人，每人都須化一元的代價，來買國旗和一張小影。每個推銷「旗子和溥儀小照」的支隊有一個華人，一個俄人，兩個日本憲兵和

一個日本服務員。一隊一隊的支隊出去挨戶強迫居民購買一套，並恫嚇着，如果在調查團居留的期間，戶關不好好地掛出「旗子和禮儀小照」來，全家就都要遭逮捕的。那些不識立腳拿出來掛掛的毒人，限期於十五天內，把錢送到警所裏去。

我的處長好像已經發昏了。他發着命令，又發着相反的命令。他吩咐把某幾人捉起來，數小時後，又吩咐把他們釋放了，他坐立不安，恐怕做出露馬脚的事來，使他負咎。

李顯調查團將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到來了。

在五月四日，處長把我叫了去。這召喚是緊急的。當我走進他辦公室的時候，我立即看出他是很不高興。他大發着脾氣並厲聲說：

「你是一點不解事的；只有我對你說的時候你才解事。我真不知道張作霖怎麼會賞識你的。他怎麼會提拔你並給你很多的錢……甚至要你爲他服務，還對我真是一個謎。如果我做了他，我在第一週早就把你踢出去了……我決不會把你留一分鐘的。你可說是毫無用處……絕對無用處的。」

「如果你覺得那樣，」我回答說，「那末，你爲什麼不把我踢出去呢？我從未請求過要爲你工作。如果你讓我，我當然不會出什麼怨言。」

「你不要再多說，不要忘記，你是在對情報部的處長說話，我喜歡怎麼說，就說怎麼說，但你是沒有

獲利回口的……現在聽我說……你認識張鳳亭和張鳳亭（延閣）和穆文煥（蔚堂）嗎……」

我認識的。前者是一個富翁，是交易所委員會的會長也是二十幾個金融機關的老闆或經理，後者也是很有錢的，他是同發隆百貨公司的老闆。

「這兩個，」處長對我說，「正在預備一個呈文，由其他的富商簽着名……他們想把他藏得避開國聯調查團去。我們知道這呈文是在說「滿洲國」的壞話。數小時前，我的日籍探員已把這消息告訴我了。現在……我給你的命令是要你負責。無論用什麼方法，把這張富翁們簽過字的呈文弄到我們的手中來。如果我們拿到了這張呈文，我們就能在軍事法庭上控告那些匪徒以叛國的罪名了……這個，當然，意思就是沒收他們的財產，這財產總計有一萬萬以上……這筆金錢日本軍隊能够很愉快地使用着。我現在信賴你把這張呈文負責取來。把這些人監視起來……把他們的屋子監視起來……把每個去訪問他的外國人都監視起來。我意想他們會用某個外國人去遞這呈文的。」

「很好！我們能把他們統統監視起來……但事實却是，我的一切人員每天都做着二十四小時的工作，我已差不出人去幹這些工作了。」

「那個我也已經想到過了；」他回答着說：「因為一切警務機關都是很忙，我已決定用老彭的土匪來偵探這些有錢的華人。憲兵隊當發給他們一個護照，委任他們為短期的特別警員。就是他們仍在老彭

之下工作，也是一樣的，至於他們要做些什麼工作，你可以把調令發給老彭就是了。」

「你以為可以信託他們嗎？」我問着。「他們是土匪……一旦有了職權，他們或許會乘機濫用的。此外，他們衣服的襤褸，是你所知道的，他們做特別警員是不像樣子的。」

「那個我已經預備好了，」他回答說，「有五百套『滿洲國』的軍衣可以一聽老彭的支配。那就解決了這問題了。至於這些土匪或許會做出什麼事來，我是毫不介意的。使我感到興趣的唯一事情，就是要使一切非經我們核准的人不能和調查團底委員接觸。」

每件事情都毫無遺漏地做好了。三天之後，就有四五個穿了破軍衣的「特別警員」駐在那些有錢的華人底家中，充着特別「衛士」了。其他的「特別警員」都在附近巡邏，凡有到這些被守衛的屋子裏去過的人他們就釘着梢。

我說句感激的話，就是老彭的土匪並不會濫用職權。他們嚴守着職務，顯出自己是很好的警員，並且忠心地執行所受的付託。他們非但不會有過可責的行為，而且，其中有許多人，在李頓調查團去後，不願再去做土匪了。他們要求長期做警務工作。

國聯調查團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下午四時到哈爾濱。當正午的時候，車站中以及調查團要經過的各街道中，都充滿着「滿洲國」的中俄警員。哈爾濱街道上所常見的成千成千的日警和日兵調查團

看不見了日本參謀本部會發命令，在街上不可使人看見一件日本的軍衣，因為他們必須使李頓調查團相備「滿洲國」底組成，是出於滿洲人民底自發的意志，日本人是並未與聞的。

成千的日本憲兵和日本兵士都穿上了「滿洲國」的軍衣。

所有的省市當局，以及「滿洲國」底軍事當局都遵照着日軍司令部命令，和那個歡迎委員會一同到車站裏去了。

火車到了。李頓和調查團底各委員步出了火車，在正式引見之後，這行列就向大門進發了。正在這時候，有一個朝鮮人走上前去，想把一封信交給調查團底委員。他是日本憲兵底一員，那時正穿了「滿洲國」的警衣，在月台上佈着警戒線。他只向前走了三步，就有一羣穿着「滿洲國」警衣的日本人把他抓住，推到警戒線的後面去了。

這個可憐的，愛國的朝鮮人被他們捉住了，我的處長吩咐把他帶到他的面前去。

他的名字叫金谷。他已在日本憲兵隊中當了七年差使，但是他對於這個壓迫他們民族底怨恨却已經與日俱增了。在他簡單的想像中，他以為國聯調查團是一件事了不得的東西，他以為他是有權解放他所愛護的朝鮮的，他祖國現在是這樣地受着壓迫和痛苦。在這封以朝鮮文寫成的信中，他問着，為什麼國聯對於解放滿洲這樣關心，對於解放朝鮮這樣不關心呢？滿洲在日本統治只有幾個月工夫，朝鮮却已受

苦了許多年了。

當夜，將近九點鐘，當調查團在哈爾濱，享着首次宴會的時候，可憐的金谷正在受着酷刑。我的處長要親自審問，因為他深信金谷一定還有同黨。

但金谷是一個好漢，即使他有同謀者，他也決不招認。起初處長讓他隨意說着，對的，這可憐的家伙以為有了救國的機會，就寫好了一封信，要把它交給調查團底委員。此外就沒有什麼了。並沒有另一個人參與這件事的。

一看得不到他所要得的口供，處長就變了一條野獸了。他對這可憐的受害者用最可怕的酷刑。他們拔去了他足上的和手上的指甲，折斷了他的臂骨，用火酒燈燒他的腳掌，到最後處長親自用他正在寫字的那枝筆挖出了他左面的眼珠。在這全時間中，金谷只是反覆地說：「我並沒有同謀者，這信是我自己寫的。我要國聯把日本人逐出朝鮮。」

兩小時後，他們把這半死的犧牲者帶到一個塚地底附近，在頭上一槍把他結果了性命。

X

X

X

對調查團底每個委員，日本人都指派了四個探員輪流監視着他的每一行動，記錄着他所做的每一事件，並寫下着每個聽他說過話的，或向他說過話的，或想要接近他的人底名字。

對於這種特殊的保護，日本人藉口說：爲欲預防共黨以及那些主張滿洲獨立的中國人，不得不採取這種手段。這些黨人不但要襲擊調查團底委員，同時也要謀刺這莊嚴團體底中國代表。

這些毫無事實根據的話，都不能使調查團感受印象。

只要生着半隻眼睛的人都能看出，調查團來調查事變是爲共產黨所歡喜的。至於那些要想使滿洲獨立的中國人，也是不可能騷動的，因爲這種中國人，無論過去和現在，都不曾有過。對於調查團的一切監視和偵察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把調查團和每個人隔離起來。它保護着各委員，使他們免遭行刺，但是只使他們免遭日人的行刺。

然而這仍舊毫無用處。許多「滿洲國」的，華籍的，俄籍的和朝鮮籍的警員都反對着「滿洲國」的計劃，他們盡力幫助着調查團獲得真相。他們在日本憲兵的鐵蹄下佈置着秘密的會議和會見，並便利着信件的投遞。

李頓爵士在他報告書底「滿洲居民之態度」一章中，說着這樣的話：

「調查團底目的之一，就是要確知滿洲人民對這新「國家」的態度……可是搜集證據頗多困難。土匪們，朝鮮人和共產黨或將以實在的或想像的危險加於調查團。那些新政府的擁護者，因憤恨批評該政制的中國代表之來滿，也或將以實在的或想像的危險加於調查團。這就成了調查團蒙受特殊保護的

理由了。在這不安定的地方，誠然時時會發生真實的危險的。但是警衛的結果却使證人不得接近，有許多華人甚至不敢和我們的人員見面。我們在某處得到消息……凡未得官方允許的人都不准和調查團會見。因此，許多接談都須以極大的困難和祕密加以佈置，雖然這樣會晤着，仍有許多人對我們說，這於他們是太危險了。

「我們仍排除萬難，除與「滿洲國」官員及日本領事與軍官作公開會晤外，仍能設法與商人、銀行界、教育、醫師、警察、販夫及其他人等作祕密的敘談。我們更收到書信一千五百餘封；其中有些是親手交來的，大多數是由郵局輾轉遞到的……」

「我們會接見各公共團體及社會的代表，並時常接到他們的書面的申請。這些代表大都是由日本或「滿洲國」當局所介紹來的，我們有理由深信他們所交來的申請書事先是經過日本人的同意的，實際上，有些呈遞請願書的人常於事後對我們說，這些請願書都是日本人所寫成或修改過的，並不能代表他們的真意。這些文件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為其中把日本人參與「滿洲國」行政的成立或維持這一層故意忽略，並不加以可否。大體言之，這些申請就是對於舊時中國行政的怨語，以及表示對於「新國」未來的希望和信仰。

「收到的信件都是由農民小職工，城市工人和學生寄來的，其中都透露着作者的憤懣和經歷。在調

查關於六月間回北平之後，這許多書信都由特選的專員，加以翻譯，分析和整理。在這一千五百封信中，除兩封之外都是深恨新的「滿洲國」政府和日本人的。他們都是真誠的，自動的民意表現。」

「滿洲國政府」的高級中國官吏出任官職，有着許多原因。他們有許多是舊日的官吏爲威迫利誘所留住的。有些人寫信給調查團，大致說，他們是受着威脅而留任的。一切的權力都操在日人的手中，他們是忠心於中國的，並說他們在日人面前和調查團所說的話都不足置信。

「我們所會見的中國商人和銀行家都是仇視「滿洲國」的。他們恨惡着日本人，他們爲着生命財產擔憂，並常說：「我們不願意做朝鮮人……」職業階級的，牧師和醫師更是仇視「滿洲國」。他們都歷稱受着監視和威脅。因爲日人干涉教育，封閉大學和其他學校，更換學校教科書，愈加使他們熱血沸騰的愛國心中，增加了切齒的敵意。檢查新聞紙，郵件和言論以及禁止在中國出版的報紙輸入「滿洲國」境，都是爲人所憤恨的……我們接到許多從學生和青年發來的信，都是反對着「滿洲國」。

「滿洲國政府」及地方行政機關底首領統統是中國人。日本人都處於「顧問」的地位。但這組織不但使顧問有機會供獻技術的意見也使他们有機會實際操縱着並指揮着行政……

「在仔細研究過我們在公私會談中以及在書信文件中所獲得的證據之後，我們就可以作一結論，就是，沒有一個中國人在擁護「滿洲國政府」，在當地的中國人看來，這政府是日本人底工具。」

李頓調查團從未知道在他留在哈爾濱的十四天中，就有着五個中國人和兩個俄國人因為想避信給調查團而遭到了逮捕和槍殺。

李頓調查團也從未知道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三日下午九點三十分，就有一個工藝學校的青年俄國學生，因為想避信給李頓爵士，抗議他要想求學的那所學校的被封，就在調查團所居的莫迭爾飯店的二層樓上，被日本人殺死了。

一共有百五十多個中國人和五十多個俄國人在莫迭爾飯店的附近被捕。

在逮捕底威脅下，父母們只得叫他們的子女出去參加示威遊行，他們必須熱烈地呼喊着，並揮着「滿洲國」的旗子。

每個公務員，每個職員，每個工人，每個能够站得起的人，不論是中國人或俄國人，都被迫購買一面「滿洲國」國旗，加入遊行。全體都必須提高喉嚨喊着「滿洲國萬歲！」

第

十

章

一 處長給我的讚語

在調查團走後的第二天，我的處長來傳我。這一次他好像很高興，他伸出了手，並叫我坐下。以下是我回憶起來的他的談話：

處長說：「我們終於能透氣了！那個老蠢貨們底調查團已經去了。他們怎樣去報告日內瓦，誰知道呢？哦……他們隨便怎樣報告，我們日本人是一點不睬的。如果國聯承認了『滿洲國』，那是更好……如果他們不承認……我們，就要不承認國聯了。這是報復。我們已經以武力征服了滿洲，國聯底一切空話決不會使我們把他放棄。爲什麼全世界對滿洲要這樣大驚小怪呢？那羣蠢貨！當我們佔領了中國，西伯利亞，菲律賓和印度支那的時候，他們將怎麼說呢……他們會看到……他們會看到日本將怎樣地使他們驚奇哩……對於每個人都是一個很大的驚奇……對於俄國……對於美國……對於法國……對於荷蘭……以及對於我們親愛的英國老太太。國聯要做的事就將很多了……他將來不及派調查團到我們將佔領的國家中去哩！」

他很泰然。他停了一回，獨自微笑着，顯然對他的辯才覺得很滿意。然後再接着說：

「當調查團留在哈爾濱的幾天中，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很感激你每一件事都照着我兩期望做好了，這是我應得向你恭賀的。如果我有時說過不稱心和中聽的話，請你不要介意……我的脾氣很躁，每逢一件事弄糟了的時候，我很容易對第一個上來見我的人大發脾氣。所以即使我在數天前對你就得太不客氣了十點，我希望你不要怨恨我。我很暴躁，我應當向你道歉。」

「對於調查團到來的事情，我此刻正在預備報告，把他拿到東京去。在這報告中，我一定要提起你優良的工作，以及你執行命令的敏捷。我們希望，在不久以後，我可以把你看作一個深堪信託的人。總之，還是無足驚異的。你既是意大利人，對於偉大豪俠的日本民族，就不得不表示同情和敬仰了。」

「你和中國民族能有什麼相同點呢？……總之，中國人算得什麼東西呢？他們是不成器的……他們永不會……除非把他們放在我們的統治下的時候。我忠告你不如改入「滿洲國」的國籍……這樣你就和中國斷絕了最後的關係。那你可以怎樣？」

我自己說：「這件事我將加以考慮。你知道，改入國籍是並不和更改一個電影節目相同的。在決定這種步驟以前，必須加以考慮，必須鄭重加以考慮。以後，如果我得到日本當局的信託，不把我當作肉票看待了，我在和家庭商議之後，或許可以聽從你的忠告的。」

處長說：「很好！你確定了主意的時候，就來看我！我將隨時準備為你担保入籍。我對你真誠的信託，現

在就要表示給你看了，請你聽着……那些盜匪捉住了五百以上的日兵俘虜，其中有三十多個是軍官。他們分成了兩三股，最大的一股是在哈綏線（哈爾濱到綏芬河）上。這些匪股的首領已對我們說過，準備和我們談判交換俘虜；兩個土匪換一個日本人。他們並要求數十萬塊錢。我們有意交換俘虜，但是決計不付分文。而且對於怎樣交換和在那裏交換，我們都覺得有許多困難。因此我想到了你，你一定能把這進行兩月毫無結果的談判作一個成功的結束。差不多每個匪首都是中國軍隊底舊軍官，你或許認識他們的……如果這樣：你講起條件來就比較容易了。我要特別要求你的就是要極端秘密。必須不使一個人全開知道，日本軍士被盜匪擄了去。如果盜匪，或中國人，或俄國人說出這樣的話，我們只要發一次堅決的否認，就沒有人會相信他們了。但是如果你所說的事情就困難了。那就是必須保守最大秘密的原因了。

「在兩三天內，那軍士匪幫派使者到這裏來。你將和他一同回到他們的山寨裏，和首領去講條件……我還要你來確定一下，是否真的有這許多日本的俘虜。」

我說：「請容我說一句話，如果這些土匪是退職軍官，他們或許知道我是一個中國的公民，或許知道我會為滿洲政府做過多年的工作。我一到了他們的勢力之下，你以為他們會把我當作賣國賊來槍斃嗎？」

處長說：「那件事你無須擔心。我們差使者去，這並不是第一次……他們常常很優待他們的。」

我自己想着，中國的土匪顯然比日本的官員更守信義。我提醒我的處長說，在海拉爾，一個日本少將曾經拷打過並殺死過兩個蘇俄的使者，事前，他答應他們通過俄滿的邊界，來請求發還被日軍搶來的牛羣的。」

「蘇俄人是真正的害物，」他又接着說。「他們是應該盡被滅滅的……現在讓我們說到另一件事。我會經吩咐你去把兩個中國富翁，張鳳亭和穆文煥監視起來。因為我聽說他們要想和李頓調查團交往。偵察的結果怎樣呢？」

「毫無結果，」我對他說。「以我看來，這兩個有錢的中國人也和其他的中國人一樣，是反對「滿洲國」的；但是他們太聰明了，不肯把他公開表示出來，因為他們不願意財產被人擄奪。如果你們日本人要佔有他們的財產，你們只像沒收其他許多人的財產一樣地把他沒收過來就好了，用不着這許多麻煩的。如果你以為這些人會公開反對「滿洲國」的計劃，那你是希望得太過分了。」

處長好像歡喜着我的直率。他笑着說：

「你說得很對。可是這兩個中國人在國內外的朋友太多了。如果我們不經法律手續沒收了他們的財產，這不名譽事件是太大了。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指出他們陰謀反對「滿洲國」，這全部事件就可以用正常的司法程序來做了。無論如何，我們且把他再作計畫。」

「現在你可以去了。一候盜匪的使者到來，我當來通知你。」

我辭別了處長，回家去了，在門口遇見我的第一號人員等待着我。他和我走過了日軍第二科發給我和助手會見的那個房間。

我們一走到裏面，他就關上了門，對我說，我的第四號人員已經失蹤了，他已經找了兩天，毫無結果。我就去第四號所住的旅館裏，旅館裏的人對我說，他是於三天前離開房間的，把一切所有都帶走了。打長途電話到大連和山海關去也一無結果，沒有人看見過他。

第二天，當我走進莫迭爾飯店的時候，有一個招待室的茶房遞給我一個封口的信封。當我把他拆開的時候，我呆住了。裏面是一封第四號用俄文在莫迭爾飯店的信紙上所寫的信，這封信我仍舊保存着。這裏就是譯文：

「親愛的范士伯先生。」

「爲了很嚴重的理由，我不得不離開滿洲了。這些日本豬羆，在強迫我爲他們做可憎的工作之後，他們又想來收拾我了。可是，不在你的面前說明我的正當的行動，我不能就走，你是時常正直待我的。這里就是使我失蹤的真實的動機：前月中，兩個和我在瀋陽共過事的憲兵大尉對我說，要綁架傅家甸（即哈爾濱道外）交通銀行的中國行長。

「因為他警術嚴密，我們決定去逮捕他。一個叫做那普(Krippe)的俄籍憲兵人員，一個軍官，兩個日本憲兵和我自己走到他的家裏，把他捉住，并帶到了傳家衛憲兵隊附近的一所空屋中，那裏，兩個大尉在等着我們。」

「他們把這銀行行長倒吊了起來，這兩個大尉又吩咐去把他的妻子捉來。當她到來的時候，他們把她的丈夫指給她看，並對她說，如果她不去拿三十萬塊錢來，她的丈夫將一直這樣吊着。然後他們會地快去想法，兩小時後，她帶着十八萬現款回來了，她把它交給了兩個大尉，說她不能在這樣的短時間內籌集全數，但是如果他們把她的丈夫放了，她答應於十五天內，再將餘數送來。」

「那位銀行行長恢復自由了。在他走後，這兩個大尉給那普和我每人一萬塊錢，叫我們不要說出關於這件事的話來。」

「今天早晨，日本領事館底警長把我叫了去，並對我說，他已聽到那架交通銀行行長的事了，叫我給他八千塊錢，否則他就要把我逮捕起來了。」

「我是深知日本人的鬼戲的，我曉得這事情完了。即使我付出了錢，他們仍舊要把我埋到地底裏去的……因此我想還不如拿着一些錢，逃到別處去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求你原有我的錯誤，請你相信我。」

「你的第四號。」

一個以鉛筆寫成的附白說：

「我叫茶房於三天後把這封信交給你。請你不要罵他。」

讀了上面的信後，我就離開了這飯店，一直到處長那裏，把這有趣的信給他看了。我以為他要發怒了，他却並不。實際上，他把它當作一個大笑話。捧腹大笑了一回。笑聲停後，他說：

「那就是我所說的簡捷工作了！在兩小時內得了十八萬……」一對多麼能幹的寶貨……那兩個大率！他們據理是應該平平安安地享受這金錢的……但數目是太大了。我聽得，如果他們知道我購得了這事情，要叫他們把已經到手的金錢，拿出大部分來歸公，他們一定要不快樂的。可是，我所驚奇的，就是他一方面像是騙子，另一方面却像是呆子。竟把兩萬塊錢給了兩個俄國學生……這真是不可思議……如果這件事被我們在日本的，愛裏格未有過五塊錢的將軍官知道了，他們就會起一次革命哩！」

他立刻打電話給憲兵隊，吩咐馬上把那普特押起來，關在審堂中，聽候他來發落。

這兩個憲兵大尉不得不把十四萬元交給了處長。他使他們保留了兩萬。那普特被拘禁了四十三天，天天遭着毒打，直到他說出藏錢的地方爲止。他所得的一萬塊錢，還有九千六百未會化用。在發現了金錢之後，他仍舊被帶回憲兵隊服役，好像沒有這回事一樣。

二 處長的賞識

在給他看第四號探員那封信後的兩天，我因公去見處長，他叫我等一會兒。過了半小時，一個日本人，和一個中國人進來了；這兩個人我都不認識。那日本人和處長說了幾句話就走了。然後處長就介紹我和那中國人相見，他是一個身材高大，相貌平常，年紀四十左右的壯漢，處長對我說：

「這位中國人就是一股橫行北滿的盜匪的代表。他對我說，他們俘虜了兩個日本軍官和三十個日本兵士，他們要想以這些俘虜來交換幾個被我們關在囚獄中的弟兄。他準備留在這里爲質，以他的生命担保你個人的安全。明天，你和他一個他的弟兄出發到海倫去，你當在他所指定的車站裏下車，不論他把你帶到那裏，你只要跟着他走。當你到了匪窟的時候，你當確知究竟有否日本俘虜。如果有的，你當寫下他們的名字和番號，然後談判交換的條件和方法。」

次日上午七點鐘，我由這中國人的一個手下伴着，乘車到海倫去。他一路上並不說話，只以點頭或搖頭回答着我的問題。直到離哈爾濱五十公里的李家窩堡地方，他才很恭敬地提議下車。我們離了車站，進了一個鄉村，穿過了幾條街道，走到一所中式小屋的面前，那裏有兩匹配好鞍轡的蒙古馬站着。我的嚮導

者並不請求任何人的允准，就解開了馬繩，把一條放在我手中，叫我上馬。我們騎行了六小時，到下午三點光景，已到了另一個滿洲村落了，那裏有一羣中國人攔住了我們的去路。在我的同伴聽了輕輕的幾句話之後，這羣人就走上前來，要我把眼睛包住了，我欣然表示同意，這樣又騎行了二十分鐘。當他們把我的包眼布移去的時候，我看見已置身在一個山洞中了，那裏有五個中國人等着，其中一個穿西裝和包皮裏腿的走上前來，以很不錯的俄語對我表示着歡迎。

談判是簡短的。他們是真的盜匪，只想恢復與日軍會戰時被俘虜的二十七個弟兄的自由。他們當釋放三十四個日兵和兩個軍官當作回禮。他們同意釋放十七個兵士和一個軍官，第二天，日本司令部當釋放十七個土匪，這些土匪的名單是由匪首指出的。想到以前日本人曾經掉過他們的槍花，他們要求我留着作抵，因為，由於我的任務底重要性，他們竟把我當作一個「大亨」。

在當天晚上七點鐘，十八個包住眼睛的日本人，騎上了蒙古馬，由一個中國人伴着出發了。我託這軍官帶一封信給處長，說明着我們商妥了的交換底條件。

二天以後，在日落時分，十七個被釋放的土匪到了，然後他們將十八個日本俘虜第一隊一墩地放回到哈爾濱去。我留着當作抵頭……還不如說當作貴客。土匪們很客氣地待着我，以他們所有的最好的酒食供奉着我。

再過了兩天，最後被釋放的十個土匪到了。我的任務就這樣滿意地結束了。我仍照來的時候一樣地，團去。兩騎馬伴送着我，在騎行了數小時之後，他們叫我下了馬，拿掉了我的包囊布，還了我的手槍，然後一個中國人叫我一直向着有點燈光的地方走去。在半小時內，我到了與騰鐵車站了，那裏，和我第一次下車的地方有四十公里的距離。

在哈爾濱，廳長含笑接待着我，并大加讚揚：

「我今天就要寫報告到東京去，把你完成任務的情形告訴他們。我決不忘記把這事實喚起他們的注意，就是，你爲欲加速日兵的自由，竟肯以自己爲質。」

「現在你的第二件工作就是去營救好幾百個被護軍捉住的日人。這些比蓋匪更難對付。我們已經毫無效驗地營救了三個月了。這些護勇軍給我們以許多的困難。他們的武器、服裝和食物都是很不好的，但他們却繼續戰鬥着，炸毀火車，破壞路基，以及無所不爲地糜爛着地方。試想在日本竟還有許多理想主義者，平和主義者及其他的庸懦者，以爲一個統一的中國比一個因革命而擴散的，以及在日本軍事統制下的中國，於日本更有好處呢！」

「一個統一的中國，在今後十年，就不會買一元日本貨了……中國人製造着每一件東西……每一件東西……從玩具到槍械和軍火。在今後十年，中國將製造着現在由日本賣給牠的每一件東西了；不但

如此，他還要以出品賣給我們了，他還要以最廉價的勞動力來和我們競爭了，他們的國報比日本工人所得的可憐的工資更來得低。我們的工人和農民都不可能和中國的工農競爭，因為中國人更來得耐勞吃苦，他們在體質上更來得強壯，而且比日本人更能適應於一切的氣候和生活。

「我，一個日本軍官，對一個歐洲人這樣說着，好像是奇怪的……但是我之所以對你說這些話，就是因為我深信你是對日本人表同情的……因為我正在開始把你當作我們的人看待，而且希望你終有一天會永遠成爲我們的人的。」

略停了一下，他又繼續說：

「爲達到和中國人競爭的目的，我們已在中國建立了成百成千的工廠和製造所，那裏我們能以廉價的中國勞力進行着工作，同時在日本我們却有着無數的失業者。如果我們再以十年工夫，在中國實行統一和建設的工作，那我們就宣費了自己的死刑了。即使在那在他們尚未統一的時候，他們已把建造着兵工廠，飛機場，軍官學校等等……再過十年，我們能夠吃不消他們了。以爲中國人不能作戰的這種事是已經破除了。你已經見過在嫩江，在松浦，在齊齊哈爾，以及在其他各處會聽中廢棄的遺蹟。他已經寫過他們在今天……這些匪徒……他們像殘廢地睡着，凍僵如玉潔一人，他不肯起，他們遺棄着，是，但我們都找不到他們。我們以爲他們已被殺滅殆盡了，但是我們的大軍却在那裏，他們的人數

却每天被殺害着，而且成百成百的日本兵被他們俘虜着。十年……如果再讓他們十年，我們就不停着，不單在中國，就在滿洲，朝鮮，甚至或許在日本。十年……使四萬五千萬的中國有了武裝自己，和組織自己的時間……那末……我們便給他們任意糟塌了。這怎麼可以呢？如果日本不決定採行軍事獨裁，如果不把成百成百的理想主義者，平和主義者，危險昏庸的騷動者槍斃……我們的國家就完了。我們必須現在就征服中國。每過去一年，就使我們的任務愈感困難，如果我們等待得太久，這將成爲不可能了。

「只有統制了中國底自然富源，我們才能執行偉大的綱領，把我們的海陸軍增加訓練，使全世界唯命是聽，把我們的帝國按照着計劃擴張起來。」

「日本一經控制了中國，就能不論何時隨意窺覬西伯利亞，印度支那，菲律賓，印度，紐西蘭和澳大利亞了。沒有中國，日本就只好回到島上，去吃魚度日。」

「我恐怕我的說話已太煩絮了，但是有時這樣說一回，是可以使一個人輕鬆一點的。」

「那末……如果你沒有別事，我就想請你和我一同吃中飯。」

我接受了邀請。我們就走到這位神秘人的住處的樓上。我們所吃的是西餐，而且我看到處長在餐桌上彬彬有禮，這都是出於我的意外的。時候我們進餐的是兩個日本的少女。

這機遇好像是於我有好處的，能够使我對於這個怪人的好奇心，設法得到滿足。他有時好像是一個

君子，有時又好像是一個俗人；他在許多方面是有過修養的，但在許多事情上却又懵無所知；他有時候深信着日本底勝利的行進；但在其他時候，却又好像憂慮着他的國家的未來。他真是一個我所見過的最好的人。

在喝到第二瓶法國美酒的第一盃的時候，我放着膽說：

「我看你是曾經遊歷過許多地方的。」

「你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呢？」

「從你說着正確英語的事實上看出來的，雖然你所說的英語帶着美國的口音。但只有遊歷過許多地方以及在英美人民中住過多時的人，才能說出那樣的英語。」

廳長把我看了一回……然後他的表情變成嚴肅了。

「或許你是對的……但我可惜不能回答你。不管一個人在日本情報部所居的等級如何，他是不能隨便說出名字等級出身，以及任何關於他的生活的事情的。我們統統只是一個號數，並沒有名字，並沒有光榮，並沒有社交的生活。」

「你必要原諒我的虛莽……我們還不知道關於工作的談話。」

「那正是我所要說的……那兩三天之內，你就要負責全權來管理我們被擄的人員了。你或許要和

「匪徒們去過幾天生活，也是可能的。我已經決定讓你休息些時。因此，除非發生非常的事情，你可以不離開
差丁。」

第 十 一 章

一 在義勇軍的營中

四天以後，處長來叫我了。

我見他和一個大佐同在辦公室裏，這大佐說他方從長春那裏來，他對我從頭到腳地看看，並對處長說了幾句話。處長就轉面向我說：

「軍部長官對你營救日軍的才能大加讚賞，現在他不單要你和義勇軍去獲得我候補，同時也要求你去探聽一點我們所需要的消息，以便把那些最頑強的匪股加以圍剿和殲滅，你的意見怎樣？」

「還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回答說。「如果這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談判，是已經失敗了，那末這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義勇軍已經看出了日本的使者對於探聽他們行動的消息比對於營救俘虜更感興趣。那就是他們警戒得這樣嚴密的原因……我不願意去扮演有被他們看破可能的呆子。」

處長和這大佐以日語商量了十分鐘。從我聽得懂的話中，我看處長的意見是和這大佐的意見不同的，末後，這大佐對處長鞠了兩三個躬，就離去了。

幾分鐘後，當汽車駛表示這大佐已經離去了的時候，處長就衝破了沉默：

「你只要把我在這大佐面前對你所作的提議忘了。明天你動身到穆稜去，那裏將有一個義勇軍的代表等候着你。我知道你會盡力做去的，而且我是完全信任你的。我們有意以兩個匪徒交換一個日人，但我們是不付任何金錢的。設法使他們知道我們兵力的偉大，使他們知道我們強有力的空軍。要使他們曉得，我們不久就能把他們殲滅了。如果你能夠說得他們投誠，那是最好了。總之，我給了你便宜行事的全權。」

二十八小時後，我在穆稜了。我剛下火車，就有一個打扮得像俄國農民一樣的中國人走近前來，問我是否就是范士柏先生。我回答說是的，他就叫我跟着他走。在車站外面，兩匹有鞍的馬正等候着。我們上馬就走。當我們到了城市附郭最後一排房屋的時候，就有一個日本巡邏兵擋住了去路。我出示了通行證，這通行證請求着一切軍民當局不要盤問我，也不要干涉我的行動。

在騎行數小時後，我們來到了一個鄉村，那里C上校正等着我們。

「喂，你這『滿洲國』人！」

「喂，你這土匪！我回叫着，一面下了馬。」

在握手之後，C給我引見了好幾個和他在一起的軍官，其中有幾個是我的老友。

「我知道，」C笑着說：「你現在是一個外交官了，同時我們……哦我們都是土匪；但我並不妒忌你，

也並不抱怨你，爲欲表明我們的良心仍在當中，我已有一席筵筵給你預備好了。」

說了這話，他就領路走到一所有十分鐘步行路程的中國房子中。我真感到驚奇了，檯子上擺着白檯布，美酒和各種乾食品，家具是粗俗的，但很清潔。在一張檯子上放着一套優美的戰地無線電收音機。

「你不用驚奇，范士柏，你這里所見的東西，以前都是屬日本人的。無線電機，家具，盥盆，食具，食物和罐頭食品，都是從日本人那里拿來的。我的大部分兵士穿日本軍服的，我們所用的來福槍，機關槍和手榴彈也都是日本的。我們有兩尊大砲，但沒有砲彈；有許多馬匹……都是從日本來的。我們極需要一架飛機，但是迄今尙未獲得；雖然我們曾經用着兩架日本高射砲打落過五架飛機。但他們都損毀得毫無用處了。」

在飯後 C 帶我去參觀他的兵房，他所說的話是真的，我好像是在一個日本的軍營中了。每一件東西都是日本的：軍衣，軍帽，床氈等等，只是所有的記號都已被義勇軍除去了。

「請你想一想看，」C 說，「日本人終說是蘇聯政府把我們武裝起來的，殊不知以軍火供給我們的，就是他們自己……而且他們將繼續着這樣做去，直到他們或者離開這裏，或者盡被殺死爲止。盜匪……」

他們叫我們盜匪，他們却是搶劫了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財產，並屠殺着我們的家庭的傢伙。」

「那些俘虜在那里呢？」我問。

「他們是在離此十五里的地方，同我大部分的手下同在一起。我在這裏只駐了五百左右的人。」

這些義勇軍是住在中國房子中，和平民十分融洽。對於那些兵士的形容整潔和紀律嚴明，真是值得驚異的。如果他們不願意，他們並不是一定要留宿服務的，無論何時，他們都能夠隨意離去，但他們卻統統留着，而且每天有新的人員到來補充着死亡，并增加着義勇軍底隊伍。我看到了好幾個包着繃帶的傷兵。

「這些傷者是誰看護的呢？」

「我們有着四個醫士……其中有一個是外科。」

C說出了他們的名字，我認出他們都是滿洲望族的兒子。

「說到醫士，」C繼續着說：「在義勇軍中，有六個人是富家子弟，有三十個人是曾經做過官吏的，還有商人，學生，譯員等等……而他們却膽敢叫我們盜匪……他們，自己是專門屠殺我國人民和毀壞我國家的人。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爲了祖國的自由而戰。我們是不搶劫一個人的……我們專打日本。人因爲我們是在自己的家中，這是我們的國家……每個人都是有權利從盜賊和殺人者那裏保護他的財產的。他們在鄉村中怎樣對待着我們，你曾經看到過嗎？還是因爲他們知道我們是中國的兵士，知道我們是爲了從日本強盜那裏解放滿洲而作戰的。我們襲擊着每一件日本的東西，他們的火車，他們的儲蓄，他們的財產，對待漢奸也是同樣的。」

「日本」人竭力掩飾着他們的損失，但我能確實告訴你，沒有一天義勇軍是不向着他們攻擊的……而且凡是我們所要毀壞的東西，我們是很少失敗的。我們將繼續這樣做着，直到他們離開為止。日本不敢冒險到離鐵道幾公里的地方來。我們就是這里的主人……你已經見過我的手下來去多麼自由……日本人是不能走得這麼遠的。」

是盜匪嗎？……日本的宣傳者直至今日還時常利用着同盟社把義勇軍叫做盜匪。如果這種中國的愛國者是「盜匪」，那末我們就可以真實地說滿洲是充滿着「盜匪」了，因日軍第七旅團長原部少將在一九三二年二月的報告中所說起的就是這些「盜匪」。他在這報告中寫着說，單是他的兵力在十次戰爭中已經損失了五二〇人。在日本軍事當局通管計算的基點上看來，我們可以確然假設原部旅團一定已經差不多全被殲滅了。

日本的宣傳和同盟社為欲在世界人士之前毀壞義勇軍的名譽，以及為欲說明日軍存在和活動的正當，因此把義勇軍叫做「盜匪」。這些在日本人幽囚溥儀的皇宮裏舉火的愛國者，這些焚燒日本車站、日本車站，以及轟炸日本火車，攻擊日本軍隊的愛國者，如果是「盜匪」，還不如說是英雄。

郭泰祺公使於一九三四年九月在國聯第十五次會議上，這樣解釋這些所謂「盜匪」的人們底活動：

「……一種被蹂躪的人民抗議並抵抗暴動非法的軍事壓迫底運動，夾雜着永不失望的偉大的主義，並繼續着散兵戰爭，直到最後解放機會的到來……今日滿洲的情形在實質上仍和佔領初期的情形一樣。是的，日軍出動，佔據主要的城市和鐵道線，並竭力以不斷的膺懲軍役威嚇着民衆……」

滿洲五條幹線底亶事的報告，就是滿洲情形的最好的證據。在這報告中，他們宣告着說，「一九三五年，在滿洲共有七十三次毀壞國際火車事件，一百三十一次武裝襲擊火車事件，七十四次焚毀車站事件，有三百四十個鐵道僱員被殺，六百五十個受傷，四百五十一個被擄。」

如果我們以爲一九三五年這五條幹線是在日本人的手中的，那末，在這亶事報告中所說的死傷，大部份一定就是日本人了。

二 有趣的意外事件

正當天色暗下來的時候，C和我上了馬，由好幾個軍官和十個義勇軍護衛着，騎行兩小時，才到了他們禁閉日本俘虜的地方。

在C的屋子中吃過飯之後，我們就到另一所充作會場的屋子中去。這是一所獨立的平房，地上鋪着石板。這大廳以前一定是做過牛棚的；地板上滿佈着青草，那里有着好些籃子，棧子和一架無線電機。

約摸有四十個軍官坐着，有幾個玩着紙牌，有幾個打着麻雀，同時其他的人在看書或談話。

當我們由C領着頭進去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立起來了。在把我介紹了之後，C就說明着我的來意，於是討論就開始了，所有的人都同意交換俘虜，但有許多人懷疑着日本人的話恐怕上當。

我向他們担保着說，只要這談判交換是經過我的手的，我就不肯贊助謊計和欺騙的。在長時間討論之後，我們終於同意先把五十個日本人送到一個有兩天路程的車站上釋放了。然後，在一百個義勇軍護衛之後，他們當再釋放其餘五十個日本人。

我是在C的屋子裏過夜的。他們已爲我預備了一張很好的行軍牀，當然也是日本人的。但是我們發

話的時候却比睡眠的時候更多。我們談過去，現在和未來，談到我們的秘密組織，談到那些以經濟變動為軍的人物，以及少數愛錢如命的愛國者。我們也談到橫道河子和一面坡的奇襲。當然我並不忘記對C勳，處長是叫我以日本偉大的陸軍，勇敢的空軍以及在最近的將來義軍即將被滅的話來恐嚇他的。我們兩個人都像小學生舉行野宴一樣地笑着。

C高興地對我說，我們最親愛的朋友，橫道河子法庭的屠夫，托克馬達第二，是一個模範俘虜。他是一隻我們理想中最早恭的最順服的野狗。在第二天早晨，我將有幸和他再見了。

到早晨兩點鐘，我們方才結束談話，決心入睡。

七點鐘後，我們就起來了。到橫道河子的車廂中來見過我的S，同了其他五個加入義軍的俄人來看我。他們聽說我到了，特來向我致敬。C邀他們和我以及其他的中國軍官同進早餐。最純正的義氣和友誼都顯露出來了。

早餐後，我要求C領我去看俘虜。這些俘虜是禁閉在一塊有鐵絲網圍住的空地中，裏面約有二十來間中國房子，有幾個哨兵警衛在鐵絲網的外面。日本的軍官們佔了三個屋子，和士兵隔離着。等級最高的就是托克馬達第二。C上校，四個中國軍官，俄國人S和我向着托克馬達第二所住的屋子裏走去。在相近大門的地方，有幾個日兵在舊火油箱中洗着衣服，其他的幾個正在劈柴，由武裝的衛士監視着他們。

當我們進去的時候，一打左右的日本人就統統立起身來，並恭恭敬敬地行了幾個軍禮的著名的日本鞠躬禮。他們有幾個穿着軍服，有幾個穿着便服，其他的幾個（托克馬達第二也在其內）穿着和服。如果這個人在穿軍服的時候是像一隻獼猴的，那末，現在見他穿了和服，已有一個多月不修鬚髮，就會令人想起但丁的地獄中底老斯邁夫多雷的惡魔來。

一看到我，他就扮了一個怪臉，他原意是想扮一個笑臉的。他要想走上前來，但S却把他不容氣地攔住了。我以為他要大聲抗議的，但他却並不抗議，反而恭敬地鞠着躬，以俄語道歉着。

他是個轉變得多麼厲害的大裁判官啊！他曾經以血污的手握着成百成百的中俄人民的生命，他曾經逼着獸性發露並拷打着人民，現在，他在俘獲者的面前，他甘心在泥土中掩面了。和他在一起的其他日本軍官也是一樣的，統統不斷地鞠着躬，這些可怕的「武士」這些勇敢的是軍軍官，這些發誓無武器的人民的人，這些痛苦和強姦少女的人。現在他們的勇敢到那里去了呢？勇敢嗎……野蠻人夠勇敢……更原始「神道教」影響的野蠻空想主義底勇敢。

我走到托克馬達第二的面前對他說：

「我是由日軍司令部差來營救俘虜的，談判尚稱滿意，我希望在今夜，第一批的五十個人就可以回哈爾濱去了。」

「謝謝你……謝謝你。」他最歉意地說，身子差不多斜到地上了。「你是一個偉大的，可敬的君子，一個很偉大的，可敬的君子……如果我恢復了自由，我不會把你忘了的……我希望你能設法使我和第一批俘虜一同回去。」

「那是須由 C 上校決定的，我並不能作主，但我可以竭力設法使你和第一批同去。」

我們離開了這屋子，我能看出，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樣地覺得厭恨。這個下賤傢伙原來就是數星期前恐嚇着要槍決我的專制魔王，我真想不到這是可能的。

我轉向着 C 說：

「把這畜生痛打一頓。那是多麼痛快呢！」

「一個人是時常應使好友滿意的……今天夜裏，你就能有實行希望的快樂了。」

「真的嗎……但是那樣，當回到哈爾濱的時候，他們就很容易把我槍斃的。」

「每一件事都是可以抹布的。」他笑着說。

當暮色來到的時候，他們把五十個有病的受傷的韓屬，韓屬日本俘虜包住了眼睛，扶上了馬，由二十五個義軍護送到有兩夜路程的鐵嶺火車站中去。爲了日本的偵察機，這全隊人馬在日間須得隱藏起來。我叫一個被釋放的日本軍官帶一封信給處長，說明了交換俘虜底條件，並提醒他不要食言。

在這些俘虜出發了兩小時以後，C上校，他的軍官和我吃夜飯了。飯後，他吩咐把餐桌擦乾淨，然後叫我走到一個小房間中，獨自留著。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大約不出十分鐘，門一開，C就進來了，手裏拿著手槍。他走近前來，在我耳畔輕輕地說：「你要做什麼，」然後大聲說：「跑出來……你這該死的『滿洲國』人，跑出來……快些……到這裏來……」

我假裝着服從的姿勢，再回到大房間裏，在連房間的中央，我想不到托克馬達第二竟像佛徒一般地跪着。C上校把一根皮鞭放在我的手中，並把手槍對住了我，發着命令說：「現在……你這卑污的『滿洲國』人……你一定要使托克馬達第二和第一批俘虜同去，那意思就是，他是你的朋友……你現在須把你的至友打二十皮鞭……重重的二十皮鞭；否則，我就要以一粒子彈射入你的頭顱了。」

我裝着鎮定的態度，堅決地拒絕着。

「啊……啊！你拒絕嗎？很好！但是在把你槍決以前，你是仍舊要看到朋友遭打的，不過，二十鞭不夠了，要打五十鞭了。」

C轉向着一個兵士，吩咐他說：「你把這隻狗打五十皮鞭。」這兵士也做得很像，他儼然走上前來，伸手向我要鞭，并扮起着無情的面孔，向扭轉受怕的托克馬達第二看着。托克馬達第二把發顫的手向我伸着說：

「請你……請你……范士柏先生，還不如你來打我二十鞭……這傢伙是會把我打死的——」
我假裝勉強地拿了鞭，在他背上輕輕地打了兩下。

「打得重點……重點……重點……」C嚴厲地對我說，「否則，就要打五十下了。」

其餘的十八下我是用盡了臂力打的。托克馬達第二像一隻被捕的山狗一樣地號叫着。

鞭打過後，C吩咐把托克馬達第二帶回到他的屋子裏去。我陪他到路上，爲了我在這「可怕事件」中的「不願意的」工作表示着歉意。

然後我走回來，所有的人都盡性大笑了一回。

我一面打遣畜生，一面想起了成百成百被他所害的無辜的人民。

一共費了十九天工夫，才把所有的俘虜統釋放了，因爲每一隊都是取着各別的路線送到各別的車站的。

當一切完畢了的時候，我就和C上校以及他的勇敢的軍官告別，回到了哈爾濱。

處長把我像英雄一樣地接待着，並對我說，他已向東京提議，要把我升作他的副手。

結果，托克馬達第二因爲穿着和服被捕，失了體面，被送回日本去了。其他的日本軍官也因羞甘作俘虜而被遣送回國了。

第 十 二 章

一 新式綁票

在第十章裏，我已經說過兩個憲兵大尉勒索十八萬元的事，結果，使我的第四號人員逃開了哈爾濱。這件成功的傑作已經激起了無盡的豔羨和效尤，綁票現在已成了日常的功課。憲兵所僱用的十個盜匪沒有一天不「抓着一幾個有錢的華人或猶太人。一個恐怖時代展布到全滿洲了，每個警務機關都有着擄人勒索的盜匪。在所有的大城市中，有錢的華人和猶太人都這樣地被敲詐鉅款，以求獲釋。

我這裏所說的，不過是些親眼見過和親手做的事情。凡在我背後所發生的或別人告訴我的事件都並不錄入本書。

滿洲是一個廣大的區域，而且，正如我以前所說，各種日本的警務組織都是沒有聯繫或接觸的。而且，有許多肉票，尤其是華人和猶太人，於付出贖款之後，並不報告警局，因為他們深知綁匪是和警局合作的，如果他們去伸訴，他們或許於失去已付的金錢之外，還會遭到更嚴重的危險。

許多受日本憲兵和特務部僱用的匪徒所犯的綁案，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因為我就是奉處長之命調查這些綁案的人，處長要想確知贖款的數目是否和繳入的金錢相等，當他親自盤問肉票——尤其那

豎豎無錢的內景——的時候，我時常充着舌人。

這裏是幾個實在的名字和贖款數目：

一個叫做王魏的富翁，以二十五萬元贖出了他的兒子，然後他又拿出五十萬元來取贖他自己的自由。

一位叫做張慶和的商人先後被綁了三次，他第一次化了二十萬元，此後又化了二十萬元，第三次化了十萬元。

穆蔚堂是一所百貨商店的老闆，他被綁了兩次，每次損失了十萬元。

商人呂泰，以十萬元贖出了他的兒子，再以五萬元贖出了他自己。

許多有錢的華人以及以前的大官全部財產盡遭沒收，被害人都被迫進入寺院。以前做過哈爾濱警察廳長的王瑞華，現在在哈爾濱俄國新墓地附近的一所寺院中做了和尚，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和他在一塊。我每星期須到這寺院一次，去看看這些退職的官吏是否都在那裏，這是我的職務。其中有幾個受這種懲罰是應該的，但有幾個却是可敬和無辜的人。

開森培克 (Kasner Bek) 醫生的慷慨和仁慈是為全社會所稱道的，凡是認識他的人，無不對他表示敬愛，他被日本憲兵的盜匪綁去了二次，每次都被敲去了鉅額的贖款。

赫立森(Hellison)醫生也遭了同樣的事件。連拉先果(Arsenico)先生是一個商人，他先被憲兵綁去，付出了一萬五千元，然後被市警察局綁去，又付了五千元，梯斯明尼斯基(Triandafsky)先生——一個商人——是以一萬五千元贖出的，厄斯金(Elkin)先生是以一萬元贖出的。希來爾得福羅獲斯(Sherel de Florence)先生是以離開猶太人會堂的時候，被六個武裝人員執住的。雖然當場贖見的人有二百以上，警察却處之淡然，並不干涉，因為他們深知這些綁匪都是在憲兵中服務的俄人。希來爾得福羅獲斯先生在暗室中被禁閉了一〇五天，於付出二萬五千元後，才得恢復自由。

憲兵隊長下令綁架一個波蘭學校中的學生，不料三個綁匪——兩個俄人和一個華人——認錯了人。他們不綁富家的孩子而綁了一個天主教堂所收養的孤兒。可是憲兵隊長却不肯把這小孩釋放。他說：「天主教堂是有錢的；如果這孩子貧窮，讓教堂付錢就好了。」於這孩子被禁二月之後，吉林的主教化了二千塊錢才把他取贖出來。

高福滿(Kofman)先生在哈爾濱開着一所大藥房。他外表上是很有錢的。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晚上十點鐘，他被幾個在日本憲兵中服務的俄國人綁去，關在日本憲兵在南崗的地下室中。在第二天的俄文報上，登載着高福滿先生被匪徒綁去的新聞，並且說魯坡爾晚報(Rupor)已經接到一封匪徒寫來的信，要求着三萬元贖款。在那天——十二日——的夜間，憲兵的俄國幫兇把高福滿先生從地下室裏

移到馬家溝的一所中式小屋中。

有幾個俄國人說高福滿是有錢的，付出三萬元非常輕而易舉，同時其他的人却說他不能籌集那筆款項。他們說，他財產是有的，但現款很少。

處長問我的意見如何，我懇切地對他說，我不相信高福滿的家庭能付出這許多金錢。而且，全市已發生流言，都說高福滿並不是被匪徒綁去，而是憲兵綁去的，我請他注意這種流言。

「我是並不關心流言的。如果高福滿並沒有像我們所想像那樣的有錢，猶太人協會能夠籌款來取贖的。」

第二天，十三日，憲兵同意把贖款減低到一萬五千，但是正當把這消息寫成一信寄給魯坡爾晚報去的時候，一個俄國綁匪，拉查伊夫斯基 (Lazayevsky) 進來了，這個卑劣的青年棍徒是於一九二七年離開蘇聯到滿洲來的，帶着他的同樣卑劣的眷屬。起初，由於他的父親在蘇聯領事館中工作，我們以為他是蘇聯的間諜。可是後來，這兒子已加入了可疑分子的團體，他們以愛國主義和反蘇維埃主義的外衣，掩護着他們的活動。拉查伊夫斯基因為做扒手已經被捕過兩次。他用武力手段為恫嚇，設法進了一所法律學校，在讀了數個月書之後，他又以同樣手段騙到了文憑。

當然這個惡徒團體是會引起日本人的注意的。日本人就邀請他們加入自己的殺人團體，並在哈爾

濱散布着恐怖。

因此，拉查伊夫斯基是參加高福滿的綁案的。他堅主高福滿的家庭應付三萬元金錢。他反對把贖款減爲一萬五千，聲稱對於高福滿的經濟狀況，他已接到可靠報告。

「請你讓我去問問他。我確信，如果你讓我經辦這件事情，我就能得到三萬元的。把這件事交給我，一切都會如意。」

他們答應他好好地去做。

他同了吉立正科（Kirianto）以及兩個日本憲兵到蔡閉。高福滿先生的那所屋子裏去了。到十點三十分，處長差人把我匆忙地叫了去。

「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他對我說。「高福滿死了。大概是他們使他受了刑，因爲他的心臟衰弱，他經受不了。總之，我要你去看一看，把經過來報告我。我已打電話給憲兵隊，叫他們讓你前去。」

我急忙跑到憲兵隊去，在那裏，我坐上了一輛非軍用的汽車，到馬家溝的那所中式房子去，在十分鐘內，我們就到了。

車子在一所形式討厭的建築物前停下了。陪我去的那個憲兵軍曹推開了門，我們就走了進去。在燭光下，我看出有五個人坐在桌邊喝啤酒；兩個穿便衣的日本憲兵人員，拉查伊夫斯基，吉立正科和另一個

叫做加拉斯科 (Kalisko) 的俄國人。

他們給了我一個坐位。拉查伊夫斯基請我喝酒。

「謝謝你，我不要喝。我是來調查這裏所發生的事情的。」

拉查伊夫斯基嘲笑地斜視着我，說：

「我想一個豬羶的死，總無須作什麼警務報告啊！這個猶太豬羶把金錢看得比皮肉還重。那就是他不肯向他妻子說話或寫信的報應了。我略略恐嚇了他一下，這老蠢貨就死了。像他那樣的豬羶，哈爾濱正多着哩。」

我要求看看屍體。牠躺在屋角裏，以一條醜惡的舊氈子蓋着。我俯身下去，一打開這屍體的上半部，就嚇得呆住了。這被害者的面部充滿着很深的灼痕，幾至不能辨認。燒焦的皮肉的氣味，中人欲嘔。我一進這房間，就覺得有一種催嘔的氣味，現在我明白他的來源了。我知道這事件的經過了。

「這是誰幹的？」我問。

「是我幹的，」拉查伊夫斯基回答，「所有卑鄙醜惡的猶太人，俄國的敵人，都應該這樣處死。」

我察出不幸的高福滿已受過了酷刑。在燒灼他的手足之後，他們又實行燒灼他的面孔，然後，當他在慘痛下號叫的時候，他們就緊緊地把他扼住，不料竟把他扼死了。

我把所見和所知的一切回去報告處長。他好像並不介意，只說了一句：「太糟了！費了許多心機毫無結果。」

日本的憲兵真是殺人不怕血腥的惡魔，他們因為屍體太重，他們就把他分爲四塊，拋在溝壑之中（這溝壑，就是他們掩埋在街上倒斃的毒品犯的屍體的地方。）

日本的憲兵仍舊和高福曼的家庭進行着贖票的談判。在她丈夫被害的三星期以後，高福曼夫人還把一萬八千元付給日本人，想贖取她丈夫的自由。

每處地方的日本憲兵，以及其他的日本警務機關都養着許多中俄匪黨，竟使有錢的俄人和華人不致離開他們的屋子。這真是一個「恐怖時代」恐怕比「空頭拘票」（Carte Blanche）和巴士的款的恐怖時代還要厲害。

要敲詐蘇聯公民的金錢，日本人是無須有梯架的麻煩的。他們只要乾脆地說他們是共產黨和宣傳員，把他們投入監獄，若不繳納鉅款，他們就休想從那裏出來。大多數猶太富人的遭遇也是這樣。

當日本的外交家向世界保證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的時候，他們腦子裏所存的或許就是這個念頭。他們所開放的唯一門戶，就是送人民進牢獄的門戶。他們的信條是：「拿你的金錢來，否則我們是不開門的。」

愛特加斯諾在一篇日本建立新殖民地的論文中（註）寫着說：

「哈爾濱，以前是愉快的，現在成了著名的人間地獄了……生命這樣不安全的地方，恐怕是全世界所沒有的，哈爾濱的居民，連十萬白俄和赤俄在內，不論到那裏去，即使在白天，如果不帶武裝，就會發生生命的危險。攔劫，搶劫，謀命和綁票，是常有的事。」

外國的領事不得不帶着衛士。當在哈爾濱的時候，有一天我同了波士頓州的議員丁克漢君（Tim-ham）到松花江去，他那時正在游歷滿洲。我們去訪問哈達的翰森君（George Harrison），一位各處最受敬愛的總領事。在翰森君的小屋山前有一張檯子，上面放着幾桿來福槍和自動手槍。兩邊就是警防盜匪的衛士。

「我在哈爾濱住過的莫迭爾飯店的老闆近來正為憂子失蹤傷心。他的兒子西門，開斯普（Simon Kaspe），是一個法國的公民，有奏鋼琴的天才。他已被俄國盜匪綁去。這些匪徒，以割去他的手指作為惆嚇，除非他的父親肯出三十萬元贖款。結果手指倒沒有割去，他們却割下了他的耳朵，而且終於把他謀死了。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在離城數哩的地方，就被盜黨執住了。」

（註）見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週末郵報。

二 開斯普事件

綁架小開斯普一案，在我所經手的許多案件中，是最惹國際注意的一件。事實上，我和這案件是有密切關係的，我幾乎因此喪了性命。

約瑟·開斯普，肉票的父親，是以俄國流亡者的身份到哈爾濱的，那時正在日俄戰後，在這戰爭中，他曾經當過騎兵。

他在哈爾濱開了一爿修理鐘錶的小店，在數年之內，這小店就變了珠寶店和銀樓，到一九一八年左右，他已成了遠東珠寶商的翹楚。並做了哈爾濱最上等飯店——莫迭爾飯店的股份老闆。

一九三二年，即日人佔領滿洲的時候，約瑟·開斯普開着大珠寶店；他是莫迭爾飯店的獨資老闆，又是一個戲院公司的總理，這戲院公司經營着一連串的戲院和影戲院。他的財產是有着各種不同的估計，從五十萬到數百萬。關於他致富的方法和手段，是有着各種不同的流言。

約瑟·開斯普有一個弱點：他歡喜談到自己和他的財產……以及談到他在法國贖書的兩個兒子，一個在巴黎大學，一個在音樂院，他歡喜說他的兒子們在學校中位列前茅，並替他們的學校大為誇耀：

……而且，他們已自然的成了法國的公民。

開斯普的兩個兒子既做了法國的公民，他就立即把莫迭爾飯店以及所有他的戲院的產權移轉到他的兒子的名下，因為他已看到日本人對他的財產非常注意，他是知道其中的意義的。移轉的手續一經完成，法國的三色旗就高舉在莫迭爾飯店以及所有他的戲院的屋上了。

日本人眼見這樣會賺錢的囊中物，移轉到法國的管轄之下，當然很不開心。

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初，處長早就表示過要綁架開斯普的意見了。但是他承認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開斯普是不大出外的，偶而出外，也常帶着武裝的保鏢。他在莫迭爾飯店底層的居室像是一所堡壘，門窗上都有很粗的鋼條，而且裏裏外外有着很多俄國衛士。

當小開斯普在巴黎音樂院中畢業的時候，他就到哈爾濱來過幾天。他是一個很漂亮的青年，而且是一個優秀的鋼琴師，他的驕傲的父親以為他高出帕得勒夫斯基（Paderewski）（註）之上。這位爸爸不惜斥責叫他兒子在他最上等的戲院中舉行獨奏；他並準備當他回來的時候，叫他在上海的麗萊前表演，他叫他在東京表演。

哈爾濱的憲兵早已看中了小開斯普。但他自以為是一個法國的人民，一點不疑心有人敢去綁他。他

（註）波蘭的著名鋼琴師。

是多麼錯誤啊！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處長問我法領事雷瑞特（Reynaud）和開斯普族的關係是否密切，我對他說，我以為他們並無交情。

「我自己也這樣想，」處長說。「縱令這些猶太豬擁有錢，法國領事和他們之間能有什麼共同利益呢？如果說他的兒子們已做了法國公民，法國的領事一定知道，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完全要想避免財產被日人沒收。」

「總之，法國的旗子是不能阻止我們的行動的……因此我已叫憲兵去綁架小開斯普了。據莫遜爾飯店中的探員報告，他常於夜間攜帶猶太女子外出，玩到深夜方回。但為欲使人不疑日人起見，我已決定這內票應由中國人來綁。計畫一完成之後，我就來通告你，叫老彭去挑選八個人來做這件工作。」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處長叫我差老彭帶五十個人去剿滅陶賴昭一個鄉村——離哈爾濱西北一百餘公里的鄉村，因為這裏殺死了一個下級軍官和一個日本憲兵。他並不提及開斯普的事，我以為他已經把這意思放棄了。

八天以後，我的第一號人員來報告我說，外面已有小開斯普被綁的謠言。我就把這話告知處長，他帶着慣常的微笑說：

「我也聽見過那話了……但是我並不知道詳細。就你而論……你無須操心。我已調令其他的探員進行調查……我知道你很忙……此外……在幾天之內，這就會過去的。」

就在那天晚上，我的探員們給了我一個對這綁案的詳細的報告，並說出了許多和這暴行直接間接有關的人名。這就是發生的經過：

日本憲兵把命令發給祕書兼譯員中村，他就和餐廳的督察長馬丁諾夫（Martynoff）共同商量計劃。馬丁諾夫的手下有十五個匪徒，都是我們的路報的主筆及法西斯俱樂部的首領拉查伊夫斯。這些挑選來的日本當局常在法西斯俱樂部的會員中徵募所需要的無賴。這綁票計劃就是在法西斯俱樂部中商量好的。一個希臘惡徒把小開斯普數天來的行蹤報告給中村。這希臘惡徒幾個月來常偵察着莫爾飯店的旅客的消息，并常在該飯店的附近徘徊。小開斯普差不多是每夜和幾個少婦出去的。這些少婦的姓名住址，以及小開斯普車子駛過的街名，統被打聽出來了。

小開斯普是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午夜被綁的，當時他正把車子停在一個少婦的門前。他就被帶到哈爾濱附近的一個藏匿的地方。

第二天，憲兵就寫信要求開斯普的父親付三十萬元贖款。這老頭子堅決拒絕，接二連三的談判都毫無結果。憲兵要的是錢，但開斯普先生却不肯付，他堅持必須在他兒子平安回來之後，他才肯付幾千塊錢。

他真是硬傢伙。把他兒子殺死的洞嚇，也一點不能動搖他的決心。

一個多月以後，在九月二十八日，他們把小開斯普的耳朵割下來寄給他的父親，但是這個可怖的消息並不能改變老開斯普的心意。他仍舊只肯出三萬五千塊錢，而且必須在他的兒子獲釋以後。

法國領事已向日本當局提過抗議，他們答稱正在竭力營救。

法國領事的努力僅限於一角公文，但副領事曉邦（M. Chambon）却是個精明活潑的青年，他深知日本人的答覆僅是隔靴搔癢，就僱了幾個能幹可靠的人員，開始自己的偵查。他不久就得知真相了，是因為他需要證據，他就吩咐他的人員，把綁架小開斯普的匪徒中的最年輕的一個，康密薩蘭科（Konisarenko），捉到領事館來，那裏他不單供出了實情，而且寫下了供狀並畫上了押。他就立即被釋放了，第二天副領事親自去見警務長，遞上一張控告一切和綁架有關的人的呈文以及康密薩蘭科的供狀的副本。

警局報告了憲兵，憲兵一面立刻叫康密薩蘭科避到離哈爾濱六百公里的綏芬河去，一面立刻把曉邦的人員逮捕了起來。（其中有一個人，吉爾密斯塔刻（Kirnschad）君，於我於一九三六年離開滿洲的時候，還關在獄中。

第二天，兩份日本人的俄文報，就對曉邦實施最侮辱的攻擊，稱他為醜惡的猶太人，共產黨等等，還發

繼續了好幾個星期。後來竟弄到有一個法西斯黨員要和這副領事來一次決鬥。

可是，綁架的新聞已傳到外國了。英美的報紙都注意這新的暴行。東京顯然有時也顧到輿論，她吩咐把這事情告一結束。因此，我的處長很不願意地吩咐把綁匪，依照着薩邦在書廳中所起訴的名單，逮捕起來。十月九日，馬丁諾夫和山得爾（Sandher）遂被捕入獄，同時其他的人却仍然逍遙法外，藉口說是無從緝獲。這兩個人都矢口否認知道藏票的地方。

在西門開斯普被禁錮的同時，試探性質的談判仍在這父親和憲兵之間繼續進行。

這青年肉票寫了數打的信，由匪徒交給他的父親。可是那位老開斯普先生却不願他兒子的請求及各種可怖的恫嚇，依然不肯動搖他固執的決心。他非待兒子獲釋之後決不肯付出分文。他確信自己是了不得的人物。甚至誇口說，他們將毫無所得地將他的兒子送回……不，他們還將道歉。

這種誇大的確信成了致命傷。當處長知道了這話的時候，他就沉默地說：「即使開斯普肯出一百萬，他也永不會見他兒子的生還了。」

此外，日本人還有其他不能讓他生還的理由。他們現在放他不得了，因為他已和中村及憲兵的軍官談過話。小開斯普現在知道他並不是由俄人綁來的，而是由日人綁來的……不，他們現在放他不得了……他要說出來的。

因為恐怕曉邦所雇用的探員和開斯普的僕人會發現藏肉票的地方，於是他們把西門開斯普連帶了好幾個地方。

現在尾井大佐登場了。他是路警處的一高等顧問，一換句話說，就是局長。他是一個真誠的君子——一個罕見的在滿洲留有政績的高級日官（如果不說他是武藤大將以外的唯一人物）。雖然他據着高位，在數千里的鐵道上有着全權，他却時常公正無私地行使着職權。他的行政是毫不徇私，深堪稱道。對於屬下，無論國籍如何，他都是恩威並濟。即使那些痛恨一切日人的中國人，對尾井大佐也不得不表示敬愛。在他治下的沿鐵路區域內，綁票是絕迹的。無論那個日人，如想在這大佐的治下為非作惡，不久就會遭到遣送回國的處分。尾井大佐非惟不贊成日軍當局的濫職行為，他更且深惡痛絕，並敢據實說出。他時常說，「他們可以到本國去做這些醜惡的事情。」因此，其他警務機關的人員一到鐵道區內，就必須學做好人。

當曉邦在警務處長前指名控告綁架小開斯普的匪徒的時候，憲兵就把康密薩蘭科送到綏芬河去。但是這個城市是相近鐵道，因此是在尾井大佐的治下，尾井大佐一得知康密薩蘭科在他的區域內，就把他逮捕起來，並押回到哈爾濱去，那裏，在證人之前，他又作了一次同樣的供狀，和在法國領事前的供狀完全一樣。

尾井大佐把那張綁匪親自簽押的第二次的供狀交給了日本司令部。

雖然有了這一切事情，憲兵仍不放棄從開斯普那裏取得贖款的希望。他們從起初討價的三十萬元減到十五萬元，再減到十萬元，再減到七萬五千元，最後一直減到五萬元，但這老頭子却仍舊像以前一樣，只肯答應在他兒子回家的時候，拿出三萬五千元。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尾井大佐得知俾斯科支科（Bestrilko）和薩也實夫（Zayavati）另外兩個綁架小開斯普的匪徒，常在車站中來去。他就於那天夜裏，吩咐把他們捉了起來，當時他們正想搭車到小嶺子去。他們藏匿小開斯普的所在就是在小嶺子附近，由吉立正科（Kirichenko）和加拉斯科（Kalusko）担任看守衛火車到後，這兩個看守者還不見俾斯科支科和薩也實夫到來接班，他們就疑心已出了岔子，深感不安。吉立正科這兩個中比較多心的一個，到車站裏去了好幾次，並打電話給中村，問他爲什麼這兩個人還沒有來。但中村却並不說出他們已經被捕，只叫他安心等候。

當吉立正科數次離開的時候，只剩下了加拉斯科和小開斯普兩人。加拉斯科就乘機做起自己的生意來。

「如果你的父親肯付我一萬塊錢，我就能把你放了，他就不必付錢給憲兵了。」

「你要我怎麼做呢？」

「寫一封信給你的父親，把那一點說明，並把這封信交給我。」
這事立刻就做成了。

當吉立斯科打電話回來的時候，他察出這兩個人的態度有異，就知道他們中間已經進行着某種勾當。當加拉斯科主張當晚到哈爾濱的時候，他的疑心就增加了，但他却不發一言，決計在加拉斯科動身以前再和中村通一次話。一小時過去了。吉立正科又變成焦躁不安了……他再到車站裏和中村通話，並把他的懷疑對他說了。中村就叫他轉告加拉斯科，於五點鐘到停貨車的地方去看他。

中村就同了一個日本憲兵，以及康密薩蘭科（又被釋放了）到道約會地，他們把加拉斯科執住，搜了一下，小開斯普寫給他父親的信就搜出來了，但因為這是以法文寫成的，這四個人所能懂得的就只有\$10,000的數目字。

事情已足夠明白了。中村就拔出手槍，把加拉斯科打死，然後他就通知吉立正科叫他把小開斯普渡了，並迅速回哈爾濱領護照和金錢以便逃往別處。

在執行了命令之後，這殺人者就化了名字，拿了憲兵所給的假護照，逃到北方。但他並不能逃得很遠。十二月八日，他就在呼蘭車站被尾井大佐的手下捉住了。

憲兵宣稱，加拉斯科是在和去捉他的警察遭遇時被槍殺的，這樣就釋明了他的死因。

在中村槍殺加拉斯科的第二天，拉查依夫斯基就叫我來翻譯小開斯普以鉛筆寫成的便條。這便條請求他父親付一萬元交給加拉斯科，他是答應放他的，並懇求他不要弄出使加拉斯科喪失生命的支離來。這孩子確信加拉斯科是不會失信的。

當憲兵宣稱西門·開斯普已經被殺的時候，已是十二月三日了。屍身是在淺坑中尋獲的，覆着幾吋泥土。我從未見過這樣可怕的景象。可憐的青年，他一定已受過很大的苦，他一定已受過很厲害的私刑，在和不人道的俘獲者同在的時候。九十五天的禁鎖差不多已使他只剩一副骨骼了。這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已變成不能辨認了。北滿十一月間達到零度以下二十五度和三十度的可怕的寒冷，已使他的兩頰、鼻子和兩手凍結了，一片片的皮肉已經脫下，內部已發生腐爛。他的兩耳已被割去……他已有九十五天未曾洗澡，修面或剪髮……一見了他，一想到他肉體精神所受的苦痛，反使我感覺快樂，因為他已不再受罪了。在放槍結果他生命的時候，這殺人者恐怕已算做了生平唯一的善舉。可是，慘劇還沒有結束呀！

這孩子的母親，雖然病體未痊，已從巴黎到哈爾濱來，希望能救出她的兒子。十二月三日，她已到上海了。當四日早晨她在惠中飯店進早餐的時候，她在字林西報上看到她兒子被害的新聞了。

當這孩子的遺體拿到哈爾濱的時候，他的父親不顧友人的勸告，堅決主張把棺木拿到他的屋子中來。他吩咐把棺蓋揭開，以便和兒子再見一面。這震驚是如此的大，竟使他立刻神經錯亂，發出瘋狂的號泣。

三 我被監視了

在哈爾濱，憤怒已達到白熱的程度。不單是猶太人，而也是全體俄國人，以及中國人和朝鮮人，甚至有些日本人，都完全唾罵着這樣虛假的暴行。他們公開責備日軍當局應負綁架和謀殺的責任。他們組織着公共的示威。在被害者出殯這一天，有二百五十個憲兵和一聯隊日本步兵從齊齊哈爾開來，以加強本地的兵力。

在哈爾濱，從未有過這樣的聲浪。儘管日本當局禁止儀仗通過大街，儘管有大量的軍警，全哈爾濱的居民仍舊跟着板車，直到猶太墳場。「打死日本軍閥，」「打死野蠻的畜生，」「打死可惡的蝴蝶」等口號，各處都能聽到。

高福滿（Kaufman）博士，好幾個猶太社會的會長，作了一篇葬儀演說。他用着激烈的詞句，痛斥那些謀害西門·開斯普的卑怯者，以及那些在葬後的保護者。

第二天，高福滿博士就立即被日軍司令部傳去，盡量辱罵了一頓，並恫嚇要把它逐出滿洲。拉查依夫斯基在邪惡的我們的雜誌上著了一篇長文，要求把博士加以逮捕和懲罰，因為他已經侮辱了那些愛國

的俄國人，這些俄國人不過做了一件公正的事情，殺死了一個「第三國際」的探員的兒子，一個蘇聯的猶太人。

日軍當局不肯把六個綁匪交給法庭，但爲了安全起見，已把他們關入了刑事警察的監獄，那裏他們住了十五個月以上，並未受審。那時候，人們總以爲他們並不受審的了。

在獄中，他們受着特殊的待遇，食物是從附近的菜館叫來的，每天有朋友和家屬的探望。甚至還有謠言，說他們在夜間可以出來再做些綁票或其他有益於憲兵的罪行。

從下面的事件中，我有理由相信這謠言是真的：

在一九三四年六月的一個夜間，憲兵隊的原少佐和我，帶着兩個俄籍告發者，四個日本憲兵和二十個老彭的土匪，去搜查阿什河——一個離哈爾濱數公哩的鄉村——的蘇聯公民的屋子。

霎時間，我們看見小路上有一羣人行來。原少佐叫我們躲着，讓他們再走近點。片刻之後，我們就把他們圍住了，我們的槍瞄準着準備開放。一個日本人走上前來。當他向原少佐解釋的時候，我乘機走近前去，看見有一男一女，都是歐洲人，雙手被反綁着。還有三個不認識的俄國人，其他的兩個我認出就是山得爾和吉立正科。

簡短的會話過後，原少佐就讓這一團人走他自己的路。因爲他不說什麼，我就永不知道這兩個被捕

者是誰……

可是，法國領事，開斯普的家庭，以及外國報紙的抗議却愈來愈響，他們都說謀殺西門·開斯普的人犯應該移送法庭，直到後來，東京來了命令吩咐把六個人犯移送給「滿洲國」的司法當局。公訴狀是由江口所預備的。他是著名的刑事科長。每年以十萬元賄買他的職位，就是這個傢伙，他是所有一切中俄日鮮的匪徒的祕密同謀人。這公訴狀是一件不名譽的傑作。這六個犯人被稱為「最誠實最優等的公民」；捐棄大部分生命以反對共產主義的真的俄國志士。即使他們綁架了西門·開斯普，他們的動機也不是爲了個人的利益，而完全是爲了籌募反共團體的經費，這經費是他們繼續反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神怪戰鬥所必需的。案情既是如此，我們遂不能應用盜匪法來對待他們，因爲我們不能把他們視爲盜匪。而且，我們也不能把他們視爲普通的犯人，在開審的時候，我們不若把他們當作政治犯，較爲相當。他們的罪狀是什麼呢？這些被告所犯的罪名是什麼呢？（這裏公訴狀上並不提及綁票。）傷害人體嗎？……開斯普的耳朵是加拉斯科所割的……而加拉斯科則已經死了，不能抵罪了……謀害人命嗎？開斯普也是加拉斯科所謀斃的……因此對於那件事法律已無能爲力了……勒索金錢嗎？……一點也不。開斯普並不會付過分文。因此，很顯然的，鑑於以上的釋明，可加於這六個被告的罪狀，就只有……情有可原的「企圖勒索」了——因爲這「企圖」並不是爲了個人的利益而是爲了政治的原因；這「企圖」的對方則爲一

個公認的猶籍共黨間諜，一個賊贓的收藏者，一個社會的公敵……而且因為父罪子償，西門·開斯普已經抵了他父親所犯的罪……這般勇敢愛國的俄國人情有可原……」

哈爾濱的整個領事團都說道「公訴狀」是一個可憎的暴行。全滿洲都一致唾罵。剛直公正的尾井大佐也說這種文件是日本的恥辱。

最後，他們就把這六個被告交給高等法院院長，關入監獄。

雖然法院是在日本「顧問」的操縱之下，但是如果中國法官感到公理和正義全在他們這一面的時候，他們有時也敢表示異議。

綁架和謀殺開斯普一案已放在中國法官的面前了，他們堅決知道案情的真相。他們不滿於日人所作的說明書的票面價值；他們要自己去探出某幾點來。但這是最困難的工作，因為各處都有日本的間諜和密探。當時處長對我說：

「高等法院院長要探聽這六個被告的過去的行爲，你知道嗎？他顯然對依古支所起草的「公訴狀」有着疑點。哼！他以為比我們聰明……我們且看。我已經吩咐過所有的警務機關，如果法官來向他們探聽消息叫他們一致咬定依古支所草成的「公訴狀」的事實。可是，我也想到這主席法官會去尋求非官方的消息，這裏就用得着你了。我要你把三個法官的住宅監視起來，把來訪謁他們的嫌疑份子加以逮

捕和研訊。我不要再有曉邦事件了。」（指出真實綁匪的法國副領事曉邦已被本國政府調至天津，因為日本人對他表示不滿。）

處長叫我把真相瞞過中國法官，就是爲了想保全有利益的罪行中的同謀犯的頭顱。

第二天，我請朋友介紹去見三個中國法官中的一個。我對他表示願意供給一切他所需要的，關於這些被告的消息。他深表感激。一星期後，我就把所有的文件交給法官，證明這些被告和政治完全無關；他們都是最危險的罪犯，最惡劣的積犯。馬丁諾夫於六個月之前，曾率憲兵隊長的命令，殺死阿爾賈諾夫（Arnaud）上校，謀害成打的中俄富人。山得爾和吉立正科，都是校院的總奴和白奴腹子。這金班羅徒都屬於日本憲兵所僱用的暗殺黨。割開斯普的耳朵的，是山得爾；殺死他的，是吉立正科，而不是加拉斯科。

在長時的審判中，法官常和我秘密接觸，以便叫我對某幾點加以闡明或解釋。

我也把康密薩蘭科薩也實夫，俾斯拉支科和吉立正科在尾井大佐的鐵道區內就逮時，在他們的袋中抄出的文件，統統交給了法官。這些文件明白表示這四個綁匪都是憲兵的探員，對於他們的行動沒有人可以加以阻擾或注意。因為沒有這些文件，他們是不能在鐵道線上來去自由的。在滿洲，如果沒有證明旅行目的的必要文件你就休想出門。

當這審判進行的時候日本人對於法庭所得到的這許多消息，完全如在夢中。

在二月二十六日，我接到了一封法西斯黨的首領和下流的我們的報的主筆寫來的信：

「范士柏先生，

「本黨認為先生的工作是和我們的主義相反，並於猶太人有利。先生身居高位，就應該知道所做的事。

「我們在此警告先生，不要再做反對那些我們認為兄弟和志士的人的工作。

「法西斯黨首領拉查依夫斯基一九三六二、二六於哈爾濱。」

這封信使我驚奇了。難道當我於夜間去訪誦法官的時候，有人跟蹤我的嗎？難道法官之一已漏了口風嗎？而且如果他們知道了……到底知道了多少呢？我想不如立即去對明這個故事，於是我就把這封信帶到處長那裏他含笑說：

「你切不可把這封信看得太認真。你要曉得，拉查依夫斯基是一個蠢貨。當你去看看你的人員是否監視着法官的屋子的時候，或許有人看見了你，以為你就是把消息供給給法官的人。」

一個處長並不對我生疑，我就接着說：「有好幾次，在聽審之後，我看出法官的消息很靈，我就去到他們的屋子裏，想找任何信札或便條，使我們能有一點關於報告消息的人的提示。」

處長和一個人在電話上操了幾句日語，然後說：

「我方纔打電話給憲兵隊長叫他轉告拉查依夫斯基不要再管閒事。我對他說，你去訪問法官是奉我的命令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在早晨一點鐘光景，我正從一個中國寺院裏出來，我是到那裏去訪問一個被日本人逼得做了和尚的高等華人的。我差不多面對面地碰到了福吐普羅（Fopulo）日本人派在莫迭爾飯店裏的希臘偵探。我談諧地對他說：

「福吐普羅先生深夜來這裏做些什麼呢？」

「我今晚在附近的朋友那裏攔得太遲了一點……你，范士伯先生，這時候在寺院裏做什麼事呢？」

「你一定是知道的，在這寺院裏有許多重要人物。來看看他們是否住在這裏，就是我的責任的一部分。我在夜間常是這樣地到這周圍來的，因為脫逃大都是在黑夜作成的。」

「黑夜也是陰謀的良機。」

這樣「新鮮」的答語使我很喜歡。這個蠢笨的希臘人，以前不過是一個小食店裏的侍者，現在竟想來和我鬥智了；我決計設法把他降服起來。

「福吐普羅先生，我久已想和你談一次話：如果你明天早晨十一點鐘有暇，請你到我屋裏來。你來將很快樂。」

「很願意，范士伯先生很願意，我一定來的。」

第二天，當我們兩個人坐在我園裏的一條長凳上的時候，我開始說：

「福吐普羅先生，我不知道你已經知道了我的什麼事情，我也不想知道，但是你必須知道一點。請聽我說。十七年以前你到哈爾濱來，是連襯衫也沒有一件的。當你看到沒有一個像樣的歐洲人和你交往的時候，你就去和中國人工作了……和中國人工作，你就積蓄了兩三萬元。當你以為無須中國人的時候，你就失去一切了。中國人像兄弟般的待你，他們幫助你，他們使你自立，如果你今天能遇見像樣的人，這也是全仗中國人的。你怎樣來報他們的恩呢？……事實具在。自日本人到來以後，你就為他們服務，你就像他們一樣地自早至晚鞠躬。在溥儀稱帝的時候，你是上書稱臣的唯一的歐洲人。此外你沒有一天不向中國人作着暴行，他們是把你當作兄弟看待的。那樣你還不夠，你還想加害那些效忠於中國人的人。這種行為使我的朋友大感不快，他叫我給你引見，以便給你一個警告。」

這樣說着，我就轉向着一個華人，他直到那時一直把他當做往來的行人。

「影先生，我叫着。」

老影就走上前來，向福吐普羅很客氣的鞠了一個躬。在介紹之後，他就以尖利沉靜的語氣說：

「福吐普羅先生，我的最親愛的朋友范士伯先生說你近來喜管閑事。你的多事已經騷擾了范士伯。」

先生的睡眠，范士柏先生是我的歌血弟兄，我必須使他靜靜地睡覺。以前有一個人妨害了他的安眠，我就把他請了來，款待得他這樣的好，到一星期的末日，他竟求我把他殺了。我不喜歡見你處於同一的境遇，羅普先生……生命是這樣可愛！請看……春天將來了……美麗的花……我希望范士柏先生不會有什麼事，因為如果他有了事，在一小時內，我就要把你請去，和我去過最後的一星期生活。」

老影鞠了一個躬，走開了。

這希臘偵探嚇得魂出了竅。他坐在那裏，注視着地板，反覆地自語着：「老毛嗎？」……「老影嗎？」……

……「老影嗎？」……

然後他轉面向我憂鬱地說：

「范士柏先生……我向你發誓……范士柏先生……我從未想要害你。我不過依照着中村的命令……中村是和你反對的。他說他要看你被捕……他確信你把開斯普綁架的消息給與法庭，他的名字已在法庭上被提起了兩次。」

「我把消息供給法庭，是誰告訴中村的呢？」

「我不知道……我並不會告訴他。我懇求你……請你告訴老影我並沒有和你過不去的事情……請你留心那個中村，他以爲你是和義勇軍通聲氣的。」

我已把福吐普羅屈服了，但我知道，這勝利不過是暫時的。只有數月之後，他就報仇了，當時我幾乎喪了生命。

綁西門·開斯普的匪徒是在六月中宣判的。縱令日本人使盡了巧計和努力，想把這問題轉移到愛國主義和政治上來，可是中國的法官却仍舊只看到明明白白的搶劫，綁架和謀殺。四個犯人依法判處了死刑，兩個判處了無期徒刑。

聽到這消息，全城都歡騰起來，但這慶典並不長久。兩天以後，處長就把主席法官捉了起來，並把判決宣告無效。六個月以後，三個日本法官結束了這案件，藉口說這些綁匪是愛國行動，把他統統開釋了。

第十三章

一 生財有大道

棉票僅不過是榨取滿洲膏血大經營的一個副業。

最要緊的是：「日貨必須推銷出去。」

「滿洲國」的每一家商店，都被迫售賣日本製造品。日本進口大商行送一大票日貨交各商店零售，取回收據。每星期有一個代表來點查銷去數量。倘若日貨銷售不出，或所銷太少，日本憲兵便來干涉，將該店封閉。

所以不但中商店須推銷日貨，即英、美、法商亦然。國籍並不相干：「日貨必須推銷出去！」

倘若「日貨必須推銷出去」，那就要阻止售賣其他貨物。這是日本的政策，蔑視一切公平競爭原則的政策。

日人全權控制着「滿洲國」海關，用盡其一切權力，以阻止外貨輸入，對於一般漏網的貨品，則務必使其成爲廢物，就算經過無數耽擱困難之後，外貨從海關棧房提出以後，不是已經不能銷售，便被損壞得不堪了。若是酒類，則瓶被打破；若是紡織品，則已染滿污漬。機器被弄得不堪使用；罐頭食品都打了洞，包滲

則已被用刀割裂，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秋林洋行」是一家俄國大商行。在滿洲各地都設有百貨商店，因負着匯豐銀行五百萬元的債務，押與匯豐，故該洋行各商店全都懸掛英國旗。

這是日本人所不喜的。日人對匯豐雖無可如何，但對該洋行，則仍要設法破壞，所以……他們便逮捕了該公司總經理卡西安諾夫 (Kashinoff) 及大股東卡蒂亞葉夫 (Katyeff)，巴賓素夫 (Babinoff) 與薩爾曼諾夫 (Sarnanoff) 等三人及其眷屬。他們八個人被投入監禁巨盜悍匪的大牢裏，受盡鞭笞極酷，卒至接受日人強加於他們的條件為止。

哈爾濱有兩家英文報紙，一家是哈爾濱日報 (Harbin Herald) 是英國新聞家辛博森 (Lenox Simpson) 所辦，他是以筆名普特曼惠爾 (Putnam Weale) 著名。他是天津海關稅務司辛博森 (B. Lenox Simpson) 的兄弟，因為他批評了日人的高壓手段，報紙被迫停刊，鉛字和機器全被沒收，辛博森本人且被驅逐出「滿洲國」境。他上大連進行拯救復刊的訴訟，案子鬧到英國國會和貴族院，英政府向日政府抗議，其結果與鏡花水月一樣。日本拒絕作絲毫賠償，故辛博森猶困守於大連。

另一家是哈爾濱大光報 (Harbin Observer)，是佛利特 (B. Hayton Fleet) 所辦，他用盡種種可能的方法，以保全其報紙的生命。雖然他在大光報上對於日人不加一個字批評，還是毫無效果。有許多次

他被傳去見日軍最高當局，威脅侮辱，無所不至，甚且加以抵制。可是雖受種種苛遇，他仍設法維持，繼續出版。最後，還求得好好收場，不再出事端，他才離開「滿洲國」。他現在上海辦理英國快訊社。(The News Agency)

日人雖然宣稱對於國聯決議毫不擺在心上，兩當國聯最後裁判發表時，他們仍大為憤慨。他們不盡何以整個文明世界會一致宣布日人為侵略者。這樣怎麼可能呢？他們不是天神的民族嗎？……武士道的民族嗎？……神聖天皇的民族嗎？……世界怎敢以罪名加於他們的身上？

在日人的觀念中，這是想不到的，解不通的，但是有一件事丟盡他們的醜，顯出日人「高貴」品質的，那就是他們費了許多事，作了種種準備，以愚弄國聯調查團；裝了絕大的偽飾，布了絕大的場面，逮捕了成千成萬的人，又派了幾千名警察到處防範，結果還是徒勞無功一無效果。

調查團到底還是看穿了奸狡的日本人的偽詐。那幾位老太太（日人稱調查團委員為老太太）不但能收到一千五百多封抗議和貶斥的信，而且在幾千日本警察眼前，得與各種人物會見。日人對於英國人深加鄙視，自信比最鈍的英國，靈巧得多，而竟有如此情形，還在驕傲日人的聰智看來，實在忍受不了的恥辱。

國聯調查團不但宣布日本為侵略國，且在世人面前，揭示出日本人裝假欺詐的眞面目。此舉使他們

苦痛萬分。他們以天照大神的子孫，在世界低能民族的面前，被公然宣布為侵略者、欺詐者、作偽者，這使許多人剖腹自殺的；而我所聽到日人對於國聯調查團各委員，李頓勛爵，英國，猶太人，和教會人士的種種侮蔑謾罵，更是罄竹難書。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發表後的第二天，我去見我的上司，他向我從頭到腳的注望，並說：「國聯的報告書你已經看過了嗎？」

我告訴他我已經看過。

「你若是真的已經看過，」他說，「而了解其對於我們的意義，你就應該自殺。你去罷……我再沒有別的話對你講。」

我於是便退了出來。我對我自己想，自殺是一樁重大的事情，決無人天天自殺；所以必須死得其當，並能尊重自殺時的需要，日本式的自殺是剖腹；意大利式的是離槍彈射穿頭部，而中國式的則為服毒。我原是意大利人入了中國籍，現在又替日本人工作要想了却此生而進入另一世界，得想出一個不傷及三國的感情，而又得其贊同嘉許的方法。我對於這個問題還在狐疑不定。日本人想到我對於他們的行為記得這樣清楚時也許會替我想出解決困難的方法來。

我有兩天與我的上司避不見面，安安詳詳的籌備着我的自殺，他也不來傳召我。第三天早上，我接到

緊急傳喚，他的傳喚大都是緊急的。我走進他的辦公室，見有另一日本人和他在一起。我的上司很客氣的與我握手，並請我坐下。於是他說：

「范士柏君，我已奉召回國，明天就要動身，從現在起，這位先生，便是你的上司。我已把你的工作和優點告訴過他，我想來你當能繼續工作，甚或比我在這裏還做得更有成績。」

我的新上司與我彼此對鞠了幾個躬。他已像有五十歲上下，是真正的蒙古種，滿臉鬍鬚，樣子倒並不難看。

他用俄語提高了音調說：

「范士柏君，假使我沒有弄錯，我們以前……一九一八年在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次克會過一次。你與英國人斯梯芬斯少校和加拿大人衛伯上尉在一起。我則隨日本軍事代表團辦事。」

雖然他的事實不錯，我却自認我記不起當時會和他會過面。

「明天上午十時再來見我。現在我還要接見其他人員。」

他說了這句話，我的舊上司陪我走到花園門口，對我說他對於我的服務深感感佩，並使我確信我的前程還大……「我向你新上司說了許多關於你的好話，我確信他會歡喜你……再會罷，我希望你時常記念著我。」

我對他說，我會記念他的，於是我們握手而別。

第二天我的新上司告訴我的一件事是：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使許多人丟了官。你的舊上司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就任了北滿的日本情報處長，便把大批諜報主任撤差，而留了幾個我希望能有好成績的。你是留任之一，我希望你勿負我的信任。現在小心聽我要對你講的話：

「東京有許多把國聯的不公裁判歸咎於滿洲的日本當局，實他們不能阻止調查團接獲千封信，和與人會見數百次。這是我所不信的。縱使調查團沒有接到一封信，沒有與一個人會見，其決議也還是一樣反對日本的。國聯是由共濟主義者和猶太主義者、法國和英國組織的……他們都是沉湎一氣。決定國聯政策的是共濟社員和猶太人，再沒有別的。國聯已定了他們的決議……我們也要定我們自己的。這是我所定的程序。

「從今天起，共濟社員、猶太人，以及同情於他們的人，無論是誰，在「滿洲國」都不得有一刻的安寧。必須間接的使他們受迫害，遭刑辱，吃盡苦頭，不得休息。我們必須使他們過不堪的生活。我們必須使那班壞蛋曉得我們日本也會選舉，而且選舉得很利害。從明天起，我已令我們的兩家俄文報毫不留情的向猶太人共濟社員青年會（那是猶太人與共濟社員的集合）大施攻擊。對於猶太富人，須天天綁架勒索，贖

款不像我前任所索的那種微細數目，而要大筆鉅款，共濟社所青年會所須加封閉；「滿洲國」審判這一班下流匪類，未免太好了……他們縱與共產黨無關，也是半斤八兩……從今以後，將要有一場爭鬥……沒有他們存身之地……那個姓影的中國人在那裏？

「他帶着五百人，在海倫附近。」

「他在那邊幹什麼？」

「他在播蕩四個鄉村，騰出地位來給六百五十名日本人居住，他們幾天內就要來到這裏。」

「他在那邊已有多久了？」

「兩星期。」

「要兩星期嗎？……趕走幾百個窮苦的中國人……要兩星期之久嗎？像這樣的事務，兩天便做完了。」

打個電報給他，把手下交給一位官佐，要他帶了五十個人上哈爾濱來……」

次日的哈爾濱時報(Harbinske Vremia)和我們的報(Nash Put)兩張白俄報，常常開始轉載謠言侮辱共濟社員猶太人，和青年會了，那種攻擊青年會的記載，實在不堪入目。那個組織當時是在一位能幹的美國人海格(Hegg)先生領導之下的，他是費了十五年的努力，使那青年會成爲一個第一流的教育機關。以創辦小學開始，這位優秀的負責人，終於相繼設立了一所中學，一所高級科，科學，文學等學科

的專科學校了。這些工作，自然是青年會通常體育活動以外的事，體育是青年會本來比較其他團體，更為重視的活動。

海格夫婦是為人人所敬愛，人人所歡迎的人，那不僅在哈爾濱如此，全滿洲都這樣。但那最無的放矢的侮辱，却加到這一對可敬夫婦頭上了。青年會的學生，被侮為無惡不作的人，且造謠說他們都吸鴉片，又說女學生大部份是娼妓等的謠言。

那家日本御用報我們的路的那個俄國編輯萊特查葉夫司基 (Radzhevsky)，覺得他的種種謾罵，對於青年會的會員並無影響，於是便轉以暴力從事了：幾個學生受到法西斯黨徒的毆擊，有幾個女學生給大庭廣眾中被侮辱了。

在這種情形下，持續到兩年之久。但海格君怎能抵擋得住日本憲兵為背景的種種暗箭呢？漸漸的，那被被迫的青年，不進青年會的學校了：到一九三五年，海格君覺得他自己也被迫得要走了。雖然，青年會依然在哈爾濱存在着，但那是已經給日本化了，會員不到從前的十分之一的人數了。

哈爾濱的共濟社社員百分之八十是外國人。有英美人，有幾個丹麥人，又有五六個俄國人，日人主持下的那兩張報紙，拚命的攻擊他們，那位為哈爾濱人人所崇敬的該會主任納維爾 (Newell) 君，年歲已經七十歲了，受到了非常無恥的攻擊，在該會任事的他的兒子，也受到了同樣的攻擊。那些俄國共濟會員，

則受到了種種無所不有的侮辱，跟着是受到威脅，到頭來是強迫不准參加開會活動。

日本人對「基督教青年會」和「共濟會」雖然侮辱和輕蔑的攻擊，但他們對猶人社團和猶太教堂的作爲，可說已達到無惡不作的頂點了。

滿洲猶太集團的主席考夫們博士(Dr. Kaufman)是個醇厚的學者，無論是否猶太籍人都敬愛着他，但那兩張日本報紙，逐日攻擊他有好幾個月。在街上他常常被日人雇用的白俄來毆辱。我的新上司會指使兩個俄國兇徒，在夜間去擊毀兩所猶太教堂的所有玻璃窗，等到修復了，却又給磚石重行擊碎，到後來便聽他自然不再修理了。所以在冰點零下三十度的氣候中，一般宗教場所常常窗戶洞開的受着寒風的侵襲。

當影和他的部屬五十人回駐哈爾濱的時候，他的職責便是專門綁架有錢的華人，索取巨大的贖金。他其餘的部眾又分成兩隊：一隊專門在中東路東段攻擊火車，這樣可以阻止俄國貨物從海參崴出口；另一隊專門散佈在吉林依蘭的北部，在那裏他們專威逼華農放棄他們肥沃的土地，來讓日本移民佔據。有二十萬畝良田的地主，便被他們藉口有罪而驅逐走了。

凡願意不抵抗而讓出的地主，每人得收回一元錢一畝的地價；如果不肯的話，便由日本匪徒硬轟走了。

可是這種強盜行爲有什麼效果呢？在一九三四年的三月中，他們率命趕走土龍山區的華農，華農們正組織好了一隊義勇軍在等候他們。經過一次劇戰之後，他們遺棄了一百多具的死屍而潰退了。

日本當局當然很不滿意；他們命依蘭佳木斯的駐軍，率領了他的隊伍，向叛變的華農進攻。但是土龍山駐軍是由東三省土著組織成的，由華人謝文東率領着，當日本少尉帶了他部衆到來的時候，他帶到全隊「滿洲國」駐軍，已投向農民方面去了，結果他和他的部衆全被殲滅。

一月以後，有十架日本軍用機，把這三個小村，不斷的轟炸了兩天，結果給他們毀滅和崩潰了；於是日軍進駐到那裏，在他們後面緊跟着的……却是一羣日本移民。

這羣移民……是什麼樣的人呢？

據日本官方宣稱，他們的體格和品性都經過慎重選拔的，並且曾經過了兩年的獨身訓練。大家看來好像是一羣優秀的青年。在實際上呢，即是自己的同胞，都願他們愈走愈好。這般少年農夫，對於黃豆，高粱，花生和其他農產品的種種，可說毫無經驗。他們怎會有收穫呢？他們等到中國農民辛辛苦苦收成的時候，在日本憲兵和兵士監視之下，他們不勞而獲的將華農的心血，搬到自己家中去了。

幾百個華農一年來手足胼胝的結果，都給所爲日本移民搶去了，但他們搶了田地中的一切不算，還要強帶走年輕的女人。

這般日農又怕農事工作折壞了他們的腰，所以又強迫華農全家替他們工作。華農的調報僅僅勉強彌口，所有的收成和姑娘都屬之於日本地主了。

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廿六日憲兵隊的井上少佐，司法處的隊長和我三人，由二十個日兵護衛之下，到大東溝附近去調查七個日本移民被殺的情形。像普通一樣毫無證據發現，但少佐硬命把鄉村莊全給轟毀了。

回來時候，我們走到蘆薈湖附近，遇見四五十個中國男女老幼，由日本憲兵和幾個日農押送着。井上少佐停住問他們是誰。一個像領袖似的日本人回稱，這都是他的佃戶，是兩天前夜裏逃走的。憲兵替他找了回來，現在正押送回去。那一羣亡命者的慘慘狀況真不忍多看。我發覺他們許多人已受了殘酷的鞭撻；他們的面頰上手上都已血肉模糊。但井上少佐却一些沒有說什麼，他毫不驚奇，毫沒同情心，中國人長什麼東西？他們不是該被天神後裔——武士道——所鞭撻的畜生麼？

雖然他們用盡了逮捕，綁票，拘禁，暗殺，沒收，毀壞和一切橫暴的手段，但滿洲終於成爲所有日本人的幻夢了，使「文」「武」「貧」「富」都感到失望了。滿洲已變成了海市蜃樓；牠已成爲日本人背上的千斤罈。一個巨大價值的產業已相反地變成債務了。他們殺害和趕走了許多中國人，他們忘記了華農，華農的興旺是靠着中國人的努力。華農爲了自己耕種的土地，和在死亡威迫下所幹的奴隸，完全不相聞。

的。每年從山東到關外來的幾萬移民，已完全由日本人代替了。但日本人專事搶掠，反而使幾萬中國人投
向祖國懷內去了。所有的礦業也運遇到同樣的命運。歸納一切的說起來：「爲什麼要工作呢？反正都給日
本強盜搶去就完了。」

日本在滿洲軍費的負擔超過了一切，日人對此感到了莫大的失望。他們本來宣稱在佔據滿洲一年
之後，祇要二師團和憲兵就足夠維持滿洲的治安了，他們認爲在幾月內就可以肅清義勇軍和匪徒了，他
們夢想蘇維埃軍隊，祇要經過他們一次軍事示威後，就可以從邊境後撤了。現在一切觀察都錯誤了，所有
希望都變成鏡花水月了。甜美的梅子證明已變成苦味蘋果了。現在，經過了六年，有許多師團兵力和幾十
萬警察，反而使義勇軍和匪徒較從前更活躍了。他們處處使日本人感到棘手，就是日本人肘腋之下的南
滿鐵道，現在也常常受到襲擊了。

至於蘇俄政府，他們在邊境上駐有三十萬新式武器的精選軍隊，使得日本至少遣派二十五萬的兵
士來作防線。從南次郎大將在海拉爾對軍官們講話中觀察，可見日本人是怎樣感到頭痛。他說：

「你們必須時刻時刻作動員的準備，現在的情勢還沒有允許我們解甲放馬。日本決不能每年消耗
幾千萬，來支持這樣巨大的一個軍隊，作對蘇俄的防禦。俄國必須向我們簽訂不侵犯條約，而把他們軍隊
撤退，否則我們迫不得已，將用武力來趕他們回去了。」

二 帶着血腥的錢

我的新上司，我已經說過，看上去很像一個溫和謙虛的愛好和平者。他從不談盛氣或冒犯別人的話；就是他對他下屬有所指正或責備的時候，他也像牧師一樣低聲地備備善誘……但就派一撥他堅持着的，就是金錢……多弄些錢……錢是最有價值的東西。他常常對我們說：「日本很窮，日本窮得很哪！我們首先應該負擔我們巨量的軍費，我們佔據滿洲不是來消耗錢的……我們所有的消耗……我們爲了占領滿洲的一切消耗必須仍取價於滿洲人。」

「弄錢……多弄些錢！增加稅收……擴充獨占……多捕些人民……努力綁票……肉票愈多……贖款愈多……錢……錢……錢……日本軍隊需要着錢……憲兵官員們必須囊中飽滿着……警務機關需要現款，要不少錢，要不少錢……現在大家快些去設法弄錢啊！」

他們於是都去弄錢。到處祇聽見綁票，滿洲各重要城市都充滿了恐怖的黑影。從前將這些罪狀加諸土匪身上的傳說，現在沒有人再相信他了；他們都曉得日本當局纔是真正的綁票匪。

從前私下低聲的議論和怨恨，現在已公開和高聲的批判了。尤其是外國人中聞，他們都攔序日本當

局說他們是犯這許多罪惡的兇徒。安置肉票的警局和憲兵隊的地址，綁人勒贖者的名字，都已全圖佈置佈出來。哈爾濱領事團曾開過幾次會，討論綁票和日貨獨占的事，有幾個領事並且提出日本當局參與這些暴行的書面證件。

一位中國婦人，她的丈夫在一月之前被綁，據她說她到警察廳去營救她丈夫的時候，她聽說其中有一個警探，就是向她接洽贖金的匪徒代表。

一九三三年正月八日在齊齊哈爾，有幾個匪徒闖入了一個有錢華人的家中，把主人夫婦和僮人都鎖在一起，正在開啓鐵箱的時候，花園中的保鏢向他們開鎗，打死了兩個，其餘便逃走了。被殺的二個人中，認得一個是日本憲兵隊所雇的俄員，一個是日本翻譯員。

我爲了整我的職責起見，不得不將外人中的非難和不滿來告訴我的上司。他却淡然的說，全衆的顯言於他毫不相涉。如果外國人不歡喜和不滿意「滿洲國」，唯一的辦法就是請他們滾出去。

幾個月來公開的指斥愈鬧愈響，這使得我的上司也不得不相當注意了。似乎軍裏有調令來就，這話言必須設法遏止纔好。

我們上司召集全體警官開了一個秘密會議，討論到現在的情形和如何應付的方法。兩天以後警察廳刑事科在各報發載下列的告示說：

「現在我們已發現誰是真正的綁匪，誰使得哈爾濱和他的隣區發生許多的恐怖事件。這兩個兇惡的罪犯就是凡勒斯基（Valko）和門特立卡（Martika）。警廳現正在審查之中，大約不出幾天之內，或者僅在幾小時內，就可以真相大白而使他們難逃法網了。」

在宣佈這「希奇消息」的幾天後，警廳刑事科又以許多事實和傳說供給各報，來羅織這兩個「兇徒」的罪狀，說他們曾綁過許多人的票，在每段歷述之後，都聲稱他們將不久被捕入獄。

日本當局這種掩耳盜鈴的虛偽宣傳，會使聰明的羣衆相信麼？當然不會。每個人都明瞭這類事件。民衆都互詢着道：「看他們對我們玩什麼戲法呢？」他們這樣說，因為他們曉得凡勒斯基因為犯了竊案，被禁三年，纔從獄中出來，他和這許多「兇徒」是無關係的。並且他三年來自處困圍之間，怎能分身來幹那綁人勒贖的勾當呢？

這班日本人真太聰明了！

至於門特立卡呢？他不是一個專事竊竊的小偷麼是呀……這真是一幕什麼滑稽劇呢？不久這内幕便揭開了。

在一個下午哈爾濱各報都出了一張「號外」：宣稱凡勒斯基和門特立卡假在郊外沙灘村的一間小屋子，被警務人員發現，當即奮勇圍捕，經自動手鎗對去一百五十粒子彈之後，這兩個兇徒，終於天網恢恢，

挨的被擊斃了。

在這幾天報紙之上，登滿了當時劇鬥的詳細描寫，警探的勇敢狀態，並如何在盜窟抄獲許多軍火和武器……現在哈爾濱和北滿可以安甯渡日了……可怕的恐怖已經消滅……兩個危險的綁匪已經正法了，末了對警探的義俠精神作許多謝辭。

我上司和東京方面，以及東京和長春方面互用電報道賀，各警務機關領袖也相互地慶賀……對有力的警探款待以慶功大宴……賞賜和獎勵……一幕一幕的喜劇在表演。

是的，日本人真是非常的能幹！
但現在事實上發生了什麼呢？

警廳刑事科探長却私下去勸凡勒斯基和門特立卡，這兩個被稱為綁匪的，勸他們暫時離開哈爾濱到紗綾村（即報上說他們被殺的所在）去躲避一下，事過境遷以後即可出來。這兩個笨才中了他們的鬼計，在那裏被架在窗口的機關鎗送了命。他們沒有武器，也毫無有防衛自己的機會。當他們在吃麵包和臘腸的時候，子彈便向他們吐來了。凡勒斯基在胸部受了三十一彈，門特立卡在背部中了十九粒彈。我親眼看見這事的表演，後來並且看見殭臥的屍首。

可是在這喜劇演過之後，綁票之風愈演愈烈了，有幾個被害者始終未見發現，在私人和秘密談話中

都把這許多作爲主要資料。

在一九三三年的四月八日擁有百萬財產的許邦西將軍，以議會由我上司綁通，現在又給我新上司下令重行綁架了。他的贖金要五十萬元，贖票的事一共經過了六個月。我是也參與其事的。

在六月上旬一位猶太富人叫却普佛斯基(Chapovsky)的被綁去了，他拒絕憲兵隊叫他寫信給他相熟的人用錢來贖他的時候，他受了三禮拜的可怕苦痛，結果他們仍舊沒有方法破讀他堅決的意志，憲兵隊祇好在一個夜裏，命他們的俄探把他帶到哈爾濱附近的廟台子去謀殺後，把他掩埋了。

憲兵隊幹了這樣傷天害理的事以後，仍舊沒有中止他們的野心，他們繼續去威逼被害者的可憐寡婦，強迫她簽字，允許他們向銀行中領取却普佛斯基君的存款。但銀行拒絕付款，因為他們沒有得有却普佛斯基君死亡的正確消息，而且一般人常常會失蹤一時，而不久又出現的。

日本憲兵隊對於金錢，像狗見了骨頭一樣從不肯捨棄的。銀行方面既堅持要却普佛斯基君死亡的確證……很好……那是不難辦到的事。他們把屍首掘了出來，把頭部斫了下來，放在預先佈置好的河邊某處，在那裏……當然的……第二天早晨給憲兵隊的一個探員發現了。

有了這樣證明以後，銀行無法再拒絕付款，憲兵隊却取去了存款的一半。

在一九三三年的六月中，我的上司命我叫彭組織一個到蒙古去的便衣隊，想法到那裏去綁架七個

蒙旗領袖，其中有兩人是郡王。到七月九日影帶回了十五個蒙旗領袖，他們被禁了三星期。據參與這個買賣的某華人翻譯告訴我，憲兵隊一共得了三百萬元的贖款，影也發到五萬元的橫財。

並沒有到一九三六年的六月十六日，我的熱烈願望終究實現了。影領了他的所有部衆，襲擊一部火軍，殺了二十一個日兵和兩名官長，並取去三十萬元款項，那是哈爾濱偽滿國家銀行解給齊齊哈爾支行的。他並且宣佈對日獨立起來了。

三 吸盡了民脂民膏

在日本佔領東北三省的初期很迅速地委任了許多「顧問」和「諮議」。漸漸他們發現這一羣中的任何一人都發了大財，情形方纔有些改變了。日本軍閥決不願讓這樣的發財機會逃去。所以他們規定凡欲被委做「顧問」或「諮議」的人，必須先化上一筆巨大的「買官費」。

日人野吉 (Nikolai Nikolaievich Yagin) 是專從事不正當行為的人，他獻了五萬元給日本駐屯軍部，第一個買到了「中央警視廳」高等顧問的肥缺，兩年之後，野吉已擁有無數財產，並且在銀行裏存有三十萬元的存款。

每年報效當局最多的一個優缺，就是警廳刑事科的「高等顧問」。一個名叫衛下內的日本人，他運任了三年，每年獻給日本軍事當局的贓款要達十萬元，所以他得保持他的地位而不搖動。

較小的警局「諮議」定價，大約每年納上三千到五千元也就够了。

日本人自己有了為非作惡的天才，同時防止他人更為厲害，他們有一個偵探組織，專門參於人家的家庭集合或宴會，像壽辰，訂婚，結婚，宴餐和其他集會。突然之間警察會降臨說：「這裏聚有十人以上的人，

呀！……「你們開會沒有允准在前……你們全被捕了。」如果老百姓玩紙牌或又麻雀也要被捕，如果唱歌跳舞，便算擾亂治安，也就要被捕，都要繳納了很重要的罰金纔可以出去。

在哈爾濱的環境非常惡劣，所以大家停止應酬而不再舉行宴會了。

日本警局於是又想出新的騙錢方法來了，就是所謂「戶籍調查」。幾乎每一個月日本警務當局要在報上公告，藉口這一點或那一點的關係，門牌號數又要更動了。這種愚不可及的舉動，風行在全「滿洲國」。警察從這家到那家，調換舊門牌，每個新門牌要徵收一塊錢。那塊門牌是一塊薄薄的馬口鐵做的，僅值幾分錢，並且已經一用而再用了。但，這般小偷一樣的賊官却官囊充滿了。

在冬季的幾個月中，常常有幾百華人到松花江上去敲取冰塊，來售給哈爾濱和近郊的居民。在哈爾濱的住宅都有一座冰窖，以備貯冰等夏季應用。當然日本人來了以後，每人都可以任意到江上去敲取他所需要的冰。

一九三三年的二月裏，正是開始敲冰和搬運冰塊的季候，忽然有個東洋鬼叫高橋的向日軍當局繳納了「一萬塊錢，取得了松花江上冰的專賣權」。日軍當局愉快地收了錢，並派兵駐守在江邊。老百姓如果要取一百公斤的冰，須納五毛錢給專賣者，這真可算無孔不入的了。

磯田君是個進取的日本人，他具有新穎的頭腦。他開了一所售玩具和漆器的店，但沒有利息可圖，所

以他決定出讓給其他日本人。他的商店出盤以後，他就到日軍部去聲稱，他願意納款一萬元，取得哈爾濱打掃烟囪的獨占權。意思沒有一個「烟囪」可以由旁人來打掃，以免犯了「獨占者」以權利軍隊集平常一樣接受了這個建議，並指派十名憲兵來聽磯田的指揮，以實行他的專買法。從此以後，哈爾濱每家都遭遇到下述的一個喜劇。

一個日本憲兵，一個翻譯和一個華工走到人家的門前打門或掀電鈴。

「我們要見這宅的主人。」

「你們幾位幹什麼來的？」

「我們來打掃烟囪。」

「打掃烟囪……爲什麼，我的烟囪是清潔的……如果他須要打掃的時候，我可以叫我所歡喜的任何人來打掃呀！」

「先生，你弄錯了，在哈爾濱除了我們「打掃烟囪專利社」可以打掃外，沒有一個人可以來做這工作。你還是讓我們進去打掃你的烟囪，否則我們就要用強了；這樣一來，你不但要出打掃費，並且要出違章罰款了。憲兵在這裏，可以明白地告訴你，你的理由是錯了。」

「打掃費要多少錢呢？」

「兩塊錢。」

「好的，這裏是兩塊錢，請你們走吧，不要再管我烟霞了。」

這三個人於是又走到第二家，表演同樣的一幕……澎的一聲把門關了，主人在門後罵了一大串就是辭源裏也找不到的話。

哈爾濱最出名的騙子，就是山崎，他真是一個無惡不作的人，他曾經加入過正教堂，但結果適得其反了。

有一天他到日軍司令部去告訴他們說，他假設一事務所專收債券，借據，期票和各種債務契約，祇要軍部肯合作，他願意將淨利四分之一送給他們。日軍當局表示贊同，於是山崎在中央大街和六道街轉角開張營業了。

山崎的營業進行很順利，他不問債券的是非，真偽，或者欠不欠，也不顧到年份，也祇曉得照票面百分之三或五的低價收買下來。

他漸漸地照票面的全數收回了不少債項，並且外加從三分到三十六分一年的利息，這種賺人聽聞的重利是「滿洲國」法律特許的。

山崎倚仗了憲兵隊的靠山，剗剗到了無數房屋，商店，土地和各種產業。

這裏就是他殺人不見血的一個例子！

哈爾濱著名放印子錢的鮑琴(Boss)以七百元的代價，售給山崎以二萬五千元票面的期票，其中有的是假的，有的已經付清，有的已經過期多年。其中有一張二百元的借據，是寡婦海而聶克夫人(Halk)三年前和鮑琴訂的，海而聶克夫人早已本利一齊償還清楚，因為還款時鮑琴推稱借據遺失，當由他出立收據，表示款已償還而不再有所要求了。

但這張憑證不能援助海而聶克夫人來對抗山崎，他堅持要她歸還本洋二百元，和三年來按月五分的息金，並且另外要她八百四十五元的手續費，這位可憐的寡婦僅有一所小屋，但山崎預備將極舉行拍賣來填他自己的慾念。

幸而海而聶克夫人的女兒在我辦公處服務，她請我加以援手。我於是到上司那裏去告訴他，徵幸他這時態度很好，他答應來過問這件事。

兩天以後，海而聶克夫人從山崎那裏接到她的原來借據，和另外一張收款清訖的收條。

這僅是其中最渺小的一案，我幸而有力來維持公道。此外還有擺髮難斂的惡行。但我和一般被害者一樣，無權無能，實無法來一一檢舉他。

在日本軍部完全控制之下，還有一個組織，他們命一個從前為軍官的白俄做總的主任，他是被強者

任命的，所以毫無自主權力，他的事務就是專門在日人書寫的公文上簽字。這組織就是所爲「僑民局」，內中分爲六個部份，全體職員俱爲白俄。如果查考到全體俄員的品性，每個東三省人會告訴你，日本人雇用他們的主要原因，是因爲他們都是囚徒、騙子和流氓階級的巨子。

「僑民局」的無限權力並不專限於俄國流亡者，在「滿洲國」的每個歐洲人也受極節制。

所有的銀行、公司、社團、工廠、商業機關、茶館以及其他，都要到牠那裏去登記。凡是要尋找職業的男女，也必須去登記，領了執照方可服役。

部中並委派了一個「觀察員」，他常常到各營業機關去調查，和索閱職員們的登記證。如果發現沒有登記，便立刻命他解雇。結果錢都流入了日本軍部，因爲每個工人，每個書記，每個銀行或公司職員，都要向「僑民局」繳費和納稅，同時還要詳細報告職業、人品或狀況。

「僑民局」還在全「滿洲國」發行彩票來作牠的副業。

這局的另一重要工作，就是在中俄人民中替日本鼓吹，同時組織了一個嚴密的偵探網。爲了達到目的起見，他們在中國和滿洲各重要城市都有機關，來收集諜報。所以牠幾千名職員都成爲日本憲兵的暗探了。

在北平、天津、漢口和上海都有一「僑民局」的分部，實際上都是日本偵探的巢穴而已。在華各租界中

的俄國警務人員，完全接受該局的津貼來幹間諜工作的。

在我替日本幹情報工作的四年半中，我常常到該局探員的謀報。

在天津和上海兩處日人所主持的俄文報——福斯拉琴尼 (Vostok) 和斯洛沃 (Slovo) 都是由該局探員編輯的。

該局另一特殊重要工作，在從前是——或許現在還是——專門訓練和招募會使用軍器的白俄青年，在日人指導之下，到中俄邊境去越界騷擾，從事劫掠和破壞，以引起事端，將責任歸之於蘇俄政府身上，日本當局便可藉口這樣那樣的來提抗議了。

該局爲了訓練白俄僑民的目的，設立了一所軍官學校和兩所幹部學校。

我會屢次爲了職務上的關係，到接近蘇俄邊境的區域中去，常看見穿着日方製造的紅軍制服的白俄青年。他們常在滿境小村作搶劫的勾當，擄得雞犬不留，於是假作退往蘇俄境內的模樣，使當地土人確信劫盜者是眞的蘇俄士兵。這樣詐術似乎能一手掩盡天下目了……他們不是穿了蘇俄制服……他們不是來自蘇俄境內的麼……他們不是退向赤境的麼？結果在第二天早晨，便向莫斯科提出強硬的抗議了。全世界的報紙對於這樣「含血噴人」的新聞都不願多登。但同盟社却狂吠着……

這樣「事變」在空中也同樣的在表演。日人把他們黑架的飛機，潑了蘇俄飛機顏色和樹膠，

本機師駕馳飛到滿境上空，散佈日本人印就的幾萬中俄共黨宣傳品，偶然還要下個鐵蛋，當然日本調查委員立刻到了出事地點，收集散下的傳單，傳訊目睹的民衆，叫他們證明確曾目睹俄機，越境擲彈和散佈共產黨宣傳品。

於是東京又向莫斯科提出抗議……同盟社也忙着向世界各地新聞界謊報事實了……世人或許都相信蘇俄真是個兇狠的魔鬼。這動聽的妖言——但日本人都躲在和服長袖下暗笑了。

「僑民局」內的各種白俄團體都分赴內蒙，察哈爾和熱河，去幫助日本人奴化那些地方。在滿洲鐵路沿線也同樣地在努力工作。當他們感到華人不穩，常常投入義勇軍的時候，白俄護身隊就駐紮在鐵路線的各站。日本人雖然出了六十元一月的餉銀，供給制服，住宿和大菜，但該局所雇的白俄，仍舊發生逃散和叛變的行動，當他們到了離城百里之外的遠處，他們發現日本人允許他們的待遇都變更了。把他們當作了奴隸，每天吃中國伙食，住宿在不如豬圈的地方。至於六十元一月的餉銀，連一個大板都沒看見。

當哈爾濱通龍門鎮的鐵道初建時候，一隊白俄護路叛變了。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在東北站二十一個護路軍殺死了兩名日本官佐和五個日兵，他們擄了五挺機關槍和許多步槍，燒毀了車站便散伙了。在日人佔領滿洲的最初兩年內，日本「僑民局」會把幾百個白俄家庭移植到離海拉爾七十里近蘇俄邊境的三岔河去。

該「局」對於這羣殖民，最先會允許供給經濟，農具牛羊和住宅，但他們所領到的僅是痛苦的失望。他們在日兵監視之下，過着奴隸般的生活，那羣日本魔鬼而且專門奸淫少女，無惡不作。

「僑民局」委派的移民領袖名叫泰拔許 (Tirbooh) 是一個舊俄中尉，但他却自稱少將。也會經常口「共產」的罪名，殺死過幾十個俄人。

不斷的虐待和壓迫，終於引起了叛變的火焰。在一九三五年八月裏，三岔河區一部份移民舉起了義旗，把幾個日本官佐，和許多日兵，以及泰拔許和他的助手全都殺掉了。

第十四章

一 將近結束了

我要講的逸事多着呢，大有說不勝說，紙短言長之慨——但因為有許多事說出來，有礙及墮入日本圈套中的幾位外國領事，而觸犯別國法律的，並且也會傷害我許多朋友的好感的。

事實上，我的苦工已在眼前就將告畢了。一九三六年的新年上，那開斯普案最終宣判後，顯然四面楚歌地向我攻擊了，我怎樣辦呢？……躲起來嗎？……一個一家五口負擔的人，那是不很容易的事情其次，我的進益很少，日本人答應我每月一千四百塊錢，但是他們並不履行其諾言。第一個月是給了我全數，跟着就是半數，又是三份之一，又是僅僅幾百塊錢了，過了六個月之後，我簡直分文拿不到手了。有時我一提到錢的事情，他們總是一套老調說：「等事情解決了，我們準全數付給你好了。」但是事情是一輩子都解決不了的，因此我也就連錢的影子都看不到了；到現在他們是欠了我五萬二千塊錢。

我是早已不希望他們會給我一部份薪水了。

全「滿洲國」的僱員，是同樣的情形，沒有一個人是得到薪水的；警察、軍官，都得不到餉銀。憲兵官佐，以及少數陸軍人員，是弄了走私、賭博、娼妓、販毒去弄錢的。其他的人，常是窮困着。

一九三六年三月末，已弄到走頭無路了，我得到了法院一紙證書，將我自己的一份產業，變賣了一萬二千八百塊錢，當我去收這筆錢的時候，據說一個月內還不能收這筆錢，因為需要正式啓事公佈一下，也許有人會出來提出異議的。

正式啓事是公佈了，一個月過去了。來了一種強制稅，一定要我付二千五百塊錢，但依然不能收我自己的錢，而另一啓事，又得公佈一下，於是又一個月過去，到頭來據說我還不能收我的錢，因為也許哈爾濱以外的一些債主，還沒有看到那啓事呢。

我不過是無數出賣地產的人中間的一個，其中有些人的產業，是值價幾萬萬的。

我一面再，再而三的告訴那上司說：我帶裏錢過活，假使他們不能給我錢，他們就應該讓我走，使我有機會別尋謀生之道，但他們說的總是那一套老調：

「給我們一些時間，等到事情比較正常一些後，你就可以得到所欠餘的一切錢了。」

有一次，那時我比較堅持的要求，他却說：

「你能不能告訴我，當歐洲人做了東方的主人之後，他們給東方人又有多少錢呢？最高的僱員薪金，每月不過五十到一百而已。現在我們是主人了，爲什麼我們要多付出些呢？」

想到了日夜從事各種鬼鬼祟祟的工作，結果是要靠了自己的私蓄來維持生活，使我憤怒得瘋狂了。

但這裏唯一的安慰就是：假使日人將我束縛在他們的掌握中，將我的家眷實際像質押一樣的看管起來，並且又侮辱我，搶掠我，那時他們「聰明」的代價是會十分大的，我會使他們各方面來付這一筆債。凡到我處或經過我手裏的情報，我祕密地傳遞給義勇軍以及日人的敵人了。當日軍軍運火軍開出去進攻義勇軍之前，義勇軍方面早就得通知了，他們常常知道日本軍隊開拔上陣進攻他們的時間的。

在日人準備舉行「搜索」或「逮捕」（即施行抄查和綁票手段）之前，我常預先告知被害者，使他們有充分的時間去逃避。

在滿洲政府的雇員中，有幾百個華人像我一樣被追着繼續服務，但他們中間大半皆已參加中國秘密組織，其目的為謀殺日本文武官吏和漢奸的生命。因此有幾千個日本人被殺害了。許多漢奸也因為出賣他們的靈魂而喪失其性命了。傀儡溥儀曾經三次遇刺，他的皇宮也給手下人放火而毀去了一半。在長春的日本陸軍航空站也給火毀了；齊齊哈爾的空軍站縱火兩次，哈爾濱的被火一次，在綏芬河車站的也會遇火兩次。軍用火車會受到不少次的擊襲，日本警務當局始終未能發現誰是表演這許多極作的演員。在日本警察和情報機關的能幹偵探的權勢下，無論日夜都在活躍地表演着偵探戲劇。日本人的確有思慮慎密的頭腦，無論一閃眼，一動手在他們都含着特別意識，他們常常會叫你畫一圖解或作一小時的詳細釋解。

當八月初我打算向法院追索我變產所得的金錢，我聘了一個日本律師，答應給他一千塊錢。但漸漸我感到事態愈變愈壞了，我完全明白我是在危險中了。我必須立即離開此地；我妻的健康因為這樣的不安定生活更受威脅了。我們的醫生出立證書證明她必須調換空氣，但是我上司拒絕她走，並且堅決地說：「哈爾濱氣候是非常良好的，你的妻子爲了健康易於恢復，無須離開此地。」在八月十日他問我在一九三四年認識一名叫李善恒的麼？我告訴他在日人未佔瀋陽之前我認識他的，他是軍校的歷史教員，但在滿洲淪陷之後我就沒有見過他了。

那長官注視了我一會，他說道：「你相信你在瀋陽所認識的李善恒，就是現在哈爾濱逃難憲兵逮捕，而遁入松浦洋行從五樓窗中躍下的李善恒麼？」

「我怎樣會曉得呢？因爲我在所爲哈爾濱李善恒自殺的前後，我始終沒有見過他。」我反抗着說。於是他再對我作一深長的注視。他又說：「我要看看你的中文簽字……替我寫下來。」

我便把我中文名字的三個字寫出來。他看了看那張紙，便沒有批評什麼而放進了他的袋中。他於是又問道：

「在一九三四年有兩個被迫降落在滿洲境內的蘇俄航空員，你不是和他們交談過麼？」
「你指逃走的那兩個麼？」我問「沒有一個人能和他們交談，因爲那是被嚴禁的。」

「不要開什麼玩笑了！」他嚴重地警告我。「你曉得非常清楚他們並不是逃亡者。我們這樣說，是爲了要羞辱那羣蘇聯狗。有好幾個長春機關告訴我，你和那兩個飛行員談了一小時半以上的話。」

於是我說：「你誤聽了人家的話了，我並沒有和他們談話；我始終沒有接近他們的可能。誰告訴你他便是個造謠者。我很明白我是被猜疑了……如果你不信任我，你爲什麼還雇用我呢？我所獲得的，除了到期已久的欠薪，便是恥辱和污蔑，此外便沒有什麼了……這完全因爲我得罪了中野和拉佐伊夫斯基（Radzevsky）兩個壞蛋的關係。」

那位長官靜聽了我無可批駁的陳述以後，便伸手和我握手，他說：「什麼都解釋清楚了，范士柏先生，我曉得那般人是在替你作對，但我決不聽片面之詞的。」

幾天以後，討論到兩個猶太人和十九歲青年阿伯拉罕維去（Abrahamich）的綁票事件，後者是憲兵部隊需索三萬元贖金的。那長官問我他父親有沒有那許多錢來贖他的孩子。我回答說：

「我不相信他會有這許多錢。就是他有，在他孩子已經被憲兵偵緝員殺害了以後，也沒有什麼用處呢？」

「這件事外面已在談論了麼？」

「當然，市民已在議論了。」

「他們說些什麼？」

「所爲緝匪實際就是日本憲兵部隊和別的警務機關所雇用的人員，而贖取肉票的金錢却早流入日本軍事當局的私囊。這是無法阻止成千的人民來私議的……不能把他們全數逮捕的。」

這天晚上我到我所聘請的日本律師那裏，去問問我變產的事進行到什麼地步了。他告訴我還有許多困難。最好我去看承審本案的日本法官，或者給他些酬報，我就可以取出我的錢了。

我在這環境中祇好再上一次圈套，那律師便引我到砲隊街的法官家中去。當我和這位膽大妄爲的官吏晤面的當兒，他從頭至腳的看我，像發現了稀有的昆蟲標本一樣。我們談話的結果是祇要我給他三千塊錢，我就可以領回我變產的錢了。我在無可奈何之中，祇好簽了一張三千塊錢的期票給山崎，於是答應在一星期中就可領我的款項了。當我們講買賣的中間，我曾屢次高聲發言：這位貪贓枉法的日本法官，他還囑咐我不要忘了我是在對一位日本法學家說話。這個賊官他搶了我三千塊錢，還敢自稱爲法學家，真是可羞！

在八月終了時，日本律師告訴我可以到法院裏去領錢了。法院裏給了我一紙通知書，據說我變產所得應爲一萬二千八百元，內中付去二千五百元稅金，七百五十元審判費，還餘九千五百五十元。我憑了這紙通知書，便可以到法院會計處去領款。但那位日本會計員却告訴我說，在我的證明文件中手續還不完

全，叫我等一會兒，我祇得等……一等再等的守候着，末了他却說你明天再來罷。

我到了家中感到有些寒熱我的脚似乎拖了幾噸的鉛。我的精神全消失了。我已經失去了我所有的力量，來反抗這羣兇暴瘋狂的畜生們。我的妻子病着，我不願意再告訴她我所受的刺激。我十四歲的女兒琴納維佛（Genevieve）却竭力來安慰我。她的天真爛漫，的確使我獲到無上的安慰。我對她一無掩蔽的全實說了。「爸爸，快活些吧！你可以感到一切將成過去，你將勝利，我們不久就可以離開滿州，離開這羣野蠻的人猿。我們失去了一切，有什麼關係呢？你還強壯和能幹，你不久就可以恢復日本人所搶去你所有的一切。」

同天晚上山崎來找我，說有一個重要消息告訴我。我在這呼救無門的狼狽景况中，我感到必須克服心中的忿恨，去和他辦一交涉。於是我便去看他。他用世界上最謙和的態度來接待我，鞠了無數的躬，驅去了日本人的狡猾和兇險，而表演着特殊的親善。問過了我的病况，用過了茶和煙，他告訴我法院的日本會計員並不是一定說我的文件不完全，祇要我給他五百塊錢，他立刻可以給我支票領款。我聽了他的話，真是驚歡交集，因為我以為他也要敵我三千塊錢竹槓。這樣看來，那位法院會計員倒不是一位「日本法學家」啊！我又祇好忍痛地簽了一張五百元期票給山崎了。

第二天我逢期到法院去的時候，那位會計員微笑地歡迎着。他說我文件中的不合已經改正了，並且

謙和地給了我領款的支票。我在大堂上遇見了山崎，他借了另外一個日本人和他高大的俄國保鏢，shot正在等候我。我們便回到銀行去領款，我擔心着會不會再發現支票上有什麼不合手續，再用去我三千兩千。謝天謝地，幸而支票照兌了。我在款項中給了山崎三千五百元，因為這是我應許法官和會計員的孝敬。

當晚我們的路和哈爾濱時報兩家報紙派人向我募捐五百元一家。我把他們罵走了。不久我們的黨的雇員打電話警告我說，在三天之內我必須給他們五百塊錢，否則他們就要在報紙上說我是中國國民黨的特務員和匪徒的耳目。還有一家也同樣地來威脅我。我對他們都說，你們歡喜怎樣發表便怎樣好了。我把一切都告訴我的上司，他冷淡的回答我說他不歡喜聽這許多無稽之談。

現在我明白這事變已到了箭在弦上的時期了。

我必須幹，迅速地幹。我照預定計劃，去看一個人，他曉得怎樣去見C上校，我並且預先給了他一個消息。

當天晚上顧吐普祿(Gordon)告訴我中野要我給他一千塊錢。我說我的錢全都用完了。兩天後他電話中告訴我說中野對我的拒付一千塊錢非常痛恨……太不行……現在非給二千五百元不成，否則他便要洩露我的一切，那時我的生命會等於一掬的沙灰。

九月三日在總部的一位友人秘密地告訴我，在今天晚上日本軍事當局，憲兵隊長和我的長官將聚集會議，來討論我的一切罪狀，他並且答應先報告我會議的結果。

第二天早晨七時我接到下列的報告：憲兵隊長曾取出許多逮捕華人的文件和證據，和一條俄國機員的報告，其中間接的述及我的不合法行動；福吐普祿曾經宣稱幾次看見我在晚上從廟中出來；軍事當局非常注意我所寫的中文名字，因為日本憲兵在某處想逮捕的李善恒，從五樓跳下自殺的時候，發現他的記事冊中也寫有同樣的三字。我的長官曾竭力為我辯護，但毫無效力。決議在三天之後我將被送到齊哈爾，意思就是，失蹤……滅跡了。

「你必須毫不遲延的逃走」我的友人勸告我。

「那我的家屬呢？」

「活着逃出滿州，比死在滿州總有些。你等在這裏並沒有方法援助你家屬；但，離開了日本人，你就有好機會了。我要求你「走」，乘你現在還有軍職，並且暫時還沒有逮捕你的命令時候；快到飛機場乘機去。」

這是很忠實的勸告，因此我就不再耽擱。我去看 C 上校，我告訴他我的情形，和決定出走的計劃，他都非常熱忱的贊成，他並且保證我，他將在第二天早晨把我家屬送上火車，決不使她們在赴大連的途中有

人干涉。於是我趕去辭別一位中國老友，他的臨別贈言我到今天還牢牢記憶着，我接着便奔回家中去作最後的告別。我不敢攜帶什麼行李，但我妻堅持命我的駁書送我到航空站，這樣她可以確定聽得我已安全離開了此地。

一小時半以後，我已飛向長春和大連的途中了。在那裏我乘船到青島，第二天就到了那裏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的早晨，我到日本郵船青島丸上去，我在甲板希望遇見我的家屬。但我在各處找尋，始終看不見她們，我以為發生什麼變端了。我到頭等艙去的時候，我從一間開了艙門的船室走過，看見我妻正坐在杯上飲泣，我的女兒呆呆地注視着，而我的兒子却正在安慰他的母親。忽然我發現有兩個日本警察站在艙門邊，我知道一定有什麼變端了，我站在那裏恐有不便。正在進退徬徨的時候，我兒的眼光已經發現了我。他敏捷的神經，使他立即走到他母親面前用意大利語向她說：「快走，我們全被捕了，他們並且也想逮捕你。」我立即回到碼頭上，很急的去報告中國官憲，請他們要求日本領事命令釋放我的家屬，讓她們登陸。這效能是完全失敗了。

我的妻子和兒女們在日本領事前經過很長的訊問後，便送回船中，這船今晚即開上海，三日後再回青島，中國官廳的抗議，宛若送入了聾子的耳中。范士柏夫人和她兩個孩子於是仍被送回滿洲了。當天晚上日本領事署長和兩個探員到我住的那家旅館裏想把我綁去，他們推說日本領事要同我談話。我立即

報告中國警長，他爲了防備日人的陰謀，命四個華警妥爲保護，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們看我上了飛上海的中國航空機，方纔算脫離了虎口。

二 在上海的奔走

我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到達上海，立即設法營救我被捕的家屬。最初我寫了一封長函給我的上司，聲明我出走的原因，並且担保他我決不作任何妨害公家的行動，我祇希望和我的家屬早日敘首。此外又同樣的寫了一封信，給哈爾濱日本軍事最高長官安藤將軍。這兩封信都交給日本駐華使館，但我始終未接到復信。

在十九日我接到從大連發來的下列電報：「你的家屬因為福吐普祿一案而逮捕了。如果你十天內不到這裏，她們便將解往哈爾濱。速匯五百元來，你的妻子囊空如洗了。」——盧拉基 [Lurachi]

盧拉基君是大連的一位意商。

到了九月二十日，日本通訊組織同盟社在上海各報發表一段大連電訊，說我家屬被捕的原因，是因為我在哈爾濱侵佔了我舊同事意大利人 Padovani 和 Dehinger 的款項關係。同盟社又在哈爾濱各報發表一通訊，說我妻和子女被捕的原因，是爲了我未付償希臘人福吐普祿債款二萬五千元的關係。

幾天以後，Padavani 先生寫信給我上海的律師普利美君 (Prenet) 說：「他從沒有控訴我這種案件，他根本沒有這種動機。」至於我另一位同事 Delmas, H. 更不會對我提起訴訟，因為他在五個月前早已去世了。

到了九月二十八日我重又寫了封信給哈爾濱的安藤將軍，我警告他說如果同盟社再對我偽造各種電訊，我爲了自衛起見，我不得不發表種種日本方面所不願給人知道的情形。從此以後，除了英俄各報登載反對日本當局扣押我家屬的文件外，同盟社不敢再事顛倒黑白了。

十月中旬，我哈爾濱友人告訴我，著名的中村和他手下曾經謀殺 Chapevsky 君的兩個俄國人已經向上海出發了，果然在幾天以後，我寄寓的法租界莫利愛路住所隣近，這兩個壞蛋在左右盤旋。我幾個人阻止他們的陰謀，並且告訴他們說，如果再發現他們在附近逗遛，他們所孝敬 Chapevsky 君的藥物，將同樣送給他們了。

中村寄寓在黃浦路日本領事署，我曾跟隨過他幾次，有次他從外灘一家日本銀行出來，我特意嚇了他一跳。

當我站在他面前阻住他的去路時，他黃色的臉皮變成赭色了。他氣絀地說他到上海另有公幹，決不是來麻煩我的。我像我友人給 Denis 兄弟（即那兩個俄國人）的警告一樣，同樣地警告了他。

兩天以後，有一個日本人來訪我，他說他是受了當局的委託來和我作一妥協的……祇要我告訴他們在「滿州國」抗日華人和俄人的名字，我的家屬就可以離開那裏。我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不但我不曉得他們的名字，而且我認爲這種組織，僅是日本當局腦海中的幻景而已。我並且警告他說，如果不立即釋放我的家屬，我將公佈我所知道的日本在滿州的種種暴行。

他說：「這一點我們並不顧慮，我們會否認你所發表的，決不會有人相信你。」

十一月上旬有一位領事勸我寫信給本野子爵，他是東京外交部的有勢力人，我遵從了他的勸告。同時我的律師普利美君屢次訪問日本總領事，但毫無效果；他們告訴他說，他們沒有方法去問及「滿洲國」的事。本野子爵給我的回信，對我的痛苦深表同情，但他說在東京毫無有效的辦法。

這時我整天的憂慮着我妻的處境。我曉得她的健康，必將因她的逮捕受到損害，現在經過法律和和平的各種努力，但已無法營救她們。我祇得決定改變我的方針了。

我寫信給哈爾濱的一位友人，請他去看我所信仰的某君，叫他立即到上海來。那位忠實的使者在十一月十日到了上海，第二天他帶了我給義勇軍C上校的信而回哈爾濱去了。在信中我請C上校幹某項工作來營救我家屬，至少使我的妻離開行將喪死的牢獄。

那位使者到了哈爾濱，立即去找C的探員，他告訴他說C在內地而一時殊爲難找。他再領他到穆稜

去見另外一個特務員，因為他或者可以曉得C究竟在什麼地方。我的使者照他指所示的去做，經過幾天的找尋，終於給他尋到了C，上校把我的信交給了他。

兩天以後，十一月二十三日C上校領了他勇敢的部下襲擊海林——是離開穆稜六十公里的一個小鎮，當即俘虜了三十一個日本人，其中有九個是婦人。到了二十五日那天，他通知哈爾濱的日軍當局，告訴他們他已獲得了三十一個日本肉票，如果日軍當局使范士柏家屬安全離開滿洲，他就準備恢復他們的自由。日軍當局的答覆是說他們將待東京方面的訓令到後，方可決定怎樣辦法。

到了十二月三日C上校又要求在東京回訓未到之前，先釋放范士柏夫人，使她們骨肉團聚在一處，如果拒絕這建議，他就要鎗斃日本俘虜中的半數了。

第二天，范士柏夫人便離開牢獄而到西伯利亞旅館中了。

雙方逐日的商議，日人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議。他們情願以兩個所謂「匪犯」來調換每一日俘，但始終不允我的家人離開那裏。C上校堅持不肯，畢竟最後的勝利屬於他了。還有一些困難，就是怎樣曉得日虜是否釋放，我的家屬怎樣離開滿洲。日本人主張先釋放日虜，但C上校堅持先使我的家屬離開。結果雙方同意，當我家屬到大連的時候先釋一半日俘，其餘一半等她們到達上海時便全行開釋。

雙方都履行這諾言。我親愛的家人受了六個月的痛苦，在一九三七年的二月二十五日終於到了上

海了。

她們來了一個月後，有個叫後藤的日本人，代表日本當局來訪我，他說他聽見我將寫一本關於滿洲的書，請我不要這樣做，因為東京方面很明瞭「滿洲國」日本當局對待我和我家屬的行為不甚正當，我的財產損失，他們願意賠償，我被他們掠搶去的一切和四年來的欠薪，他們都願意如數歸還。現在的問題就是靜等東京方面調查的結果。

六月初，上海快訊社長佛利特君告訴我，肯納君（C. B. Kinney）適從滿洲來此，極願見我。肯納君的父親是丹麥血系的美國人，他的母親是夏威夷人，而他的夫人是日本人，他是在南滿鐵道的宣傳部中服務的高級人員。

他在上海的時候，住在一所最大的旅館名叫「老匯大廈」中的。

在我去看他之後，我發現常常有許多日本官員和白俄人士去訪問他的。

我在會客室中打了個電話給他，他請我上去，但我却請他下來晤談。

當我們坐在會客室中的時候，他對我受到的羞辱待遇，表示着無限的氣忿……他告訴我說許多日本官員，像坂瀨和小新義都因為虐待我的家屬，而受到嚴厲的處罰……而日本當局正在詳細偵查，預備償還我所受的損失。

他忽然又說道：「我聽說你預備寫一本書，記述你和日本人在滿洲四年半中所幹的事。以你的聰明而會做這愚笨的事，我實在不大敢相信。雖然你是個歸化華人，但你是意大利出生的，意大利和日本現在却是好朋友啊！你如果作反日宣傳，你就是作反意大利的宣傳了。」

我回答他說：「肯納先生，日本人強迫我毫無意義的替他們工作了四年半。他們相反地倒掉我去至少值五萬元的產業，把我的家屬當囚犯一樣拘禁了六個月，有三個月竟把我的妻子關入了暗無天日的土牢中。你想這種毫無反抗的搶劫，侮辱和狂暴，是一個血性男子所能忍受的麼？日本人的諾言，我看來毫無信義；他們的威脅，我也始終不會怕懼。我感着我有責任來完成一個工作。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我的程序，我在日本的狐皮下，已被驅幹了不少違背我良心的慘事。我現在爲了贖我過去的罪惡，爲了替一般仍在最野蠻壓力生活下的犧牲者作呼號，惟有把真像來告訴給世界。這就是我的答覆。」

三 我妻的自述

在我夫乘機同大連後的幾小時內，我就作第二天乘火車的種種準備。我希望他能脫離危境和不替我們擔憂。他的出走在二十四小時內是不會有人發覺的。第二天早晨我借了十四歲的女兒李納維佛和八歲的兒子意大利（ITALIO）乘了火車向大連出發了。在我們到達上海的青島丸甲板之前，我們盡日忘忘地思慮着一天。

大約下午二時，一個叫小新的日本人，代表日本警察方面走進了我們的船艙。他查閱我們的護照，並且給我看正從哈爾濱來的一個電報，內容是命他逮捕我們，送我們回滿洲，在那裏要拘禁我們。一直等到我夫回來。於是他開始搜查我們的行囊，把所有價值的物件都取了去。一共被他搜去一千塊錢，六百六十五個俄國金羅布，三百四十五元美金，二隻鑽戒，二隻別針，二串頸珠，一隻藍寶石戒，二隻金手錶和其他金器，當我拒絕交出我的結婚戒指時候，他在我肩上重重的擊兩下，並且罵我為俄國豬婆。

我的孩子看了這樣的獸行，再也忍不住他們的忿怒，一面哭一面痛罵着跳過去和他拚命。

他若無其事地把搶來的贓物藏在口袋中，離開了艙房。

當他忙於搜索的時候，我女兒乘他俯身翻箱倒篋的混亂中，偷偷地把她的私蓄三百九十元藏進了她的胸衣中。在途中我私下給了同船的一位上海律師 Baerengruntz 君，但不幸為日本偵探看破，又被小新義從那位朋友那裏將錢取去了。

當我們的船停在青島的時候，我的丈夫也到了船上。在日本警察未發覺之前，意大利領事的警告他說，我們已經被捕，他應立即離開此地。在當天上午十時我們被送至日本領事，一個日本軍官告訴我們說，如果我的丈夫不回到滿洲去，我們將全被送到哈爾濱去。

我實問他青島是中國領土，不應該對我們行使無理和違法的逮捕。他却說：「夫人，你並沒有逮捕，你是我們的貴客。」於是我表示對於小新義虐待我的忿怒。他使用日語向小新義說道：

「你弄錯了，她並不是俄國人，並且照哈爾濱來電說，她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會講幾國官話，是位新聞記者。這倒麻煩了……你最好向他道個歉吧。」小新義向我深深地鞠了個躬，並且用英文說道：「我打了你感到非常抱歉，請你原諒我以為你是俄國人呢。」（我的孩子懂得日語。）

我們於是又被帶回船中，安置在一個三等艙中。當晚船向上海進發的時候，在乘客表中並沒有我們的名字。青島丸在上海勾留了兩天，我們始終被鎖在艙中。到了青島，中國官憲雖然上船，但不許他們見我們的面。連我們被拘在憲兵隊部，一晝夜間也不給我們食物。經過無數次的申訴，才允許我和一位

意商盧拉基君通話，他帶了些食品給我們果腹，我又請求他打電報到青島告訴我夫，說我們已經被捕，並且囊空如洗了。據憲兵隊告訴盧拉基君說，我夫被控告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償付福吐普祿的債務關係。

范士柏先生在上海接到了電報，立即電匯四百元給我們；但日本當局強迫盧拉基君交出此款，所以我依然沒有收到分文。

哈爾濱特務機關長坂瀨和探員柴伐洛夫未到之前，我在獄中被關了八天。被他們押解到了哈爾濱，我和孩子們都被送進了刑事部的鞞讎牢獄中，過了兩天，琴納維佛和意大利羅被送到住在哈爾濱的外婆家中去。

經過一星期後，我方由坂瀨作下列的訊問：

「你知道你的丈夫和中國國民黨有聯絡麼？……他是個猶太人麼？……他是個共濟會員麼？……他和「匪徒」（即義勇軍）有過關係麼？……關於Kappa一案，他和你講過些什麼？……」

關於這些問題我回答說，我的丈夫從不和我談論職務上的事；他也從不把任何信札或文件帶回家中。

九天以後我又被帶到坂瀨的公事房中，在那裏還有一位日本少佐，他叫什麼名字，我已經記不起了，他英文講得很好。他問我道：

「你的丈夫爲什麼對於K.P.O.被綁的事感到莫大的興趣……誰命令他在這一方面特別賣力的工作……他是猶太人麼……還是共濟社員呢……有人報告我們在過去十八月中間，他從一家外國銀行領到了二十萬元，這許多錢是供給義勇軍來傾覆日本軍用車用的。你丈夫常在黑夜間到廟裏去訪問的中國官長是誰呀……他不是有時化妝了女子出外麼……我們曉得他屬於一個英國共濟會……他曾經去過哈爾濱的共濟會麼」

我回稱我全不曉得這許多傳聞。

這位少佐繼續說：「你的丈夫在上海專寫反對我們日本和『滿洲國』的文字，你寫信告訴他，如果他還想再見他的家屬，請他勿再隻字提到他所曉得的情形。」

我回答說：「你們要我夫不再發表什麼，最好的方法是釋放我，讓我到上海去。我不願寫信告訴他，你這樣的威脅我。」

於是叛瀨說：「你真是個刁婦，但我們日本人曉得怎樣使一個頑劣的人招供……」

幾分鐘後一個俄婦被領了進來……天哪，這够惡怖了，在她的頭上已沒有一根頭髮……他的手指甲完全被撕去了。」

中翰看「坂瀨」喊道：「她因爲不肯招供，我們把她的頭髮，一撮一撮的給拉去了……你再看看她的腳

亮指甲呢？」

那位可憐的青年俄婦已厥無人色，我想我快要昏迷去了。但我自己強自鎮定，並且回答說：

「你也能這樣虐待我，但你要記得，我丈夫是自由着啊……如果你的確曉得他像何方纜所繫的一樣……你對待我，必須要當心些才好。」

我又被他們帶回到污濁的監中。

在我被禁的慘痛牢獄生活中，我看見許多俄國和中國人，身體很健全的被帶了出去，但重懲回來時，都成了血肉模糊的殘廢者了。我於是和幾個受難者談話和詢問她們的名字。

有一位名叫韓玉儀的中國少女，年祇十六歲，她已經渡了六個月的牢獄生活了。她受過了幾次的酷刑，兩次她的腳給電壓斗烙燒，她的眼睛又用火柴來燒。當我離開時候她還沒有脫離苦境。還有一位是廿七歲的曹義梅夫人，他們爲了逼取她的口供，把她的腳背用鎗彈打成蜂巢一樣，但她依然掙扎，因爲她沒有什麼可以招認，他們便很近的向她頭部開鎗，結果腦漿迸裂而慘死了。一位蘇俄女性名叫 Markovna Zaharchenko 夫人的，在四十天監禁中，每天被各種毒刑拷打着；她雙手的指頭俱已七零八落了，她的睫毛用火柴燒過，有時候把她的腳倒懸起來，經過幾小時，再換以傷痕斑斑的兩手。到後來他們曉得她的確坦白無知，纔釋放去了。

她到蘇聯醫院中治療時，據說她此後將變成一個殘廢的人了。

他們好幾次恐嚇我，如果我再不寫信召我的丈夫到滿洲來，將用各種苛刑來對付我。但他們始終沒有實行那些毒刑的緣故，我却不懼。

我被囚將近一月時，因為飲食不飽，而晚上毫無遮蓋的睡在潮濕的地上，輕了二十五磅，並且不時會昏迷過去。獄警 Yashin 便報告警長說，如果不改良我的待遇，恐怕我將瘦斃獄中了。醫生警告的效力，使我得從家中取來幾條毛毯和一個枕頭，並且每星期得有兩次，許他們送些食物給我。

在我拘禁的第八十八天的早晨我接到通知說我是釋放了，我可以和我家屬一起住在西伯利亞旅館，但我還是不能離開哈爾濱。

我離開監中的時候，坂瀨對我說：

「請你寫信給你丈夫，叫他在上海報紙上不要說罵。並且再告訴他如果他和滿洲境內的「匪徒」有所往來，我們在上海駐有密探，就是他所去的世界任何各地都有。」

我在西伯利亞旅館中住了三個月，坂瀨曾來看過我好幾次。他現在對於我的健康等的關心，極其十分客氣。他並且要我寫信告訴我夫，近來日人對我待遇很好，請他勿再著文攻擊日本和「滿洲國」。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我又被召到警局的警長辦公室去。我這時健康尚未復原，我女李納維

佛因此伴了我去。這位警長叫做菊井，真會講日語，於是牧野男爵的令媛同我們同去作禮。到非請我們坐定以後，他說道：

「我很慶幸的告訴你，現在你可以借你的孩子離開滿洲，而到任何一處去了。你到上海的時候，請你告訴你的丈夫，他雖然被迫來替日本人做了許多工作，但並不能因此原諒他勾結「土匪」的罪狀。」

我向他追還在青島丸上被日本警官所取去的錢幣和手飾，但他說在哈爾濱方面一點不曉得這些事。

末了在二月二十一日，我們便離開哈爾濱向大連進發了。我們的親友聽到這消息都很快活，但沒有一個人敢到車站上話別，惟恐帶累他們自己，有幾位送了些鮮花放在我們車廂中，但日本憲兵長官卻將我們拋了出去，還有一個從莫迭爾旅館送兩個花球來的一個孩子，不幸正走過他們的面前，連人連花都給拋到車廂外面去了。

二月二十三日我們從大連乘大連丸向上海進發的時候，我在船上遇見六個月前搶我錢財的那位日本警官小新義；我和他退索前次取去的財物，他却含着冷笑說道：

「你應該謝謝上帝，你丈夫犯了這樣大罪，你還能活着離開滿洲。請你不要忘記告訴他，他不要以為他已老虎頭上打着了蒼蠅，日本人是會如法泡製的。」

收場白

「上帝是要保護你的，上帝將幫助你平安回到中國，必不讓你的家眷遇到任何不幸。」
這是我的一位中國至友，對我說的話。他是老派人物，品格如松柏之堅。

「小時節，我接得警報，日軍當局已下令捉我，所以我來和這位老友道別，我站在他面前，他揮手揮我的肩膀。目光直對着我，他說：

「朋友，我現在已老邁了，對於我的同胞，對於我所愛的滿洲，是不能再有所作爲了。但是你還強壯，你是知道的！日本人最近五年來對於滿洲中國人民可憎可恨的暴行，你是身經目擊的惟一白種人。

「敘述這一羣武裝野蠻人加於一個和平勤勞民族的罪行與兇暴，沒有一個人比你更有資格了。倘若你得平安回到中國，——我是希望而且相信你會平安回到中國的，你必須盡你能力所及，使盡多知道滿洲悲劇的真相，不被有關係的通訊社來歪曲，不被日本金錢操縱的報館來掩飾。」

「赤裸裸的真相……你應嗎？」

「我答應——整個真相。」

「記得！」這是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幾個月過去了……六個月辛勤的努力，營救我的家眷脫出日軍當局的鐵籠。

我在哈爾濱的產業被沒收……日本當局狠心的迫害，用盡種種方法，想使我的生活痛苦，甚至在上海亦然……遭歷大艱大險，從死中求生，就在最具雄心的人也是够受的了……種種事情使得我沒有時間來履行會對我那中國老友所立的莊嚴諾言，這位老友的面貌，永遠活現於我的內心裏，我仍聽覺着他的目光注視着我，耳邊還有着他溫和的聲音：「記得！」

*

*

*

*

現在我已完成了我的工作了。這本書是爲履行我的諾言而寫的，要將真象使人知道，要在日本軍閥的前額上蓋上該羅亞當之長子，殺害其弟亞伯者的火印；要將姦淫婦女的日軍官暴露於全世界良心之前；要揭示這些穿制服的野人所沉降的不名譽的深淵，並且要以人道、文明和公理的名義，露出滿洲人民在他們高壓手段下所遭的浩劫。

我這裏所述的全是事實，我親眼見到的事實，我差不多全都不由自主參與其事。對於許多讀者，露出這些事實來，看起來好像是可怕的噩夢，令人難以置信。在不熟知日人的人，說不定會有此感想；而在會與

日本軍閥接近過的人，却認為是很自然的事實。

世界對於日本的一「認識」的錯誤紀錄，可成巨帙。這事乃受英國之賜，一九〇六年英日新條約以前和以後當英國獅子為恐懼心所驅使，兼受野心的督促，覺得須拔去俄國的熊爪，兼擊落其門牙的時候，英國宣傳盛讚新與日本矮小民族勇敢，動盪而有進步，世界各國幾為之眩惑，我們多數都還在就迷着那三十年木乃伊的欺騙。英國保守黨相助造成這英勇日本的神話；在神話背後，長成了一個科學怪人，或青相助創造他出來的那些人。

像宣傳家所說的，日本，以及日本的一切東西，都可比之於層樓幻景。好比一個水泡，在騙人的光華作用下，五光十色，極為美觀；到你走近時，便證明是一個幻想。你越走近，其假偽與空虛愈覺怕人。

他那叩頭式的彬彬有禮是裝模作樣的；他們的客氣是一層包肉紙。日本的武士道認為一切手段，祇要能達到目的，皆可容易。在他們看來，說謊，欺人，詐騙，陰謀，背叛，偽善，都可以幹的，祇要有利可得或能藉此得到權勢。我從沒有碰到過任何人與他們的當局或軍官接觸，事後對於他們可笑的野性不深覺鄙卑的。對於這層，日本人已足馳譽於世界。

文明國家使其得用新式武器的，就是此等民族！

凡顯化學公式，將文明與日本軍武主義併合起來，便會產生出虛渺的，空無一物的化合物。他們所有

的文學、美術、倫理、宗教，全都是借來的，抄襲的，或摹倣的，其在工商業上的成就也是如此。在精神上，理智上，及物質上，日本全都由一羣橫行不法的剽竊者做了領導。

日本文學是移植來的中國產物。但中國文學乃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哲學寶藏，而日本的却是鸚鵡學語，失去原形，建立於帝室源於天神的神話，漂渺無據，前後不相聯接的胡言亂道。至於道德一層，一個出售數十萬少女與販奴者供給遠東多數娼妓的民族，還有什麼道德可言呢？除日本外，還有什麼地方將少女的真操訂約租與妓院龜鴿數年，然後又回家嫁人，若無其事一般的呢？

這一羣淫惡的豺狼，得在地球上胡作非為，不受煩擾，為時已經太久了。你看到他們化了裝，頭戴高帽子，身穿大禮服，環行於世界各國首都，每一個都是這狼羣的忠誠使者。

執筆書此時，他們有一百萬兵士和鉅量的軍火在中國；數百萬無辜的人民被屠殺，數萬萬元的財產被摧毀。但這對一個民族的真正殘酷和豪淫還剛在開始，倘若日人得成功使中國變成奴隸，和使滿洲成為奴隸一樣，殺人劫貨，綁架勒贖，結隊橫行，使人墮落，種種他們所謂「天神之道」，都在認真進行。此後他們還要幹出比我幾年來所目睹的罪狀還更兇惡的事。

茲特在時機還未太晚之前，向世界提出警告。對於真正的日本，應該將其本來面目，赤裸裸的暴露出來。

復。
凡我所提到的人名都是真姓名。我所漏去的那些人還住在滿洲，不寫出來，以免日軍加以慘酷的報

我寫本書，有兩個動機：一，爲人類文化服務；其二，就是依照我那位中國老友的願望，來爲滿洲人民盡些道義上的義務，這樣我的良心可以得到安甯了。再會吧遼東！我將在我眼前的新世界懷抱中，重新生活下去！

校譯後記

這本書遲遲和讀者見面，慮讀者們，多方關懷，覺得非常抱歉。但這裏是有原因的：

- 一、我們和原著者經過一個時期商討，這是一個延遲的原因；
- 二、我們是不願「取巧」，却切切實實做了一些工作，結果時間自然不能「趕」了；
- 三、因為是幾個朋友合譯的，想略加詞面上的統一，又費了相當時間；
- 四、……不說了，總之，這本書延遲的原因，自有其苦衷在，除了上面的聲明，我們趁便在這裏向我們商討的原作者萬斯白先生，替我改正滿洲里各方面特殊情形，（是我們沒有到過不能懂得的），譯文的之什先生，以及最後替我們全部校閱過的劉伊索先生，敬至我們的謝意！

C 識

二十年二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再版

譯 報 叢 書
翻 印 必 先

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

原著者：AMLETO VESPA

譯者：文緣社

發行者：國光印書館

上海圓明園路一四九號

平裝一冊定價法幣五百元

